

影响你一生的世界名人·十五

最具影响力的 外交巨擘

(上册)

邢春茹 主编

辽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影响你一生的世界名人/邢春茹主编. —沈阳 辽海出版社 2007.3

ISBN 978 - 7 - 80711 - 716 - 2

I. 影... II. 邢... III. 名人 - 列传 - 世界 IV. K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6743 号

辽海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北京海德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字数: 1960 千字 印张: 110
责编: 于文海 陈晓玉 2007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96.00 元 (全 20 册)

前 言

马克思曾经说过：“文学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

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与社会、政治以及哲学、宗教和道德等社会科学具有密切的关系，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它能深刻反映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特定时期的社会生活面貌。文学的功能是以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是用具体的、生动感人的细节来反映客观世界的。优秀的文学作品能使人产生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感觉，并从思想感情上受到感染、教育和陶冶。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以语言为工具来塑造艺术形象的，虽然其具有形象的间接性，但它能多方面立体性地展示社会生活，甚至表现社会生活的发展过程，展示人与人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和人物的内心精神世界。

作家是生活造就的，作家又创作了文学。正如高尔基所说：“作家是一支笛子，生活里的种种智慧一通过它就变成音韵和谐的曲调了……作家也是时代精神手中的一支笔，一支由某位圣贤用来撰写艺术史册的笔……”因此，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也是社会生活的雕塑师。

文学作品是作家根据一定的立场、观点、社会理想和审美观念，从社会生活中选取一定的材料，经过提炼加工而后创作出来的。它既包含客观的现实生活，也包含作家主观的思想感情，因此，文学作品通过相应的表现形式，具有很强的承载性，这就是作品的具体内容。

文学简史主要指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这跟各国历史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历史的发展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时代背景，而文学的发展也形象地记录了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

总之，学习世界文学，就必须研究世界著名文学大师、著名

文学作品和文学发展历史，才能掌握世界文学概貌。

为此，我们综合了国内外最新的世界文学研究成果和文学发展概况，编撰了“世界文学知识大课堂”丛书。本套书系共计 20 册，包括《中国文学发展概论》、《中国文学大家》、《中国文学精品》、《世界古代文学发展概论》、《世界古代文学大家》、《世界古代文学精品》、《世界近代文学发展概论》、《世界现代文学发展概论》、《西欧现代文学大家》、《南北欧现代文学大家》、《中欧现代文学大家》、《俄苏现代文学大家》、《美洲现代文学大家》、《亚非现代文学大家》、《西欧现代文学精品》、《东南欧现代文学精品》、《中北欧现代文学精品》、《俄苏现代文学精品》、《美洲现代文学精品》、《亚非现代文学精品》。

本套书系内容全面具体，具有很强的资料性和系统性，是广大读者学习了解世界文学的良好读物，也是广大图书馆珍藏的良好版本。

本书由萧枫同志主编，参加编撰的还有宋涛、张林、李雪、胡元斌、窦俊平、廖海丽、聂丽、寻美琴、李娟、鹿清斌、王德雪、张立立等人，在此对他们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

目 录

张 仪	1
蔺相如	4
范 雎	8
张 騫	11
王昭君	14
鲁 肃	18
文成公主	21
郑 和	25
本杰明·富兰克林	28
塔列朗	31
詹姆斯·门罗	34
乔治·坎宁	38
穆罕默德·阿里	41
克雷门斯·梅特涅	45
亚历山大·戈尔恰科夫	48
亨利·帕麦斯顿	53
本杰明·迪斯累利	57
卡米洛·加富尔	61
俾斯麦	66
郭嵩焘	70
乔治·克利孟梭	75
孟尼利克二世	78
伍德罗·威尔逊	81
穆斯塔法·基马尔	84

富兰克林·罗斯福	87
威廉二世	89
顾维钧	93
马赫穆德·塔尔齐	98
莫洛托夫	102
夏尔·戴高乐	105
哈里·霍普金斯	108
宋庆龄	112
周恩来	116
陈 毅	118
邓小平	121
理查德·尼克松	125
乔冠华	129
维利·勃兰特	133
罗纳德·里根	137

张 仪

张仪是战国中期著名的纵横家，他和苏秦都在鬼谷子门下学习游说之术，苏秦自己承认，能力不及张仪。张仪全靠一只舌头游说四方，求取功名。秦惠王九年（公元前 329 年），张仪由于苏秦之计入秦，代公孙衍为大良造。秦惠王请公子华和张仪围攻魏国蒲阳（今山西省蒲县）。夺取该城之后，张仪乘机建议秦王把蒲阳城归还给魏国，并且派公子繇到魏国做人质，与魏修好。

秦惠文王三年（公元前 322 年），张仪假装辞去秦相，投奔魏国。目的是让魏国带头归顺秦国，再让其他各国效法它，以达到连横战略之目的。但魏襄王不肯听张仪的。秦王一怒之下攻下了魏国的曲沃（今山西曲沃）和平周（今山西省介休县西）。私下里更加厚待张仪。公元前 319 年魏襄王死，哀王立。张仪又劝哀王尊秦，哀王仍不听。张仪就暗中通知秦国再攻魏国。魏军大败。第二年，齐国在观津（今河北省武邑县东南）打败了魏军。秦准备再进攻魏，先打败了韩国申差，斩杀韩国官兵八万人，各国震恐。张仪乘机游说魏哀王。

张仪这一通威胁利诱又打又拉的说辩，把个魏哀王说动了心，再不顾六国合纵抗秦的事了，就通过张仪跟秦国和好。张仪完成了分化魏国的目的，辞去魏相职务，重新回到秦国当相国了。

秦惠文王十二年（公元前 313 年），秦国想进攻齐国，而当时齐楚仍为合纵联盟，秦王就派张仪到楚国去做策反工作。楚怀王听说张仪来了，空出高级宾馆，亲自送他去住宿。楚怀王把相印授给张仪，又赠送大量财物，立即与齐断绝关系，派人跟随张仪到秦国接受土地去了。

张仪回到秦国，假装登车时没有拉住绳索从车上掉下来摔伤

了腿，三个月不上朝，更不提割地之事。昏庸的楚怀王听说了，心想，大概张仪认为我与齐断交还不很坚决吧。就派勇士奉符节（使节凭证）到齐国去辱骂齐王，齐王大怒，折断了符节，忍气与秦国建交。秦齐两国建交后，张仪才去上朝，毫不脸红地对楚国使者说：“我自己有六里封地，愿意献给楚王。”楚国使者很惊讶说：“我受国王之命，前来接收商於六百里土地，不曾说是六里。”回国报告给楚王。楚怀王一怒之下，派将军屈匄出兵进攻秦国。因秦齐已建交，两国共同反攻楚军，斩首八万，杀了屈匄，夺取丹阳（今陕西、河南两省的丹江以北）和汉中（今陕西省南部和湖北省西北角）之地。楚王又增兵袭击秦国，在蓝田（今陕西省蓝田县西）大战，楚军大败，方圆六百里土地为秦所有，楚国只好割让汉中郡跟秦国讲和。

秦国乘机要挟楚国，想用武关外的土地交换楚国黔中（今湖北省西南部、湖南省西北部、贵州省东北角和四川省黔江流域）地区。楚王恨透了张仪，说：“我不愿交换土地，只要秦国肯交出张仪，我就献出黔中地区。”秦王觉得拿一个张仪换来大片土地是很合算的，想送张仪，却不忍开口。没想到张仪竟然请求去楚国。秦惠文王说：“楚王恼恨你背弃奉送商於之地的诺言，你不是去送死吗？”张仪却很自信，说：“秦强楚弱，我奉大王符节出使楚国，楚王怎敢杀我。如果楚王杀死我，秦国因此换得黔中之地，这正是我的最大愿望。”张仪使楚，通过好友、楚国大夫靳尚收买了楚王夫人郑袖，郑袖在楚王面前白天黑夜地劝说：“臣子各为其主服务，秦国派张仪来是尊重大王的表现。大王不以礼相待，却要杀死来使。秦王一定大怒，出兵攻打楚国。求大王把我们母子迁到江南去吧，以免遭受残害。”怀王闻听，后悔不已，连忙赦免了张仪，并像上次一样优厚地款待他。张仪又乘机用人质、美女、土地拉拢劝说楚王：“秦楚相连，本应是亲近的邻邦。大王如能听我的意见，我就会让秦国太子到楚国做人质，楚国太子也到秦国做人质，秦国美女送给大王作姬妾，送给大王居民万户的都邑，两国长久为兄弟，一辈子互不攻伐，没有比这更好的谋略了。”楚怀王不顾屈原劝谏，又一次答应了张仪。

接着，张仪又用又打又拉威胁利诱的手段，说服了韩、齐、赵、燕，其“连横”谋略接连取得成功，使秦更加强大，加速了秦统一中国的历史进程。

张仪自己曾说自己不如苏秦，太史公司马迁评论说：“张仪的所作所为超过了苏秦。这两个人都是货真价实的险诈策士。”

蔺相如

蔺相如，战国时期赵国人，生卒年月无考。他因为赵惠文王出使秦国，“完璧归赵”；“渑池之会”使赵惠文王免受秦王之辱，从而功盖赵国，深得赵惠文王信赖，被拜为上卿，成为赵国贤能的宰相。他一生的智慧和业绩已演变成为历史典故和成语，为后人所赞美和传颂。

赵惠文王时，赵国得到了楚国一块价值连城的“和氏璧”。这件事被秦昭王知道了，他就派出使臣带了一封信给赵王，提出愿以秦的十五座城换取“和氏璧”。不过，秦昭王的出价并不是真心的，他既想白白得到这个传世珍宝，又想以此为借口，试探一下赵国，以达进一步侵略之目的。

赵惠文王看出了秦昭王的图谋，就召集大将军廉颇等诸大臣商量对策。计议结果认为：如果同意秦昭王的要求，把璧送去，恐怕秦不会真正让出十五座城，白受欺辱；如不同意吧，秦国肯定借口出兵来打。因为想不出一个好的计策，所以想派个人出使秦国，但谁也不愿去。

赵惠文王十六年（前 283 年），蔺相如受命出使秦国。秦昭王很傲慢，他恃强凌弱，不把赵国派来的使臣看在眼里。他故意不按接见使节的常规在宫廷里以礼接待蔺相如，而是在一个游乐的地方——章台上会见，而且两边还坐着歌舞女，态度极不严肃。蔺相如看在眼里，气在心中。但又无可奈何，只好先将玉璧呈递给秦王。不想秦王接过璧后，视若儿戏，随手把玉璧交给美女们传看，并哈哈大笑，左右则高呼万岁。相如等了好一会儿，秦昭王仍只字不提交城的事。相如心里明白了，秦王根本无意交城，当即心生一计，趋步上前对秦王说：“玉璧有瑕疵，请让我指点给大王看。”秦昭王不知是计，即把璧递给相如。相如接过

璧，快步退到台柱旁边，气愤之极，怒发冲冠，对秦王说：“大王欲得璧，使人发书至赵王，赵王悉召群臣议，皆曰：‘秦贪，负其强，以空言求璧，偿城恐不可得。’议不欲予秦璧。臣以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况大国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强秦之欢，不可。于是赵王乃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书于庭。何者？严大国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见臣列观（普通地方），礼节甚倨（傲慢）；得璧，传之美人，以戏弄臣。臣观大王无意偿赵王城邑，故臣复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头今与璧俱碎于柱矣！”并以目视柱，表示立即要碰过去。

秦昭王被蔺相如突如其来的举动和大义凛然的言辞震住了，他怕蔺相如与璧同归于尽，赶忙改变态度，和颜悦色地请相如不要那样，并立即让掌图籍的官拿来地图，装模作样地在地图上指指点点，划出了十五座城给予赵国。蔺相如心里明白，这是秦昭王为了得璧玩弄的又一个欺诈花招，地图上划给赵，实际是不会给赵的。蔺相如为了稳住秦王，不把事情弄僵，于是不直言点破，而是换了一种策略。他对秦王说：“和氏璧，天下之共传宝也。赵王恐，不敢不献。赵王送璧时，斋戒五日，今大王亦应斋戒五日，设九宾于廷（朝廷正殿），臣乃敢上璧。”秦王思虑了半天，不敢强夺，无可奈何，只得答应相如的要求，并把相如安置到设备高级的广成宾馆住下。

蔺相如预料到秦王虽答应斋戒，但他在和氏璧到手后，一定会推翻约定，不交城池给赵王。因此悄悄地派跟随来的手下人，穿着麻布短衫，打扮成秦国平民，怀里藏着和氏璧，从小路上逃回赵国去了。

秦昭王恃强傲慢而自负，所以，他料不到蔺相如的才智。于是他乖乖地斋戒了五日，并以极其隆重的仪式，设九宾于宫廷正殿，请蔺相如上殿献璧，满以为自己将要如愿以偿。结果又落了一场空。

蔺相如智高一筹，勇冠秦廷，终于不辱使命，“完璧归赵”。

赵惠文王二十年（前 279 年），秦昭王又玩弄花招，派出使臣到赵国送信，提出愿与赵王在渑池（今河南渑池西）修好相

会。赵惠文王害怕秦国，打算不去。蔺相如和廉颇都献计说：“大王如果不去，表示赵国软弱而胆怯。”赵王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并决定让蔺相如同去渑池与秦昭王会见。行前，蔺相如与廉颇等人做了充分准备，在边境设了重兵，以防秦国突然袭击和变故。廉颇又送赵王与蔺相如到边境，对赵王诀别说：“大王此去路程加相会礼节等，最多三十天。如果过了三十日还不回，就请立太子为王，以断绝秦的希望。”赵王表示同意。于是带着蔺相如等随臣到渑池与秦昭王相会。

会间，在一次酒席宴上，秦昭王想借着酒兴污辱赵惠文王，他说：“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作为一国之王，在会盟的宴席上为另一国王操琴作乐，显然是很不光彩的。可是赵王因怕秦强，竟忍辱鼓瑟。此时，秦王让事前安排好的史官上前记录：“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请求变成了命令，这显然是秦王想凌辱对方来炫耀自己在外交上的胜利。站在赵王身边的蔺相如看出秦王的用意，便采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策略，毅然上前对秦王说：“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奉盆缶秦王，以相娱乐。”秦王不仅不干，而且大发怒气。相如毫不退让，马上拿起一只盛酒的瓦盆（即缶，秦地民间也以此作乐器）跪在秦王跟前，定要秦王击打，秦王不肯打。相如说：“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此时，秦王的左右将士拔出刀来，想杀相如，相如不仅毫无惧色，而且瞪大眼睛，龇牙怒视，把这帮人竟吓得倒退。在此情况下，秦王无法，只好很不乐意地用筷子击打了一下酒缶。蔺相如立即召唤赵国的御史记下：“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缶。”此时，秦国的大臣又蛮横地提出：“请以赵十五城为秦王寿。”蔺相如亦不示弱，针锋相对地说：“请以秦之咸阳（秦的国都，今陕西咸阳市）为赵王寿。”双方相持不让，直到酒席结束，秦王也没占到赵王的什么便宜。因为赵在军事上亦做了充分准备，所以秦也不敢有别的举动。

在这场双方实力不等的面对面的外交斗争中，蔺相如以其超人的机警灵活和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折服秦王及其臣属，为赵惠文王在渑池之会中，不受强秦之辱，取得了一次以弱胜强的外交

上的大胜利。

蔺相如渑池会盟归国之后，赵惠文王因他功劳大，拜他为上卿，位在廉颇之上。廉颇认为自己是赵国的大将军，攻城守土，东征西战，功劳最大，而蔺相如只有口说舌动之劳，且出身贫贱，现在官位竟比自己高。因此表示不服，不能容忍。他扬言：“我见相如，必辱之。”

蔺相如的博大胸怀不仅使手下人折服，而且廉颇知道其心意后，也为之感动。他脱去上衣，光着脊梁，背着荆条，亲自到蔺相如府第登门谢罪。他对相如说：“我这个鄙贱的人，不知道将军你胸怀如此宽广呀。”

对于廉颇将军的负荆请罪，登门检讨，蔺相如也很感动，报之以诚心。结果两人都非常高兴，不仅和好如初，而且彼此结为同生死、共患难的好朋友。后人以此为依据，写出了激励人们相互团结、共同对敌的不朽名剧——《将相和》。

范 睢

范睢是战国时魏国人（一说为楚国人），家境贫穷。想游说诸侯，谋求官职，却没有钱，就先为魏中大夫须贾当家臣（当时大夫分上、中、下三级）。

秦昭王三十七年（公元前 270 年），范睢跟随中大夫须贾出使于齐。齐襄王见范睢善于说辩，有才能，就派人赏给范睢十斤黄金和牛酒。回到魏国以后，须贾把这件事报告了魏国宰相，即魏公子魏齐。魏齐大怒，立即命家臣拷打范睢，打断了肋骨，打落了牙齿，范睢血流满面，遍体鳞伤。范睢在难忍之时仍然想到怎样脱身，于是假装死去。魏齐让人用苇席把他卷起来，扔到厕所里。宾客们喝醉了酒，往他身上撒尿，故意侮辱他，以警戒他人，让他们看看里通外国的下场。范睢在苇席里对看守说：“您如果能放我出去，我一定重重地感谢您。”看守贪利，让他继续装死，然后跑到魏齐那里，请求把尸体扔出去。魏齐醉醺醺地说：“把他扔到郊外去，让老鹰把他的肉叼吃了。”范睢这才得以脱身。过后魏齐后悔了，怀疑他是否真的死了，派人四处寻找。至范睢家见全家举哀带孝，知道是真死了，才放心。而范睢却在好友郑安平保护下逃跑了，范睢改名张禄，躲躲藏藏。

恰在这时，秦昭襄王嬴稷（公元前 306 年～前 251 年在位）派谒者（官名，春秋时设置，战国时期专管为国君行使传达之事）王稽到魏国来。郑安平假扮勤务兵到公馆伺候王稽。王稽问道：“魏国有没有贤人愿意跟我到西方去游历？”郑安平说：“我的家乡有个叫张禄的先生，愿意见您，陈述天下大事。但此人在魏国有仇人，不敢白天露面。”王稽说：“晚上你和他一起来。”郑安平晚上同范睢去见王稽。话没谈完，王稽就知道范睢是一位贤才，就说：“等我公务办完，你在我归途中的三亭（山岗名，

在今河南省尉氏县西南) 南边无人处等我。”

王稽辞别魏王，驱车至三亭岗，到了约定地点，范雎、郑安平上车，同车前往秦国。王稽一行到了湖地（函谷关西侧今河南省灵宝县境内），看见西边来了大队车马。范雎说：“那边来的人是谁？”王稽说：“是秦国宰相穰侯到东部县邑巡视。”范雎说：“我听说穰侯独揽秦国朝政大权，妒贤嫉能，厌恶诸侯宾客，恐怕他会侮辱我，我暂且藏到车箱里躲避一下。”过了一会儿，穰侯果然来了，他和王稽下车相见施礼，慰问王稽，两人在车前交谈，穰侯问：“关东（函谷关以东）有什么新闻吗？”王稽说：“没有。”穰侯看了看车中又说：“谒者先生没有和诸侯游士说客一起来吧！这类人没什么用处，只会在别国制造混乱。”王稽说：“不敢。”穰侯就走了。范雎说：“我听说穰侯是个十分聪明的人，只是遇事反应慢。刚才他怀疑车里有外来人，只是看了一眼，没有来搜查。”一边跳下车步行，一边说：“过一会儿，他肯定会后悔。”就自己躲着道走，王稽仍坐在车上。走了十来里，穰侯果然派骑兵返回来，把车子搜查一遍。见无外人，才算罢了。范雎这才和王稽、郑安平进入秦都咸阳（今陕西咸阳）。

到了秦昭王三十六年（公元前 271 年），秦国已经向南攻占楚都鄢郢（今湖北宜城县南），向东，打败了齐国。多次困扰三晋（韩、赵、魏）。穰侯为了扩大自己在陶（在今山东定陶县西北）的封地，准备率军越过韩、魏去攻打齐国纲邑和寿邑（纲，亦作刚，在今山东省宁阳县北；寿，在今山东东平县西南）。范雎在这时上书秦昭襄王恳求接见。信中最后说：“如果我见了你说的话有一句没用，愿受死刑。”

秦昭襄王早就把张禄忘了，看了信，十分高兴，就告诉王稽，让他用专车去接范雎。

范雎对昭襄王说：齐湣王在位时，派兵越过邻国去攻打远方的楚国，打败楚军，斩杀楚将，一举攻下楚国千里之地。但最后一寸土地也没有得到。原因就是齐的策略错误。齐国越过邻国进攻远方的楚国，军队疲劳，消耗太大，距离又远，得了地盘也没法保住。别的国家见齐国劳师袭远，国力衰弱，就乘机抄他的后

路，大败齐国。齐国夺得的楚地最终都被韩、魏两国占去了。这不等于借兵给盗贼，送粮草给偷粮贼吗？

然后，范雎又说：“您应该接受齐渭王的教训，采取远交而近攻的策略，结交离秦国远的国家，征服近邻国家。这样，扩大土地一寸是一寸，一尺是一尺，谁也夺不走。现在，您却放弃邻近国家，到远处去进攻，不是太荒谬了吗？韩国和魏国地处中原地带，是沟通天下的枢纽。您如果想成就霸业，一定要先控制韩、魏两国，以此威胁远方的楚、赵两国。要达到这一目的，应该先结交楚国和赵国。楚国、赵国依附了秦国，齐国一定恐惧，这时再和齐国交好。邻近的韩国和魏国就不成问题了。”

秦王很赞赏范雎的策略，就任命他作客卿，专门计议对外军事行动。按范雎之计，先攻魏国，攻下了怀城（今河南省武陟县西南）。两年后，攻下了邢丘（今河南省温县东平阜旧城）。秦昭襄王四十一年（公元前 266 年），昭襄王把应（今河南省鲁山县东）地封给范雎，号为应侯，取代了穰侯的相位。公元前 265 年，秦又向东进攻韩国。

在昭襄王四十七年（公元前 260 年），秦国发兵攻打赵国，围攻长平（今山西省高平西北），赵国派老将廉颇率军抵抗。廉颇实施坚守防御、避敌锐气的正确方针，坚壁不战，以逸待劳，疲惫秦军。赵王以为廉颇怯敌，多次责备他，催他出战，廉颇却按兵不动。

范雎乘机施反间计，派人用千金（一金为黄金二十小两）买通赵国人，让他们散布流言，说：“廉颇容易战胜，他很快就要投降了。秦国最怕的是赵奢的儿子赵括来指挥赵军。”赵孝成王本来就认为廉颇坚守不战，有失国威，听到谣言，果然中计，下令派赵括去接替廉颇。结果赵军在长平之战中全军覆没。

范雎一生，事秦昭襄王，他的谋略，大都是很成功的，这为秦朝的统一大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并且，范雎又是能伸能屈的大丈夫，不因受困而丧志，反忍辱而激发，不因功成而自负，反而能激流勇退，推贤让位，是战国谋臣、策士中的杰出代表。

张 骞

西汉时期，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强大起来，占据了北方广大的领土。它不仅阻断了汉朝与西域的交通，而且对汉王朝构成严重的威胁。汉武帝决定派使去联合西边的大月氏人，东西夹击匈奴，一举消除匈奴势力。这时，汉中成固人、郎官（皇帝侍从、低级官职）张骞（？～公元前114）慨然应募。汉武帝喜出望外，立刻派他率领熟悉道路的胡人甘父（堂邑氏奴仆）和百十名随从，持汉节（一种出使凭证，用竹杖和羽毛、牛尾等饰物制成），带大量礼物去出使大月氏。于是中国历史上有确凿记载的第一次外交远征开始了。

公元前139年，他们从首都长安悄然出发了。不幸的是，出发不久，他们就被匈奴骑兵掠去，出使的前途霎时暗淡了。

驿车在崎岖坎坷的小路上辗转前行，张骞一行人在饱受颠簸之苦后被带上匈奴王庭。傲慢的军臣单于问张骞去向，张骞据实以对。单于狡黠地反问说：“大月氏在我的北面（实为西面）汉朝使者怎能穿过我的领土到那里出使呢？如果我要穿过汉朝领土到南越（五岭以南地区）去，汉人能允许吗？”随后，就把张骞一行全部扣留、软禁起来。

在被软禁的十年里，为了改变他的志向，单于强迫张骞娶胡人为妻，建立家庭，并有了孩子，但是张骞时时不忘重任，手持汉节从未失落，暗中寻找契机。

机会终于来到了。公元前129年（元光六年），趁胡人监视有所懈怠之机，张骞毅然诀别妻儿，带领部分随从，胡服胡马悄悄逃离匈奴。

张骞并未朝向西南方，望着手中的汉节，他毅然向西奔去。他们取道车师，进入焉耆，然后溯塔里木河西行，过龟兹疏勒

(喀什)，然后翻越葱岭，来到大宛（今苏联费尔干纳盆地）。这是一段极艰险的旅程。戈壁滩上时而烈日炎炎，地表温度达五、六十度；时而狂风骤至，飞沙走石。葱岭却又是冰封雪盖、突兀高耸。加上他们是匆匆潜逃，粮尽水绝，只能靠甘父射猎充饥。但还是有不少人倒在沙海深处，永远留恨于出使的征途中。

公元前128年（元朔元年）张骞决定动身返国。越过葱岭后，为了避免匈奴，他们没走来时的道路（北道），而是沿昆仑山北麓，经莎车、于阗（新疆和田）、鄯善（新疆若羌）东行（今所谓南道）。不料，进入羌人居住区时，又被匈奴扣留。

前126年，军臣单于死，匈奴内乱，汉军又屡败匈奴军队。趁混乱之机，张骞带着妻子和甘父离开匈奴，回到汉朝。出发时的随从人员共近百人，然而，仅张骞、甘父二人侥幸生还。

从西南出使西域受挫后，汉武帝加强了对匈奴的攻势。前121年（元狩二年），张骞率军击匈奴，因贻误战机，被废为庶人。但武帝仍把他留在朝廷，经常问及西域诸国情况。

这一年，骠骑将军霍去病两次大败匈奴军队，浑邪王带数万人投降汉朝。汉在河西走廊设置了武威、张掖、敦煌四郡，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打通了。机不可失，张骞又开始了他的第二次西域之行。

前119年（元狩四年），张骞被任命为中郎将，率领副使、随从三百多人，每人备马两匹，共携带价值百万的丝绸、宝玉及特产，驱赶着上万头牛羊，从长安出发，浩浩荡荡，向西域进发。这是一个规模庞大、规格高级的外交使团，又是一个大规模的贸易商队。由于河西走廊已在汉控制之下，他们顺利到达了乌孙，但其时乌孙国王廷内部正为王位继承问题闹得矛盾重重，剑拔弩张，无意东顾。大臣们也因为新居水草肥美，物产丰饶，又不了解汉的强盛，无心东迁。乌孙王只是表示愿意和汉建立友好关系，建立联盟。但共击匈奴的决策却迟迟不定。于是，张骞分遣十几名副使，各带人马礼物，分别出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及安息、身毒等国，建立广泛的外交联系和贸易关系。

公元前115年（元鼎二年），张骞返回汉朝。启程时，乌孙

王特派了翻译、向导和几十名使者一路护送，并带几十匹良马作礼物回报。

张骞劳苦功高，拜为大行令（管理各民族事务和外交的最高长官），位列九卿。前 114 年（元鼎三年），张骞终因长年奔波，积劳成疾，病逝于长安。

张骞开创了汉朝同西域各国的外交事业，丝绸之路作为东西方友谊的纽带，在他死后仍在延伸，东西方的人们永远都会记住这个勇敢的开路人！

王昭君

王昭君，原名嫀，湖北秭归人，是中国四大美人之一。

昭君自幼貌美惊人，四乡八邻慕名前来王家瞻看的人流络绎不绝，摩肩接踵。

汉元帝继位，旋即颁下诏令在民间广泛搜罗美女，充实后宫。

一幕幕家庭悲剧上演了，妻离儿散，惨不忍睹。

求婚不遂耿耿于怀者，趁机报复，从中作梗，向官府密告，17岁的王昭君不幸被选入宫。

王昭君与父亲王穰，洒泪而别，坐上了驶往京城的马车。

汉元帝竟宁元年，匈奴汗国呼韩邪单于栾提稽侯（左犬右册），率领大批人马，缓缓抵达边界五原要塞（今内蒙古包头市），派人进关，表示愿意呈献国宝，并于明年正月，前往首都长安，朝见汉元帝。这实际上便是向汉皇朝表示投降。

呼韩邪单于向汉元帝呈献国宝等丰盛贡品后，跪倒玉阶之下，请求说：“吾愿娶汉公主和亲，永远称臣，乞望吾皇恩准。”

汉元帝慷慨允诺：“朕恩准，并择日赐你与公主完婚，望你永远记君恩，忠于朕，忠于大汉朝廷。”

退朝回至后宫，汉元帝呼来大监，诏令：“看看宫中彩女，谁愿意去匈奴，朕就当她是公主看待。”

王昭君虽然身居深宫，但对于汉匈两族关系，还是了如指掌的，她有自己的一套想法。

呼韩邪单于求亲的消息传来，满腹愁怨的王昭君为了寻求个人生活，摆脱孤独寂寞的后宫生活，她毫不犹豫地主动找到管事太监，表示愿意前往匈奴，扮演一个“和亲使者”的角色。

由此可见，三年间王昭君内心的幽怨与愤懑的程度，与其幽

居深宫，终老一生，不如抓住机会，跳出这一阴森可怕的皇宫后院。远嫁匈奴虽然难以想像的可怕，但总比一辈子闷在这汉家宫阙中好得多。

汉元帝闻报宫女王嫱主动请缨出塞，龙颜大悦，没有见面便允诺加封她为昭君公主，并且吩咐太监总管准备丰厚嫁妆，选择良辰吉日，为呼韩邪单于和王昭君完婚、送行。

呼韩邪单于和王昭君大婚之日，汉元帝在宫中筵开数百席，大肆庆祝。

酒过三巡，呼韩邪单于一手牵着王昭君，来到汉元帝的跟前双双跪下，拜谢君恩。

汉元帝不禁看呆了眼，他没想到王昭君竟是个如此芳容绝代的女子，后悔莫及，心中不舍，但皇帝开金口，覆水难收。如今木已成舟，无法挽回，惟有破例地搀起王昭君，慈父一样握住她的柔滑纤手，久久不愿松开。

参加喜宴的文武百官，亦无不为王昭君的美色倾倒，皆啧啧称美。

传说汉元帝回到内宫，越想越懊恼，他再叫人从宫女的画像中拿出王昭君的像来看。模样虽然有点像，但完全没有王昭君真人那样可爱。

汉元帝仔细一想，问题肯定出在画家毛延寿的身上了，一定是他欺君！汉元帝一气之下，把毛延寿杀了。

再说呼韩邪单于欢欢喜喜地谢过汉元帝厚恩，携上娇妻王昭君离京城返回漠北。

王昭君随同呼韩邪一行，在汉宫韩昌和匈奴官员的护送下，离开京城，离开栖身数载的深宫大院，真有鸟儿逃出鸟笼的感觉。

送亲的队伍长途跋涉，经过汉朝的左冯翊（今陕西西安）、北地（今甘肃庆阳）、上郡（今陕西榆林）、西河（今内蒙古东胜）、朔方（今内蒙古杭锦旗）、五原（今内蒙古包头）等地。

这时，王昭君头戴红肯兜（即后人所称的“昭君”套），身穿红斗篷，骑着白马，怀抱心爱的琵琶，冒着刺骨的寒风，一路

上见到的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塞外大草原风光。

队伍缓缓而行，王昭君望着愈来愈近的单于廷，一种难以言说的愁绪涌上了心头。

世人哪里知道，昭君出塞离京之时，是根本不会唱什么幽怨的《出塞曲》的，她只会欢快地歌唱，庆幸自己脱离皇宫大院，庆幸自己能够重获自由。只是当她到达匈奴中部的单于廷后，面对无边无际的大草原，她才触景生情，愁绪万千，弹唱幽愁苦怨的《出塞曲》的。

王昭君终于到达了夫君的国度。

在恢宏、霸气的大帐里，呼韩邪单于加封王昭君为“宁胡阏氏”（匈奴称妻为阏氏），即匈奴王后。

从此，王昭君开始了她住穹庐（即毡制帐幕），披毡裘，食畜肉，饮乳酪的塞外游牧生活。

聪明伶俐而又性格坚毅的王昭君，慢慢适应了匈奴族的生活方式。

善良勤劳的王昭君，把汉朝的文化介绍给匈奴人，匈奴人都很喜欢她，尊敬她。

呼韩邪单于在汉朝的支持下，结束了匈奴 20 余年以来的分裂状态，统一和安定了匈奴政治的混乱局面，他的成就，与王昭君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

呼韩邪单于在王昭君的影响下，开辟了我国北部少数民族地方政权接受汉朝中央领导的先河，促成了塞北与中原的统一，匈奴与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汉匈关系和平友好，关市畅通，开创了汉匈两族团结合作的新局面。

王昭君与呼韩邪单于婚后一年多便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伊屠知牙师。呼韩邪死后，大阏氏所生的雕陶莫皋继位，号复株累单于。

按照匈奴“父死妻其后母（生母除外）”的习俗，王昭君会被她丈夫的儿子或者兄弟继承为妻妾，使她不能脱离夫家的氏族共同体。

王昭君左右为难，便上书汉成帝要求归汉。

汉成帝却敕令她“从胡俗”。

接到成帝的敕令后，王昭君体会到汉朝的用意，尽管她思念故土，思念亲人，还是打消了归汉的念头，忍受了“子蒸其母”（虽然不是亲子）的委屈，再嫁给了复株累单于雕陶莫皋。

此后，王昭君又与复株累单于雕陶莫皋生了两个女儿，长女名云，后嫁给右骨都侯须卜当，称须卜居次（即须卜公主）；次女嫁给当于氏，故称当于居次。

王昭君的儿子伊屠知牙师做了匈奴的右日逐王。

岁月无情，王昭君老死在异乡匈奴，始终不能叶落归根。至于她死于何年何地，史书上没有记载，只记述说她死后被埋葬在河套以北的阴山与黄河之间。

昭君出塞带来了北方边境两族人民的安居乐业，后人为了纪念王昭君，在内蒙古地区修建了十几个昭君墓。

传说昭君墓附近都是无边无际的黄沙，惟有她的墓头上青草碧绿。

著名杜甫曾著诗凭吊：“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而在伊克盟北部的黄河岸上，也有昭君墓，据说是衣冠冢。

王昭君这个平凡的民女，在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她的出塞和番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

鲁 肃

鲁肃（172～217年），字子敬，临淮东城（今安徽定远东南）人，出身大地主。家中富裕，却好施与。汉末天下大乱，鲁肃不治家事，却学击剑骑射，结交豪杰。并卖掉田产，大散财货，赈济穷人，深得乡邻的欢心。招聚一些年轻人，给他们衣食，往来山中射猎，偷偷组织队伍，讲武习兵。当时，周瑜驻军居巢（今安徽巢县），有一次率数百人路过鲁肃家，要求他资助军粮。鲁肃家有两个大仓库，每个仓里屯米三千斛。他指着其中一个大仓库，全部送给周瑜。周瑜更深知他是个奇才，二人遂成为好友。周瑜后来向孙权推荐鲁肃说：“肃才宜佐时，当广求其比，以成功业，不可令去也。”

鲁肃是孙权领导集团中仅次于周瑜的重要谋臣，体貌魁梧雄壮，少有大志，好为奇计。孙权和陆逊在一起评论鲁肃时说，周公瑾把鲁子敬推荐给我，与我交谈天下大事，纵论建立帝王之业的战略，真是一件快事。当曹操率数十万大军向我进攻时，唯独鲁肃力排众议，提出联刘抗曹战略。鲁肃的计谋策略，比昔日的张仪苏秦更胜一筹。《三国志》详论鲁肃的谋略建树时，说他“建独断之明，出众人之表，实奇才也。”

孙权与鲁肃会见，二人谈得很投机。孙权宾客退去，鲁肃也告辞。而孙权却单独把鲁肃叫回来，与之秘密商议建立帝业的大事，他说：“如今汉朝政权衰微，四方混战，我继承父兄余业，很想像春秋战国时齐桓公、晋文公那样建立霸业，君既惠顾，该怎样辅佐我呢？”鲁肃回答说：“从前汉高祖刘邦本想拥立义帝，但没有实现，原因是项羽反对。现在的曹操，就像从前的项羽。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能效法齐桓公晋文公成为霸主呢？依我之见，汉王朝是不可能复兴了，而曹操也不可能一下子被打败。为

您谋划，自己也无什么可忧虑的，为什么？因曹操在北方无暇南顾。我们则可以先消灭黄祖，再进攻荆州的刘表，将长江上下据为己有，然后称帝王，图天下，建立汉高祖那样的帝业。”孙权很高兴鲁肃的战略构想，更加看重鲁肃。

鲁肃这一联刘抗曹的战略构想，是建立在对当时各种政治力量深刻认识基础上的。曹操拥兵百万，实力雄厚，吴之实力确实不能与之争强。只有成鼎足之势，才能发展自己的力量，免遭曹操吞并。而后，在天下变动时，乘机图谋进取，问鼎中原，建帝王之业。因此，孙权对鲁肃的谋略很赞同，派他去荆州。

鲁肃到达夏口（今湖北汉口）时，果然曹操已领兵昼夜兼程进攻荆州，刘表次子刘琮已投降曹操。而刘备正惶惶然向南逃跑准备过江。鲁肃直接到当阳长坂（今湖北当阳境内）去会见刘备，说明孙权意图（实际是鲁肃的谋略），陈述江东仍有强大实力，劝说刘备与东吴合作，共同对抗曹操。刘备很高兴这一战略构想，随同鲁肃到了夏口，开始联吴抗曹谋略的实施。

曹操占领襄阳后，日夜兼程，又占领南郡（今湖北省江陵），并有东进之意。孙权大惊，连忙和部属商议对策。诸将都说应该欢迎曹操，实际上是要投降曹操，唯独鲁肃一言不发，孙权知道鲁肃的意思，拉着他的手说：“卿欲何言？”鲁肃说：“刚才众人那些意见，都只能误您的大事，无法和这些人讨论大业。我鲁肃可以归降曹操，而你却不能。为什么这样说呢？我鲁肃迎曹，他会让我返回故里，给我一个官职，按名分，起码也不低于从事（参谋官），乘牛车，跟随有吏卒（随从），交结士大夫，步步高升，将来可以当上州长，郡长。而您迎曹，他怎么安排你呢？希望你早下决心，不要采纳他们的建议。”孙权叹息说：“诸将之建议，让我非常失望。您的明智的分析，正和我的想法相同，这是上天让你来帮助我呀。”由于鲁肃的谋略，才最终有孙刘联军的赤壁大胜，确立了三国鼎立之势。

赤壁之战，实际上是曹、刘、孙争夺战略要地荆州的战争。赤壁之战后，曹操被迫撤出江陵。公元210年，刘备为了立足以图发展，亲自到京口见孙权，请求都督荆州并借荆州南郡。在是

否借荆州的问题上，鲁肃的谋略更比他人高明。周瑜极力反对，他说：“刘备是个枭雄，而且有关羽、张飞等熊虎之将辅佐，必然不会长久甘为他人所用。应当将他软禁起来，为他大筑宫室，用美女玩好消磨他的意志，把他同关羽、张飞分隔开来。然后挟制他，攻占他的地方，大事可成。如果现在再把土地借给他，使他们聚在一起，就好比蛟龙得云雨，终究不会困于水池之中。”吕范等人也劝孙权扣留刘备。只有鲁肃主张把荆州借给刘备，说：“曹操力量强大，是一个劲敌。目前我们刚占领荆州，恩信未洽，民心不一。把荆州借给刘备，使他安抚民心，又给曹操多树一个敌，使他在荆州为我们抵挡曹操，这是上策。”孙权采纳了鲁肃建议。曹操听说孙权借荆州给刘备的消息时，正在执笔书写文件，惊得半晌无言，手中的笔也掉在地上。可见，借荆州给刘备，既可分散曹操兵力，又可继续联合刘备抗拒曹操，在战略上，对曹是极大的不利。

任何谋略，都是为了一定的目的，一定的利益服务。鲁肃在辅佐孙权的过程中，其基本的战略是造成鼎足之势，稳住阵脚，观天下之变，待机发展。赤壁战后，鲁肃之所以力主借荆州给刘备，出发点仍然是为了造成大三角格局的总战略，借刘备之力，分曹操之势，使孙权立于不败之地。这个战略构想成为孙权终于在公元 229 年登上皇帝宝座的指导性长久性谋略。

鲁肃于建安公元 217 年去世，享年 46 岁。《吴书》说：鲁肃为人严谨，生活节俭；治军有方，令行禁止，虽在军中，手不释卷；又善谈论，思路开阔，有过人之明。东吴将领中，除周瑜之外，没人超过他。他一直坚持三分天下的战略谋划，并促成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

文成公主

中国历史上，女人出塞使各族关系修好的事，并不少见。在唐代，公主远嫁塞外，为两族和睦作出贡献的就有 15 人之多。而最为世人熟悉的莫过于汉藏两族和亲的典范——文成公主。

文成公主原是唐太宗一位李氏远亲的女儿，也算是宗室女。她从小受到诗书传家的熏陶，至豆蔻年华时，更出落得花容月貌，丽质天姿。加上聪明伶俐，博览群书，通晓音律。被唐太宗封为文成公主。

公元 7 世纪，在遥远的青藏高原上，剽悍的弃宗弄继承了吐蕃王位，当了赞普（国王），当地人称他为“松赞干布”。

松赞干布骁勇善战，带领着大军扫平了青藏高原的不少部落，建立了强大的高原王国，定都在逻些城（今拉萨）。

在此之前，吐蕃从未与中土打过交道，松赞干布自恃军力强大，觊觎着大唐中土的地大物博。贞观十四年，他率领着大军，挥师东征。

此时的唐朝国富兵强，面临外敌入侵，唐太宗不慌不忙，派遣侯君集督率精锐之师前往迎战，在边陲松州一场激战，将松赞干布打得落花流水。

松赞干布只好俯首称臣，对大唐的强盛赞美不已。

为了密切与唐朝的关系，松赞干布派遣使者来到大唐求婚。

唐太宗被松赞干布诚意感动，又想到吐蕃乃西域强邦，与吐蕃保持着友好的睦邻关系，方可确保大唐西南边陲的安宁，于是决定把文成公主嫁与松赞干布，下诏令让礼部尚书江夏郡王李道宗主婚，兼任持节护送文成公主，入吐蕃完婚。

文成公主虽闻知吐蕃各方面还很落后，但知道此行任重而道远，内心充满了复杂的矛盾，也充满了新奇的憧憬。

当时，吐蕃的生产力十分落后，许多地方还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阶段。唐太宗派官员了解到吐蕃的种植情况，在文成公主入吐蕃时，除了赠与极其丰厚的嫁妆外，还派了大批的能工巧匠、农技人员、乐师、文士等同行。那些人带去了大批生产工具、绢帛绫罗、器皿饰物、医疗器械、乐器、蔬菜种子以及经史、诗文、工艺、医药、历算等典籍。

自从派禄东赞前往长安求婚，松赞干布翘首以盼，听闻夙愿得偿，欣喜若狂，亲自率领吐蕃部众走了三日三夜，来到黄河源头附近的河源，以极其隆重的仪式来迎接大唐的送婚队伍。

贞观十五年（641），大唐送亲的车马队于正月从长安出发，取道青海，顶风冒雪，避过迷茫风沙，长途跋涉了一个多月，终于来到了黄河源头附近的札陵湖畔。

松赞干布连忙下山，率领部属上前亲迎。

送亲的大唐人马与迎亲的吐蕃队伍在青藏高原上接成长龙，朝着逻些城进发，队伍有近十里长。

沿途，吐蕃人民将欢迎文成公主到来作为最为隆重与盛大的节日。

藏历四月十五日，文成公主到达了逻些城。

种族不同，情心一片。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恩爱无比，相濡以沫。

松赞干布自知吐蕃许多地方都比大唐中土落后，经常向文成公主请教，征求她的意见，以便及时改进。

松赞干布常脱下皮裘，穿上文成公主替他缝制的丝质唐装，还努力向她学习汉语。

作为一位女性，文成公主知道自己在这幅员辽阔的国土中的角色，她没有权欲与私欲，所以，从来都不要求松赞干布给她什么官职，对国家大政，她只是根据唐宫的做法来提出自己的看法，供松赞干布来参考，更不会强行干涉。故此，松赞干布与满朝文武大臣对她都十分敬佩与诚服。

文成公主见到藏民都有“以赭涂面”的习惯（为追求美感，藏民用刀纹脸后再用红颜料在脸上着色），对松赞干布道：“我今

天见到你的族人赭面的情景，目睹他们刺面剧痛难忍的表情，觉得这种风俗太残忍野蛮，又不卫生，容易感染得病，在大唐中土就没有这种不好的习俗。”

松赞干布解释道：“这是我们族人的传统。”

文成公主道：“吐蕃要开化，就要摒弃陋习，引进新的文明。以赭涂面这残忍风俗早该摒弃了。”

松赞干布觉得文成公主所说有理，便马上颁下大令，废除赭面。

跟随着文成公主前来的大唐农技人员令吐蕃人眼界大开。他们将地划成方方块块，建造了灌溉系统，再把带来的种籽播下，高原的泥土十分肥沃，庄稼长势喜人。随后是施肥、除草、中耕……到了收获季节，望着累累的果实，吐蕃人惊呆了，纷纷请求汉人教授他们新的耕种技术。在进吐蕃之前，唐太宗已经给这些农技人员要传授带徒的任务。大唐的农技人员向藏民讲解汉族耕作的 24 个节令，教藏民们使用新农具、规划农田、改造水利。

先进的耕作技术，使吐蕃的粮食与其他作物产量大增。

大多数藏民告别了破旧的帐篷，搬进了新房屋。

文成公主在与尼泊尔公主谈话时曾经讲过：“世间诸工巧，妆饰与烹饪，耕稼纺织等，技艺亦相敌。”

随着文成公主的到来，大唐的建筑、服饰、烹饪、耕种、养蚕、造纸、酿酒等技术先后传进了吐蕃。吐蕃逐渐摆脱了贫困。

文成公主刚到吐蕃时，吐蕃没有文字。文化的滞后，阻碍了生产与经济的发展。在文成公主的劝告下，松赞干布下令大臣创造了藏文。

而那些随文成公主进吐蕃的大唐文士，将松赞干布与大臣们平日的讲话都记录下来，还帮助他们整理吐蕃历年的有关文献，协助他拟写文书公告，使吐蕃的政治文化从原始性走向正规化，开创了新的局面。

丈夫死后，文成公主继续在吐蕃生活了 30 年，教吐蕃族妇女纺织、刺绣与其他手工艺，深受吐蕃人民敬重，将她亲切地称为“阿姐甲莎”，即汉语的“阿姐”。

永隆元年（公元 680 年），文成公主在逻些城病逝，她在吐蕃一共生活了 40 年。

藏族人民无不感到极大的悲痛，到处为她建庙设祠，以志纪念。

后来，藏民还设立了两个节日来纪念文成公主：一个是藏历四月十五日，这是公主的进城日，名为“沙噶达瓦节”；另一个是藏历十月十五日，公主的诞辰。

那些随同着文成公主一起进藏的文士与能工巧匠由于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一直受到丰厚的礼遇，死后，纷纷被埋在文成公主墓地两侧作为陪葬。至今，文成公主和他们中的佼佼者，仍然被西藏人民视作神明来顶礼膜拜。

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的联姻，显示了汉藏人民的友好关系。

文成公主，成了汉藏两族友好情谊的化身，在中国的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郑和

郑和（1371～1434年）是云南昆阳（今云南省晋宁县昆阳镇）人，回族。本姓马，曾祖父叫拜颜，祖父、父亲都叫哈只。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郑和的父亲病故，抛下13岁的他和另外五个兄弟姐妹。

郑和本人除信奉伊斯兰教外，对佛教及民间崇奉的神，如东南沿海的海神天妃也并不排斥。据明初人的记载，郑和“身長九尺，腰大十围，四岳峻而鼻小……眉目分明，耳白过面；齿如编贝，行如虎步，声音洪亮。”真是仪表堂堂，气度非凡。

大概就在其父去世前不久，他入宫当了宦官。在宫中，皇帝后妃都叫他“三保奴”（或“三宝奴”），一般人都叫他三保。在靖难之役中，他跟随燕王征战有功，被提升为太监，赐姓郑。

郑和下“西洋”，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业绩，至今仍然家喻户晓，所谓“西洋”，是古人的地理概念，元朝时已有这样的叫法了。大体上以婆罗洲为界，婆罗洲以东的，称东洋，以西的，称西洋。郑和航海所经之地，大部分在婆罗洲以西，所以一般称“三保太监下西洋”。

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是永乐三年（1405年）七月到永乐五年（1407年）十月。他建造了不少大船，有的长44丈，宽18丈。这次首航，郑和率领将士27800余人，大海船208艘，船上有航海图、罗盘针。并带了大量金银钱钞。这支航行队伍航船的体积之大、设备之先进，在当时都是世界第一。郑和与副使太监王景弘从苏州刘家河（今江苏太仓东浏河镇）出发，泛海至福建，继由福建五虎门扬帆，首先抵达古战（越南南部），后历爪哇（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暹罗（泰国）、满刺加（马来半岛南端马六甲）、苏门答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南巫里（印度西

岸的Mabar)、古里(印度西岸的科泽科德)、锡兰(斯里兰卡)等国。他沿途宣读永乐皇帝的诏书,赏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力威慑。他还活捉了剽掠海上、横行无忌、原籍广东的海盗陈祖义,后被斩于京中市上,从此海道安宁。朱棣对这次远航非常满意,因为各国使者也随船来朝拜。朱棣一一赏赐,并对郑和等予以表彰。

永乐五年(1407年)十月至永乐七年(1409年)七八月间,郑和二下“西洋”,航行所至之地有占城、爪哇、南巫里、古里、柯枝(印度柯钦)、锡兰等国。永乐七年(1409年)十月至永乐九年(1411年)七月,郑和三下“西洋”。永乐十一年(1413年)十月至永乐十三年(1415年)八月,郑和四下“西洋”。这次超过印度以西,到达波斯湾,先后抵达溜山(马尔代夫)、忽鲁谟斯(波斯湾口Ormuz)等地。郑和的五下“西洋”,在永乐十五年(1417年)五月至永乐十七年(1419年)八月。先后到达阿丹(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亚丁)、麻林(肯尼亚马林迪)、木骨都束(索马里摩加迪沙)、卜刺哇(索马里布腊瓦)、刺撒(亚丁和佐法尔之间)。这次航行到达了遥远的非洲赤道以南东海岸一带。郑和返航时,满刺加、忽鲁谟斯、古里等19国的朝贡使者偕行,增强了明朝与这些国家的联系。郑和还带回了不少珍禽异兽,如狮子、金钱豹、大西马、驼鸡等。永乐十九年(1421年)春天,郑和再下“西洋”,次年九月归来。

郑和的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下“西洋”,开始于宣德六年(1431年)一月,到宣德八年(1433年)七月归来。相距第六次航行已经十年。这十年间,朝中政局发生很大变化。朱棣死后,郑和失去了靠山,只能在南京守备任内度过寂寞的岁月。仁宗朱高炽的去世,宣宗朱瞻基登位,执掌乾坤数年,却不见海外诸国来朝贡。他认为这未免是国威不张,有失面子,这才想起先朝老太监郑和。于是命令他和王景弘再下“西洋”。

郑和七下“西洋”,历时28年,所到之处,不下37国,南至爪哇,北抵麦加,西达赤道之南的非洲东岸。他是赤道非洲东海岸的头一个发现者,是世界航海史上杰出的先驱者。在世界航

海史上赫赫有名的大航海家迪亚士、哥伦布、达伽马，当他们在浩渺汪洋的惊涛骇浪中艰难地航行时，都比郑和的第一次下“西洋”要晚 80 年至 90 年以上。

郑和作为一名朝廷官员，一生中率领船队七次远航不仅促进了中外交流，更显示了当时中国航海事业的先进、发达，同时也显示了中国当时的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

本杰明·富兰克林

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年），美国著名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和科学家。他是研究电学的先驱者，是美国历史上启蒙运动的开创者，他生前撰写的《富兰克林自传》是一部传诵不绝、风靡欧美的文学经典，他在美利坚民族独立的伟大斗争中，特别是在争取国际援助的外交斗争中具有卓越的功勋。在独立战争期间从事的外交活动中，充分展示了他出色的外交才能，体现了他作为一位谋略家的智慧。

富兰克林诞生在马萨诸塞殖民地波士顿一个不甚富裕的手工业者家庭。父亲是位新教徒，为了逃避宗教迫害，1682年率全家移居北美新英格兰波士顿。富兰克林八岁入学，由于聪明过人，成绩优异，跳级学习。

富兰克林很早就从事政治活动，1736—1776年间历任宾夕法尼亚州议会秘书、议员、费城邮局副局长及殖民地邮政总长。后来积极投身于北美殖民地的独立解放事业。

18世纪中期，北美殖民地的资本主义经济有了很大发展，美利坚民族市场已经初步形成，与宗主国之间的矛盾日益表面化，13个殖民地联合起来实行自治的要求越来越强烈。为适应这种要求，1754年6月，他以宾州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在阿尔巴尼召开的各殖民地代表会议，并提出了有名的“阿尔巴尼联盟计划”，呼吁建立殖民地联盟，实行自治。1758—1762年、1765—1775年，富兰克林作为宾州殖民地常驻宗主国的代表在伦敦呆了15年。在出使过程中，他向英王请愿，写文章，访问英国议会，制造舆论，揭露殖民地制度的罪恶，取得了一些成就。

不过，这时的富兰克林只是主张实行自治，并不赞成北美殖民地脱离英国而独立，他力图通过和平方法解决与英国的矛盾。

经过多次反复和动摇，最后在革命浪潮的推动和教育下，1775年，独立战争爆发后，这位年近花甲的老人才离英返美，归国参战，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事业中去。5月，他出席第二届大陆会议，和杰弗逊、亚当斯一起领导了议会中的民主派（主战派）对保守派（主和派）的斗争，并成为《独立宣言》起草委员会的五委员之一。

在独立战争初期，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美军处于被动地位。为改变不利的形势，大陆会议采取了积极的、正确的外交政策，争取国际援助，孤立英国，以赢得战争胜利。派富兰克林等人出使欧洲。当时法国是欧洲强国，各国惟法国马首是瞻，因此富兰克林等决定首先去巴黎争取支持。当时法国有些人甚至还说不清楚华盛顿的名字，但作为一位科学家和思想家，富兰克林却早已在法国人民中间享有盛名。当这位衣着朴素、和蔼可亲、不假思索、对答如流的外交家抵达巴黎时，受到法国朝野上下热烈欢迎，甚至掀起一场富兰克林热，他成了巴黎的“中心人物”。

富兰克林利用他的这些影响，以纵横捭阖的外交手腕，成功运用了外交谋略思想，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他一面在广大人民、进步的知识界和资产阶级中间广泛宣传美国独立战争是正义的事业，争取进步舆论对美国革命的同情和支持；一方面积极在法国军官中宣传和活动，表示美国人决心战胜英国，以引起他们的共鸣，趁机支持北美殖民地打败英国，报七年战争之仇；同时积极开展上层外交，清除国王路易十六及波旁王朝对美国独立战争的恐惧感，并利用法国同英国历史上延续下来的争夺海上霸权与殖民地的矛盾，争取他们对美国的支持。由于富兰克林出色的外交才能和正确的谋略思想的运用，1776—1783年期间，美国从法国获得大量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据统计，仅1776—1781年间，法国就帮助美国达190余万美元。贷款给美国总数达600万美元。1776—1779年，西班牙也以39万美元补助金给美国。

但是在战争初期，法国政府害怕美国独立战争失败，害怕因援美引起国内革命。因此采取等待观望的态度，只是在暗地里贷款和输送一些军火给美国，在英国面前仍然严守中立，闭口不谈

建立法美军事同盟问题。富兰克林为此四处活动。1777 年 10 月，萨拉托加战役中，美军取得决定性胜利，扭转了整个战局，法国政府态度有所转变。这时富兰克林更为积极主动地开展外交活动。他巧妙地利用英国急于要同美国进行和谈这张王牌，使已经消除疑虑的法国政府终于在 1782 年 2 月与美国签订《美法同盟条约》和《美法友好通商条约》，正式承认美国独立，并派出陆海军与美军协同作战，接着又促使西班牙、荷兰先后参战，从而大大改变了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加速了独立战争的胜利。法美同盟条约是美国独立战争中取得的重大外交成就，对打破封锁和争取外援赢得战争最后胜利起了积极的作用，这与富兰克林出色的外交才能和谋略思想是分不开的。

1783 年作为美方代表成员的富兰克林与英国签订《巴黎和约》之后，继续留任法国，担负调整战后美法关系的外交任务。1785 年后美法逐渐建立了商业关系，法国开放了它的西印度群岛和各海港，容许美国船只及货物入口，也允许美国制造的船只在法国注册。富兰克林胜利地完成了一生外交活动中最后一项外交使命。1785 年，79 岁的富兰克林返回祖国。

富兰克林回国后，于 1790 年 4 月 17 日病逝，享年 84 岁。为悼念这位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和科学家，怀念这位为美国民族独立事业献身的人，费城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参加者近 2 万人。欧洲人都记得法国经济学家杜尔哥颂扬他的话：“他从天空抓到雷电，从专制统治者手中夺回权力。”尽管他是一位资产阶级代理人，但是他在外交方面出色的谋略思想仍然值得我们借鉴和研究。

塔列朗

夏尔·莫里斯·塔列朗，法国近代外交家，一位在法国大革命政治舞台上出现的为新兴资产阶级服务的天才人物。

1754年2月2日，塔列朗诞生在巴黎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里。他的祖先从18世纪卡佩王朝建立时起就已经是宫廷贵人了。按血统来说，他的父亲同国王路易十六还是表兄弟。

十五岁时，塔列朗中学毕业，进了神学院。1774年，从神学院毕业，第二年获得神甫称号，开始踏上人生的大道。当年六月，路易十六赏赐塔列朗修道院院长一职。1788年12月，路易十六应塔列朗父亲临终前的请求，签署了任命他为奥顿区主教的文件。1789年法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塔列朗曾被选为制宪议会主席。

1794年7月，法国发生热月政变，大资产阶级上台，当时正在国外流亡的塔列朗看准了这将是对自己最为合适的政治环境，便四处张罗奔走，托人求情，终于在1796年回到了巴黎，这时，热月党的年轻将领拿破仑·波拿巴，由于他的赫赫战功而威名大震。塔列朗预见到这位将军不会永远甘心听任热月党律师们的指挥，便打定主意向这颗前程无量的新星靠拢。1797年夏，塔列朗的密友、著名女作家斯塔埃尔夫人冒着酷暑，一连八次拜访巴拉斯，为他说项。最后，塔列朗终于如愿以偿，督政府正式任命他为外交部长。这个任命，是塔列朗一生中极为重要的转折，从此，他真正开始了外交官的生涯。

塔列朗曾是法国波旁王朝复辟的策划者。在研究把法国交给谁统治好的问题上，塔列朗同样表现出敏锐的判断力。

塔列朗还具有逢凶化吉的超人的政客手腕。塔列朗在其一生中，最为人们所不齿的是他的连续背叛。在法国当时政治风云变

幻莫测的几十年里，许多著名政治家都上了断头台或者被迫流亡国外，而塔列朗每次都能逢凶化吉，除了短期流亡和下台外，总是能青云直上，永保高官厚禄，最后以八十四岁高龄，在自己华丽宫殿的病榻上寿终正寝。这种超人的政客手腕，不能不使人感到惊讶而愤愤不平，塔列朗的政客手腕主要表现在，一是曲意逢迎，博得信任。塔列朗从路易十六转向共和国，从共和国转向督政府，又转向执政府、拿破仑，再从拿破仑转向复辟的波旁，最后从波旁又转向路易—菲利浦，这些弯曲的路都走通了。但他在每一次抛弃前一个政权、倒向后一个政权时，几乎总是使用暗中叛卖的两面派手法。塔列朗为拿破仑忠实地服务了八年。拿破仑十分赏识他的才能，称赞他是大臣中“最聪明能干的人”，对他的赏赐也极为优厚。在这八年里，塔列朗飞黄腾达，先后担任了外交部长、外交大臣、宫廷侍从长，还被封为意大利领地本尼凡托亲王、帝国副大选侯。表面上看来，塔列朗对拿破仑的服从是十分恭顺、甚至是盲目的。实际上，那全是假象，他从未停止过思索。对拿破仑的外交政策和军事行动，塔列朗都有自己的看法。就在拿破仑帝国最辉煌鼎盛的时候，塔列朗预见到：拿破仑不断“播下新战争的种子，而这些新战争在席卷欧洲和法国之后，终将导致他本人的毁灭”。眼看这艘大军舰有朝一日将要沉没，塔列朗又开始考虑要跳走了。1807年8月10日，法国刚刚同被战败的俄、普签订《提尔西特条约》不久，人们正沉溺在庆祝胜利的欢乐中，塔列朗突然辞去了外交大臣的职务。由此，塔列朗与拿破仑的命运分开了。他甚至为了打倒拿破仑，不惜私通敌国，出卖国家机密。塔列朗的这种超人的政客手腕实是惊人的。

塔列朗的谋略最出色的表现还是他的深谋远虑、手段灵活的外交策略。特别是在维也纳会议上，他为法国的领土完整并恢复法国的强国地位进行了顽强而有效的斗争，充分展示了他的谋略才能。维也纳会议是在法国被欧洲联合力量打败的情况下召开的。当时，同盟各国完全可能把法国瓜分，或是勒索巨额赔款，使法兰西民族濒于灭亡。因此，法国想要保持领土完整并恢复强

国地位，就必须在这次外交会议上取得重大胜利。为此，塔列朗充分施展了他的谋略才能，灵活地利用各大国之间的矛盾和谈判对手的细微疏忽来达到有利于法国的目的。塔列朗提出了所谓“正统主义原则”。即：欧洲各国都恢复到 1792 年法国革命战争开始前的疆界；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时期被推翻的各国“正统的”王朝一律恢复。这个原则首先征得了英、奥两国的同意，最后被其他各国所接受。战胜国首先根据这个原则来安排各国疆界，如在各大国的要求仍得不到满足时，便分割拿破仑统治过的小邦或小盟国作为“补偿”。这个原则在维也纳会议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终于遏制了普鲁士和俄国的扩张野心，避免了法国被瓜分。经过几个月的紧张斗争，法国重新成为强国之一，各大国保证遵守巴黎和约，法国保住了 1792 年的领土完整。当然，这些成绩不能全记在塔列朗个人的名下，但是他施展外交手段，充分利用各大国间的矛盾，改善了法国不利处境，所起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自然，正像一切对历史进程有过影响的人物一样，塔列朗是当时历史条件的产物，法国大革命造成的壮丽多彩的政治舞台，造就了他的高超的谋略才能。

詹姆斯·门罗

1783年，美英在巴黎签订和约，英国正式承认美国脱离英国而独立。随着战争的结束，詹姆斯·门罗开始对政治发生兴趣，终于步入政坛，成为美国建国之初的著名政治家之一。

门罗的政治生涯得益于杰斐逊和麦迪逊两位政治家，而受前者的熏陶和启发最深。同样，杰斐逊对门罗这个年轻人也极为器重，他指导门罗学习法律，并言传身教，将自己从政的经验都无保留地告诉了门罗。1782年，年仅24岁的门罗在杰斐逊等人的支持下，参加州议会的竞选，一炮打响，当上了众议员。次年，门罗再接再厉，入选为北美邦联议会议员，并逐渐成为议会内一个崭露头角的活跃人物。

门罗的政治主张有两点特别突出，一是认为美国应当向西部发展，为此他曾经跨过阿巴拉契亚山脉，考察了密西西比河通航的可能性。第二，他认为应当成立一个中央联邦政府，以代替当时北美13个州的松散邦联。1787年5月，他作为弗吉尼亚州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在费城举行的制宪会议。

当时杰斐逊正在巴黎担任美国驻法兰西公使，他对汉密尔顿提出的宪法草案中没有保障人民权利的条款深感忧虑，但由于远隔重洋，不能与会，所以他请门罗在会议中代表自己宣传有关主张。

门罗坚决反对总统为终生职务，要求定期举行选举。他还旁征博引，以古希腊的历史经验反对总统过分专权。最后，制宪会议的代表们达成妥协，虽然未将有关人权的条款纳入宪法，但规定总统四年为一任期，并按有关手续进行选举。门罗的提案虽未被全部接受，但却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891年，第一届美国国会通过了麦迪逊草拟的《权利法案》，作为修正案成为

了宪法的一部分。

1789年4月，华盛顿被选为美国第一届总统。为了表示不偏不倚，他任命杰斐逊为国务卿，汉密尔顿为财政部长。门罗也通过选举当上了参议院议员，不过没多久，他与汉密尔顿又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华盛顿很赞赏门罗这种宽宏大量的气概，同时，为了平衡门罗与汉密尔顿的关系，他于1794年任命门罗为美国驻法兰西公使，这就为门罗的政治生涯揭开了新的一页。

1789年7月14日，法国人民举行武装起义，捣毁了巴黎的巴士底狱。三年后，人民宣布废除君主制，成立共和国，并战胜了由英国、奥地利、普鲁士等封建国家组成的反法联盟。然而，人民革命的胜利果实却为大资产阶级的督政府所篡夺。这个督政府虽然反对王党复辟，但对许多革命家也采取了镇压措施。

门罗是同妻子及女儿一起到巴黎赴任的。门罗1786年结婚，妻子婚前的名字叫伊丽莎白·科特兰特，是纽约一位商人的女儿。

然而，当门罗夫妇踏上法兰西国土时，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形势已出现逆转，革命的雅各宾派已被镇压，贪得无厌的奸商肆无忌惮地抬高物价，这一切都使门罗感到忧虑。一次，他和女儿伊莉一块沿塞纳河散步。望着河两岸鳞次栉比的建筑，门罗告诉年幼的女儿，虽然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但事实上却比法国好得多。

然而，“福兮祸所伏”。虽然门罗在法国的工作卓有成效，但却与出发上任前华盛顿给他的关于在法英两国冲突中小心保持中立的指示不相符合。门罗喜欢共和制的法国，讨厌君主制的英国。同时又认为，法国是一个大陆国家，而英国是一个海上国家，所以未来对美国威胁最大的是英国而不是法国。门罗的这种想法或许是正确的，因为后来英国军队的确也曾侵略过美国。但是，门罗对法国的过分热情却违背了“外交工作，授权有限”的基本原则。比如，他主动要求出席法国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受到会议主席的热烈拥抱，做了对法国充满激情的演讲，并赠给大

会一面美国国旗，飘扬在法国三色旗的旁边。

门罗在法国的活动传到了美国国内，引起了像汉密尔顿这样坚持亲英政策的人的不满。1797年，华盛顿总统宣布召回门罗，理由是美国需要一个“推行而不是妨碍政府中立政策的外交使节。”

门罗在满怀不平的心情下还在当年发表了长达500页的《对最高行政当局处理美国对外事务的一点意见》一书，公布了政府给他的训令、他同美国和法国政府的来往公文、演说词以及他同美侨来往的信件，为自己辩护。

1801年，杰斐逊当选为美国第三任总统，这就为门罗重返外交界铺平了道路。

1802年担任法国第一执政的拿破仑有一个在北美洲建立庞大殖民帝国的计划，这个殖民帝国主要包括加勒比海的海地岛和位于密西西比河与石城山脉之间的路易斯安那。拿破仑的目的是将路易斯安那地区变成法国的“谷仓”，然后通过作为贸易中心的海地岛将谷物运往欧洲。

1803年初，杰斐逊召见门罗，任命他为总统特使，前往法国，与美驻法公使罗伯特·利文斯顿一道向法国购买路易斯安那部分地区。根据杰斐逊的训令，门罗和利文斯顿可以在100075美元的限额内，购买新奥尔良港和东、西佛罗里达，如果拿破仑拒绝，则应出此限额的3/4购买新奥尔良港或其东岸土地，如果还不成，最低限度也要取得新奥尔良的航行权和货物存栈权。门罗知道，这项任务的艰巨性可以说得上是虎口拔牙，他虽然忧心忡忡，但还是没说二话地接受了下来。果然，他到巴黎后第一次见拿破仑就碰了个“软钉子”。

门罗看得出来，拿破仑是在回避谈实质性问题。但是，这位法国第一执政又没有严辞拒绝美国方面的建议，凭着多年的外交经验，门罗知道其中必有奥妙，因此需要启开拿破仑之口。“阁下”，门罗说，“这种可能是存在的。正是由于这种可能的存在，所以杰斐逊总统才命令我亲自把他的亲笔信转交给您，并希望我能亲耳聆听到您对建议有何见教。”

拿破仑沉默了一段时间，门罗的话不亢不卑，软中有硬，他必须设法给以一个不违反礼仪的回答。“特使先生，”拿破仑说，“我是一个军人，所以常常愿意预测战争爆发的可能性。至于外交问题嘛，我的外交部长塔列朗是行家里手。所以我想说，‘请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门罗没离开美国前就曾研究过塔列朗，这个善于钻营，能够随机应变的跛子神父，他一生所追求的就是钱、虚荣、地位和女人，门罗早做好准备与他斗上一场。

1803年4月30日夜，门罗和塔列朗经过14个小时的紧张工作，完成和签署了领土移交协议，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笔领土交易就这样成交了……

乔治·坎宁

1812年，英国首相珀西瓦尔遇刺而死，议会提前举行大选。为了争取议员席位，乔治·坎宁和老对头卡斯尔雷当众表示和解，并且最终都如愿以偿。新当选首相的利物浦勋爵有意请坎宁担任新内阁的外交大臣，坎宁也兴冲冲地准备东山再起，但到最后一刻又拒绝了邀请。原来，坎宁听说利物浦勋爵准备请卡斯尔雷担任下院议长，一种无法控制的嫉妒心顿时又使他放弃了外交大臣的位子。1814年，坎宁受命出任驻葡萄牙大使，他终于离开了那个使他郁郁不安的伦敦。

坎宁在里斯本任职期间，欧洲的局势发生了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最深刻的变化。1814年，拿破仑在反法联军进入巴黎后被迫退位，被流放到地中海上的厄尔巴岛。1815年3月他重新复辟，但不久又兵败滑铁卢，又被流放到大西洋的圣海伦岛，法兰西帝国彻底瓦解。

英国一贯的对外政策是保持欧洲大陆各大国之间的平衡，防止任何一个国家过分强大。在沙俄势力膨胀，以“欧洲宪兵”自居的时候，卡斯尔雷决定与法、奥勾结，以对付俄、普的联合势力。在“神圣同盟”成立后，英国又与俄、奥、普订立了“四国同盟”，明确表示要维持欧洲“均势”，实际的目的是限制沙俄势力进一步扩张。

1816年，坎宁奉调离任回国。他曾幻想回到执掌对外政策大权的位置上，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卡斯尔雷占据了那个位置。坎宁最后被利物浦勋爵安排当了印度控制局的局长。

1822年8月，内阁任命坎宁为印度总督。说实话，在欧洲局势千变万化的当时，任命坎宁去遥远的印度勿宁说是一种体面的“流放”。它表明，坎宁的政治生涯将以印度总督的身份而告终。

但是，坎宁还是接受了这项任命。正当他乘船驶向东方，船只还没有驶出泰晤士河河口时，命运女神改变了他的政治前途，也改变了英国的外交政策。

原来，卡斯尔雷由于突然精神失常，在家中自刎身亡。坎宁卷土重来，从这以后直至他逝世，英国的政治事务几乎都是由他主宰。

的确，坎宁的才智使外交大臣一职非他莫属。据说他能同时口授两份急报，一份近在欧洲，而另一份远在天边的拉丁美洲，一气呵成，一字不改就能发出去，还让人往往对其文采赞叹不已。但是，坎宁真正的才华在于他敏锐犀利的政治眼光。经过多年作为旁观者的考察，他一上台就认为应该对英国的内外政策进行全面革新。

坎宁进行的第一个革新是全面审查关税制度，要求在国内小麦价格上涨时按比例降低关税。他说：“我们面临财产和人口之间的尖锐矛盾……只有通过宽容和开明的立法活动才能避免这一矛盾。”在他的坚持下，议会通过了有关法律，满足了工业资产阶级的需要，促进了英国海外市场的扩展。

在对外政策上，坎宁认为，欧洲发生革命的直接威胁已经消失，真正的威胁来自神圣同盟的大一统局面，它使英国处于孤立地位。

“西班牙危机”是坎宁担任外交大臣后遇到的第一个重大外交问题。1820年1月1日，由列戈领导的西班牙自由派发动政变，宣布结束西班牙国王费尔南多七世的专制主义直接统治，实行君主立宪。

坎宁出任外交大臣后所面临的“西班牙危机”包括两方面的问题；除西班牙国内政治体制问题外，另一个就是原西班牙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地问题。

坎宁后来以胜利者的口吻说道：“我利用新大陆保持了旧大陆的均势。”

坎宁在外交上的另一个重大举动是利用希腊独立分化沙俄和奥地利的关系，打击了梅特涅。1821年，希腊人在经历400多年

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后发动起义，要求取得民族独立。

希腊地处东地中海，是英国通往“女王王冠上的珍珠”的印度通道上的重要国家。如果希腊独立了，奥斯曼帝国就会被削弱，通往印度通道的安全才有保证。1823年3月25日，坎宁事先未通知任何伦敦外交官，就宣布自即日起承认希土为交战双方，这实际上是承认希腊是一个独立国家。

1827年3月，利物浦首相中风去职，坎宁一下子登上位极人臣的宝座，成为英国的首相。

坎宁当首相那年57岁，但还在外交大臣任内，他已身染重病，再加上公务的劳累，他只好靠服鸦片酊度日。

1827年8月8日，他死于伦敦郊外的别墅中。他正好当了100天的首相。

穆罕默德·阿里

穆罕默德·阿里王朝以独立的姿态出现在埃及，这是英法列强和国内曼姆鲁克武装所不能容忍的事实。于是英国首先勾结土耳其苏丹塞里姆三世，以宗主君王的名义压迫阿里就范。

1806年，英国政府向塞里姆三世建议：废黜阿里，恢复埃及省督地位；把埃及大权移交给埃勒菲，埃勒菲保证对土耳其苏丹称臣，每年纳贡1500袋钱。塞里姆三世对阿里事实上的独立正感忧愁，所以满口答应英国政府的建议，他也希望借英国力量和埃及曼姆鲁克武装把阿里挤掉。6月中旬，塞里姆三世下命令调阿里去萨洛尼卡任省督，一面火速派遣载有三千兵力的舰队开赴埃及。

为了配合行动，埃勒菲在英国政府支使下，也率领六百骑兵和六千贝都因武装人员，从上埃及北上，作内部接应。

7月1日，土耳其军抵达亚历山大时，埃及的内外形势严峻起来。阿里一面假意回复塞里姆三世，表示愿去萨洛尼卡就任省督，另一方面他和奥马尔·麦克莱姆等老人们进行紧急策划。阿里抓住埃及贵族老人们惧怕土耳其军队，并且仇恨曼姆鲁克武装的心理，在紧急会议上慷慨激昂地说：“凭着我对埃及命运的责任和效力于各位贵族长老们的忠诚，我一定留下来与诸位共患难。我有两个办法，可以使塞里姆三世的决心动摇，让英国人的希望落空。”

奥马尔·麦克莱姆等一群贵族老人们一听，顿时转忧为喜，请求阿里和盘托出好主意。

阿里清了清嗓门说：“请奥马尔·麦克莱姆长老尽量联络埃及各界人士，联名上书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朝廷，赞扬我阿里在埃及的功绩和人民对我的拥戴。同时在上书中大讲特讲土耳其军和

曼姆鲁克武装的暴行……”

奥马尔·麦克莱姆当即表示道：“放心，我们回头就抓紧力、好了。第二个办法呢？”

阿里诡秘地说：“花钱。”

阿里立即派了一名心腹，携带二千袋钱秘密前往伊斯坦布尔，将大部分钱私下送给塞里姆三世，并表示阿里今后仍将为苏丹“效劳”。同时，又让心腹把小部分钱行贿给苏丹手下的几位决定政策的重臣们。在国内，阿里还派人给在上埃及的巴尔底西送去了一些钱，希望和巴尔底西“重新恢复往日的友谊”……

巴尔底西果然见钱眼开，不再配合埃勒菲向开罗进军的行动了，而是乘埃勒菲上埃及的后方空虚，拼命扩充自己的地盘。埃勒菲见状大怒，兴兵向巴尔底西问罪，一场曼姆鲁克武装间的互相争斗又没完没了地开始了。

塞里姆三世看到曼姆鲁克武装四分五裂，看到埃及各界名流的联名上书，还有大量的金钱在动摇他的信心，几位重臣不断地替阿里吹温和的风，于是改变了主意，同意阿里留在埃及，撤回了土耳其军队。至此，英国政府挑唆干涉埃及事务的阴谋暂告失败，新生的阿里王朝又度过了一次难关。

拿破仑在欧洲炫耀武力，在对英国、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的战争中连连取胜，土耳其苏丹塞里姆三世公开倒向法国，向英、俄宣战。英国唯恐法国占领埃及，于是先下手为强，于1807年声月派六千英军在弗雷泽将军率领下攻占亚历山大。此时，埃勒菲和巴尔底西已经相继死去，英军无法得到曼姆鲁克武装的声援，在进攻赖希德中损失惨重，弗雷泽手下的大将沃科普被击毙，英军死伤五百余人，被俘近二百人。

19世纪初的埃及经济十分落后，加之内外战争连续不断，农田荒芜，河渠淤塞，耕地面积只相当于1798年的三分之一。阿里意识到，埃及落后的局面不改变，就无法抵抗外来入侵，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埃及受欺凌的地位。所以，他决心富国强兵。

阿里在埃及是依靠部分长老和商业贵族起家的，他最初代表这些人的利益执政，在决定重大问题特别是国库收入的赋税问题时，必

须同长老等宗教人士协商，而长老们大多是封建地主，他们主要靠掌管宗教田产、承包土地税，靠剥削农民生活。奥马尔·麦克莱姆就是长老们的政治代表，他的地位和影响在埃及已经和阿里不相上下，而且他掌管内政大权，亲自过问一切事务，全国四分之三的土地都归属在长老和曼姆鲁克地主的名下，农民创造的财富大多被他们攫取，政府仅仅只有极少部分。富国强兵的宏伟计划是要增加政府收入，阿里的抱负立即和长老、曼姆鲁克地主们的利益发生了冲突，阿里决心向长老权贵们挑战。

1809年6月，阿里规定：所有宗教地产不再享有免税权，必须向政府缴纳“米里”（国税），长老们必须在40天内将其掌管的宗教地产证件交政府查验，违者将取消其地产掌管权。许多长老因没有合法证件，私占的土地被政府收回。

阿里从埃及长老和曼姆鲁克地主手里将夺到的大批土地收归政府，再把土地按王室领地、边缘地、村长地、酋长地和乌西叶地的形式进行了再分配。而王室领地就占了全国耕地的四分之一，阿里表面维护的是名义上的土地国有，实际上是他个人占有土地。

由于阿里用铁的手腕扫除了埃及长老和曼姆鲁克政治势力，他在埃及推行富国强兵的改革障碍清除了。接下来，阿里首先发展农业经济作物，特别是根据埃及气候种植棉花，大批出口。同时，从国外引进良种、水果、蔬菜和树木，发展水利设施。到1838年，埃及的农业条件大大改善，全国已有水车五万多台。

随后，阿里开始在埃及创办第一批近代机器工业，大力培养本国技师，派留学生出国。他对留学生许下诺言：“谁首先学成，政府给他们高薪，提拔他们当工长。”阿里还把发展军事工业放在首位，1820年建立了开罗城堡兵工厂，单枪支车间每月就能生产法国式步枪六七百支。1829年，又建造亚历山大造船厂，大力建造军舰。当时，埃及造的军舰，有的甚至能与法国军舰媲美。

在对外贸易、国家政治体制，军事装备上，阿里均全面推行改革。在他刚取得埃及政权时，他只有一万左右装备简陋、缺乏训练的杂牌军。到了1839年，埃及已经拥有23万名陆军，1.6

万名海军，拥有战舰 32 艘，成为地中海东部最强大的海军国家。

阿里除了想摆脱土耳其苏丹的控制外，还企图建立一个庞大的阿拉伯帝国。有一次，他接到土耳其苏丹的一份诏谕，看后十分激动地说：“我作为一个不知名的冒险家来到埃及。我一步步地向前迈进，如今，我在这里已经站稳脚根，不错，我已经站稳脚根。”接着他狠狠地敲打着这份诏谕说：“我从来就没有什么主人！”

克雷门斯·梅特涅

克雷门斯·梅特涅，奥地利著名政治家和外交家，曾任外交大臣和首相，“神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以擅长外交权术著称，是19世纪上半叶欧洲政治舞台上风云一时的人物。

1809年，梅特涅被任命为外交大臣，后升任奥地利首相兼宫廷、国务大臣：至19世纪中叶，梅特涅在欧洲外交舞台上纵横捭阖几十年，极力推行“均势外交”，主持一系列大国首脑会议，组织“神圣同盟”、“四国同盟”，麇集反动势力，共同镇压革命运动，一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成为显赫一时的“欧洲宰相”。

梅特涅外交策略的明显特点是玩弄权术，见风使舵，力图使各大国“实力均衡”，以便奥地利帝国从中渔利。

梅特涅在担任外交大臣后的第一个重要行动，就是导演了一场“惊人的婚姻”，玩弄的是随机应变，以联姻代替战争的计谋。1809年7月，瓦格拉姆一战，奥地利在第五次反法联盟中再次失败，维也纳也被占领。奥地利面临着被灭亡的危险。为缓和国家所处的严重局势，梅特涅上任伊始就大胆地提出了奥法重新修好的策略。他在和奥皇弗兰西斯一起对政治局势作了一番冷静和理智的检查后，向奥皇大谈他的策略和深谋远虑的看法。提出在不割让领土的情况下，同拿破仑签订和约，而实行这项策略的第一个重要行动就是梅特涅亲自出马做“红娘”，说服奥皇弗兰西斯把女儿玛丽·路易丝嫁给拿破仑，以联姻代替战争。由梅特涅撮合而成的惊人的婚姻，把欧洲最古老的皇室和新兴的皇室拉拢在一起，或者，可以这样说，把旧秩序和革命拉拢在一起。法奥联姻使哈布斯堡王朝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机会，以从刚刚经历的惨败中恢复过来，从而使奥地利保持住了一个大国的地位。

法奥联姻成功后，梅特涅又施展开了“走钢丝”的外交手腕，在法俄之间左右逢迎，促使其产生矛盾，相互征伐，然后从中取利。梅特涅早就想到，法奥联姻必须促使有关列强互相倾轧，产生矛盾，才能达到预期的结果。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这种婚事究竟意味着什么。1812年3月，奥地利政府同拿破仑签订了一项明确的条约，其中规定，奥地利出兵三万，作为拿破仑“大军”的右翼，进攻乌克兰。法奥同盟条约是一个密约，但在一个月后，奥地利有意无意地将它泄漏给了俄国政府，并向亚历山大秘密保证，奥地利的作法将如1809年俄国的作法一样，就是给法国尽可能少的支持，向俄国作尽可能少的进军，并要尽可能造成最少的伤害。俄国向奥地利也提供了类似的保证。这样，梅特涅在实际上起了离间法俄的作用，是时，可以使奥地利免于遭受敌对双方部队的侵犯。

1812年6月24日，法俄之间终于爆发了战争。俄罗斯严寒的冬季和一望无际的旷野埋葬了拿破仑的大军。拿破仑领着他的残兵败将狼狈地逃回了巴黎，但梅特涅却使奥地利军队毫无损失地撤回了国。这时候，梅特涅意识到，对俄战争的失败已经改变了拿破仑的地位，实现和平就成为奥地利的现实工作了。由此，梅特涅寻机又站了出来，适时地充当了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一世之间的调解人。

1814年签订的第一次巴黎条约中，决定召开反法联盟会议，商讨处理战后事宜。梅特涅依靠他的足智多谋的外交手腕和坚守精神的适当发挥，使他的事业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利用英国担心俄国向中欧推进的英、俄矛盾和法国反对普鲁士吞并萨克森的法、普矛盾，拉拢英国和法国订立英、法、奥三国秘密同盟，共同反对俄国对波兰的独霸和普鲁士对萨克森的觊觎。梅特涅利用列强之间的争夺，使波兰的瓜分和萨克森的处理有利于奥地利。

1848年，梅特涅被滚滚革命洪流冲下了历史的舞台。维也纳会议确立的反动秩序，到此遭到彻底破产。梅特涅下台后，先逃亡英国伦敦，之后迁居比利时，最后返回奥地利，隐居于豪华的约翰尼斯堡庄园。1859年6月11日去世，终年86岁。

梅特涅作为一个政治家和外交家这是人所共知的，而显然他又是一个谋略家。他推行的“大国均势”外交策略为后人广为效仿。英国保守党党魁迪斯累利和德意志“铁血宰相”俾斯麦继承梅特涅的衣钵，在国际政治活动中施用梅特涅的外交手腕。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也对梅特涅十分推崇，曾极力在国际关系中推行梅特涅式的外交策略。

亚历山大·戈尔恰科夫

1811年10月19日，29个十二三岁的贵族子弟，披着时代的彩霞，走进了亚历山大一世下令开办的皇村学校，开始他们6年的学习生活。在这29个人当中，有后来成为伟大的俄罗斯诗人的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有后来成为十二月党人的丘赫利贝凯尔·沃利霍夫斯基和普希钦，还有后来成为俄国首相的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戈尔恰科夫。

1817年6月，皇村学校的第一期学生毕业了。作为全班最优秀的学生，普希金和戈尔恰科夫被分配到俄国外交部工作。离开了沉闷的皇村学校，他们原以为自己已变成放出笼子的小鸟，可以尽情地享受快乐与自由，没想到一走进这座坐落于彼得堡佩夫切斯基桥边的大厦，他们对里面充满着官僚主义、腐败现象简直就感到窒息。

1825年11月，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去世，青年军官们于12月趁机举行武装起义；要求实行立宪民主，并改革俄国的农奴制。然而，这些被称作“十二月党人”的起义并没有成功。新沙皇尼古拉一世残酷地镇压了起义，绞死了5名组织起义的领袖，还把120多人流放西伯利亚，其中包括戈尔恰科夫的朋友普希钦。

戈尔恰科夫并没有被划成“十二月党人”。然而，他与“十二月党人”的关系却为沙皇的近臣们所得知。在普希钦于流放中因病去世后，戈尔恰科夫又与普希钦的遗孀亚历山德罗芙娜结婚，并承担起赡养妻子与普希钦生育的四子一女的责任。尽管亚历山德罗芙娜的姐姐是尼古拉一世的情妇，但沙皇对戈尔恰科夫一点儿也不信任。在外交部，戈尔恰科夫被冠以“自由主义者”，提升极为缓慢。

戈尔恰科夫在佩夫切斯基桥大厦不得志的另一个原因是，在

俄国外交部中充满着具有德意志血统的官员。

尼古拉一世的皇后是普鲁士先王弗里德里希的女儿，也是当时普鲁士国王威廉二世的妹妹。有了这么一重关系，许许多多在本国失意的德意志外交官就受聘来到俄国，相互串通，控制了佩夫切斯基桥大厦。

涅谢尔罗迭最讨厌的是才华横溢的俄罗斯人，而戈尔恰科夫偏巧恃才傲物，孤芳自赏，结果涅谢尔罗迭在他的评语上写道：“并非没有能力，但却不爱俄国！”多年后，戈尔恰科夫爬到了佩夫切斯基桥大厦主人的地位，他看到这段评语，竟哭笑不得，一句话也不愿批驳。

1832年，涅谢尔罗迭任命戈尔恰科夫为奥地利公使馆参赞。

戈尔恰科夫到维也纳任职不久，就在研究奥地利政局是否稳定的问题上与公使秘书美延多尔夫发生争执。美延多尔夫本人娶的是奥地利女人，他认为奥地利政局稳定，因此俄国应当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与奥地利站在一起。

戈尔恰科夫最后得出结论：如果奥地利的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俄国不应当和它绑在一辆战车上，因为奥地利是虚弱的，它只需要俄国支援，而根本无法支援俄国。

可惜，戈尔恰科夫虽然捅破了哈布斯堡王朝这个“肥皂泡”，但讲真话的人却从来没有好报应。谁要是说得对，那些靠说假话爬上高位的人就必然打击他，戈尔恰科夫也没能逃脱这个命运。报告送回佩切夫斯基桥大厦，涅谢尔罗迭勃然大怒。他不仅扣押了那份报告，而且还采取明升暗降的办法，把戈尔恰科夫派往一个小小的符腾堡公国去当公使。美延多尔夫占据了原来戈尔恰科夫的位置，不久又成了公使，衔别还在戈尔恰科夫之上。

1848年，欧洲几个主要国家都爆发了革命。

戈尔恰科夫在斯图加特密切地注视着欧洲局势的发展。他认为，如果匈牙利从奥地利的统治下独立出来，在巴尔干处于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斯拉夫人也能获得解放。他写报告给俄国当局，要求不要给哈布斯堡王朝以任何怜悯。

就这样，尼古拉一世下令出兵匈牙利，挽救了摇摇欲坠的哈

布斯堡王朝。

1850年，戈尔恰科夫按正常调动去法兰克福，担任俄国驻德意志联邦议会的公使。对他个人来说，那是个令人沮丧的地方，因为到任没多久，他的妻子亚历山德罗芙娜就抛开他与世长辞了。

痛苦中他昏厥过去，一病几十天，他打算挂冠而去。

大病初愈后的一天，一位不速之客登门拜访。对于一个对欧洲的“均势”遭到破坏而不愿袖手旁观的外交家来说，这次拜访使戈尔恰科夫的灵魂又重新附在了自己的躯体上。来客叫奥托·冯·俾斯麦，普鲁士王国驻德意志联邦议会的大使，一个比戈尔恰科夫小17岁的外交家。

俾斯麦是来向戈尔恰科夫“求教外交问题的”。寒暄过后，年轻人毫无顾忌地谈起来：“我出生的那一天是愚人节，也就是说谎话可以不承担责任的那一天。如今这个世道大家对欺世盗名的行为熟视无睹，而我又选择了外交这个职业。有人说在外交场合，不说话是金子，少说话是银子，多说话就是破铜烂铁。但法国外交家塔列朗也说过，舌头对于人来说，它的作用就是隐瞒自己的思想。听说他能滔滔不绝地讲四个小时，逻辑清晰、层次分明，但到头来人们发现他什么也没讲。为了掌握玄妙的外交知识，亲爱的前辈，您能在这方面对我这个当学生的加以训导吗？”

“好厉害！”戈尔恰科夫心里想，“日耳曼人中还有这样的人物，上来就拿大人物作典范。看来这小子今后不是治世的能臣，也至少是个乱世的奸雄。”怎么回答提问呢？戈尔恰科夫想也没有必要想，职业的特点早已使他不假思索也能把话说得滴水不漏。

“什么是外交？俾斯麦先生，我对您无从解释。如果外交是一门科学，还没听说有一个专门的机构在研究它。如果说外交是一门艺术，那么掌管艺术的缪斯女神决不肯出来庇护它。说外交就是欺骗，这等于亵渎神明，不过干我们这一行的绅士中也确有不少江湖骗子。”

“绝妙！”俾斯麦乐得鼓起掌来。

没有多久，这种“教与求教”就为震撼欧洲的“克里米亚战争”所打乱。

克里米亚战争起源于圣地保护权问题——谁在耶稣坟墓所在地耶路撒冷和耶稣诞生地伯利恒教堂内享有豁免和特权的问题。

占领土耳其的黑海海峡是历代沙皇的宿愿，“圣地纠纷”是扩大俄国在土耳其势力的天赐良机。1853年6月21日，俄国军队渡过普鲁特河，占领了属于奥斯曼管辖的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

俄军的行动引起了法国和英国的反对，意大利为了请英法支持它从奥地利统治下解放出来，和土耳其、英国、法国结盟，共同对俄作战。对于沙俄来说，当时战略上最关键的问题是得到奥地利的支持。因为奥地利如果站在对手一边，俄军的侧后就会受到打击。

尼古拉一世任命戈尔恰科夫为驻奥地利公使，要他无论如何保证奥不出兵与俄国作战。

新的任命使戈尔恰科夫又重新回到了他已厌倦的外交生活之中。不过戈尔恰科夫灰心里明白，尼古拉一世已棋错一着，他在开战前冷落了法国，盲目相信奥地利会报答俄国帮助镇压匈牙利起义的“救命之恩”，这已使俄国陷入困境。戈尔恰科夫还预见到自己极难阻止奥地利在背后“捅”俄国“一刀”，他决心一旦劝阻无效，立即利用矛盾，在反俄同盟内部制造不和，使俄国能得到一个“光荣的和平”。

1854年8月，奥地利正式向俄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俄军退出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否则，奥军将对俄作战。

尼古拉一世被迫下令撤军，但俄国的形势并未因此发生好转。1854年9月14日，英法联军在克里米亚登陆，将俄军围困在塞瓦斯托波尔要塞。俄国败局已定，但还在作最后的挣扎。

1855年3月2日，尼古拉一世在绝望中服毒自杀。9月，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在坚守11个月后被攻陷，克里米亚战争以俄国的惨败而告结束。1856年2月，俄国与战胜国在巴黎签订和约，规定：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归还给土耳其，黑海中立化，禁止

俄国在黑海拥有舰队、海军基地和兵工厂。

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充分暴露了俄国落后的农奴制已经维持不下去了，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决定进行改革，同时进行改组，免去涅谢尔罗迭首相兼外交大臣的职务，任命戈尔恰科夫为外交大臣。于是，俄罗斯外交史上德意志人的时代过去了，新的一页、俄国人的一页正在打开……

亨利·帕麦斯顿

1846年，以约翰·罗素勋爵为首相的辉格党内阁上台执政，亨利·帕麦斯顿当上了外交大臣。他一“出山”，就为英国保持庞大的常备军作辩护，而不久在欧洲出现的政治风暴证明他的主张是有远见的。

1848年1月，在意大利首先爆发了反对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独立运动。2月份法国又发生革命，推翻了王朝统治，建立了第二共和国。梅特涅惊魂未定，3月13日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也发生人民起义，他深知大势已去，仓皇逃往国外。

1848年的欧洲政治风暴虽然瓦解了“神圣同盟”，但沙俄却成了欧洲大陆的主要强国，成了维护欧洲旧秩序的“国际宪兵”。帕麦斯顿从来就认为国家之间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过去他常说，法国和英国在埃及问题上就如同两个男人追求同一个女人，“爱情不能让，国家利益也不能让”，因此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现在，他认为英俄之间在土耳其问题上的争夺在所难免，他决心采取一切手段把沙俄“顶回去”。

1847年复活节期间，葡萄牙犹太商人唐·帕西菲科在雅典的家遭到了一伙人的袭击。帕西菲科硬说这与希腊政府有关，要求赔偿，但遭到拒绝。由于帕西菲科出生在直布罗陀这块英国海外飞地上，按英国当时的法律，他是英国臣民，因此他在1850年向帕麦斯顿求助。

维多利亚女王和艾伯特亲王主张与欧洲各国君主团结，帕麦斯顿却私下里反其道而行之。1851年12月，拿破仑的侄子波拿巴第三通过政变当上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总统，帕麦斯顿未经女王同意，擅自以女王名义向波拿巴第三发去贺电，这引起女王夫妇的愤慨。他们召见罗素首相，坚决要求把帕麦斯顿撵出外交

部。罗素本人威望不高，所以要借重女王的势力。他无可奈何地免去了帕麦斯顿的外交大臣职务，可是他没想到，帕麦斯顿怀恨在心，私下里四处活动，6个星期后，议会投了不信任票，罗素本人也乖乖地下了台。

一年以后，阿伯丁勋爵当了首相。他器重帕麦斯顿的才干，又觉得他办事太咄咄逼人，于是在延揽入阁时安排帕麦斯顿当了内政大臣。

其实，帕麦斯顿这时在党内已经羽毛丰满，担任外交大臣的克林顿又是他以前的副手，他虽然挂着内政大臣的衔，但在幕后主持英国对外事务的不是阿伯丁，也不是克林顿，而仍旧是他帕麦斯顿。

1853年10月4日，在英法的支持下，土耳其政府宣布，由于俄军渡过普鲁特河，侵占了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土耳其苏丹政府向俄国宣战。然而，战争一开始，俄国舰队就在锡诺普全歼了土耳其的舰队。是战是和，这在英国内阁中又出现分歧。

帕麦斯顿在这种情况下于12月15日突然宣布辞职，这在议会和社会上都引起了轩然大波。

在议会中，有人攻击内阁“排挤了真正的爱国者”。在社会上，谣言纷纭，说女王的丈夫受贿当了俄国间谍，应当以叛国罪接受审判。阿伯丁受不住这种压力，亲自前往帕麦斯顿家请他重新“出山”。帕麦斯顿重新迫使内阁把战争的决策权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里。1854年3月，他拉拢法国、撒丁王国和土耳其共同对俄宣战，一场残酷的、被新闻界称之为“东方的战争”的厮杀在黑海沿岸展开了。

帕麦斯顿看得出，要想打败沙俄，奥地利站在自己一边等于是在俄军背后插上一刀。1848年，镇压匈牙利起义时俄国帮助过奥地利，尼古拉一世总是认为奥地利要感恩图报，所以争取了奥地利，这“背后一刀”将是突然和致命的。他通过波拿巴第三向奥地利指出，俄国占领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就控制了多瑙河口，这就堵住了奥地利对外贸易所依赖的多瑙河。这一着果然见到了效果，1854年6月，奥地利向俄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俄国

从上述两地撤军。尼古拉一世又气又恼，但终于于8月份将军队撤了出来。

“装备精良的重型炮舰是再好不过的和平保卫者”，帕麦斯顿所经常提到的这句话在战争中灵验了。

1856年二三月间，在巴黎召开了结束“东方战争”、或叫“克里米亚战争”的国际会议。会议签订了《巴黎和约》，规定：列强共同保证奥斯曼帝国的“独立与完整”，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宗主权名义上仍属土耳其，俄国放弃对奥斯曼东正教徒的保护权，英法将克里米亚交还俄国，黑海中立化，禁止俄国甲土耳其在黑海拥有舰队和海军基地，也禁止各国军舰通过黑海海峡。

维多利亚女王过去一直担心帕麦斯顿要严厉地削弱俄国，但当她听说黑海被划为非军事区，俄国收回克里米亚时，她把过去对帕麦斯顿的不信任远远地抛在脑后，并授予他嘉德勋章。

的确，帕麦斯顿是一个“魔鬼首相”。他除了在列强之间玩弄“均势”，不使任何一个大国强大得足以威胁英国的利益外，还一刻也不停地向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发动英国式的殖民战争，而首当其冲的是东方最古老的国家——中国。

1840年6月，英国军舰向中国打响了第一炮。腐败的清朝政府畏敌求和，与英国签订《穿鼻草约》，同意把香港割让给英国。然而，帕麦斯顿还不满足。他派璞鼎查替换义律，要求清朝政府承认鸦片贸易的合法性。结果，又于1842年8月29日把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强加给清朝政府——中国赔款白银2100万两，英国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1856年10月，刚刚结束克里米亚战争的帕麦斯顿又以“亚罗号事件”为借口，悍然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取得了在中国内河长江的自由航行权。

1860年春天，帕麦斯顿勾结波拿巴第三，组成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将珍藏着无数珍宝和图书典籍的东方名园——圆明园掠夺一空并付之一炬。在后来订立的《北京条约》中，中国的九龙又

被掠走，而且又敲诈了 1600 多万两白银的“战争赔款”。

帕麦斯顿为英帝国抢夺殖民地的行径受到了英国资产阶级的赞美。

本杰明·迪斯累利

1846年，自由党当政以后，英国政府每每指责欧洲大陆各君主国奴役弱小民族的作法，这就使维多利亚女王感到左右为难。

1854年，沙俄与土耳其之间发生战争，帕麦斯顿和波拿巴第三相互勾结，派出英法联合舰队支援土耳其，一举歼灭了沙俄的黑海舰队。维多利亚女王忍不住了，因为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是她教父尼古拉一世的儿子，她请艾伯特亲王出面，劝内阁手下留情，不意流言蜚语不胫而走。

女王听到这消息后，大动肝火，一个时期内竟拒见内阁成员。

1861年12月，维多利亚女王经历了个人最大的悲剧；她的丈夫艾伯特亲王死于伤寒，年仅42岁。女王为此身心交瘁，再加上回忆起伦敦市民对艾伯特不友好的态度，她完全隐居起来，结果长时间英国的对外文书无人签署。

1868年本杰明·迪斯累利虽然只当了9个月的首相，但却与维多利亚女王建立了非常密切的个人关系。他给女王上书时，言辞夸张到了令人作呕的程度，但女王却毫无反感地欣然接受。迪斯累利私下里告诉一位朋友说：“人人都喜欢被别人奉承，见到女皇陛下，竭力奉承就行了。”

1874年2月，在朝的自由党格拉斯顿内阁自以为从政成绩斐然，宣布提前进行大选。谁知英国臣民当时见到德意志帝国兴起、美国在海外扩张，都觉得格拉斯顿政绩平平、无大成就。结果，自由党败北，保守党上台，迪斯累利第二次当上了首相。

迪斯累利上台伊始，就决定加强英帝国对殖民地的控制，一方面扩大英国在非洲殖民地的面积，一方面，对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这些要求自治的英国移民国家采取怀柔政策，允许自

治，但在经济、外交上仍应受伦敦控制。

迪斯累利还借机攻击格拉斯顿内阁紧缩军费开支的政策，指责自由党在欧洲缩手缩脚，对大英帝国的兴衰漠不关心。他说：“自由党执政时要瓦解大英帝国的企图结果如何呢？他们的希望完全落空了。为什么呢？因为殖民地支持宗主国。他们决定，不许任何人瓦解大英帝国。我以为，英国的大臣如果放过尽力振兴殖民帝国的机会，对于可能成为英国宝贵力量源泉的殖民地的支持态度不作出响应，他就未尽职守！”

迪斯累利是怎样抓住机会振兴大英帝国这个“日不落”的殖民帝国的呢？他的第一个举动就是收买下了苏伊士运河。

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世界东西海运航路缩短了近一半。然而，苏伊士运河并没有给埃及带来直接利益。埃及为运河修筑担负了1600万英镑的费用，不得不大量向法国举借外债。1875年，埃及遇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伊斯梅尔打算卖掉埃及政府持有的占44%的运河公司股票来逃脱困境。

苏伊士运河是从英国通往“女王王冠上的宝石”——印度的生命线，迪斯累利早在当在野党领袖时就对格拉斯顿内阁对实际上的法国独占运河表示不满，现在他一听说伊斯梅尔想出卖运河公司的股票，连坐也坐不住了。

迪斯累利未通过议会，用从罗思柴尔德那里借来的钱购买了伊斯梅尔手中的全部股票，再加上一些小额股票，一举控制了连接东西海上交通的枢纽苏伊士运河。当迪斯累利在议会宣布英国已控制了这条海上大动脉并带头高呼“女王陛下万岁”时，整个议院大厅只有议员们的欣喜欢呼，听不到一句敢于谴责的话。迪斯累利挺着腰板，在议员们雷鸣般的掌声中走出威斯敏斯特宫。

胜利应当一个接着一个。1875年英国人欢呼迪斯累利的决断力，而迪斯累利盘算着怎样再做一件震惊欧洲，打击格拉斯顿自由党的事情，他想起了印度……

1876年，迪斯累利未事先与女王商量就在议会提出议案，要求授与女王以印度女皇的尊号，“君主怎会拒绝为自己增加新的尊号呢？”迪斯累利私下里对党内同仁们说。

女王对这一头衔津津乐道，后来议会通过了这一提案，将嵌有印度著名“月亮宝石”的新王冠戴在她头上时，女王自孀居以来始终留在脸上的沉闷气氛一下子一扫而光。

看来迪斯累利的提案使女王深深地感到了满足，不久，她敕封迪斯累利为比孔斯菲尔德勋爵，并在自己儿子威尔士亲王的婚礼上，破例允许放两把椅子，让迪斯累利与自己并肩坐在一起。

一个转奉英国国教的犹太人能得到女王的如此恩宠，可谓是荣极一时了。然而，当1877年初“东方问题”再度爆发起来时，他又振作精神站了起来。

在列强中，反对巴尔干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反对沙俄向南推进的到这时只剩下英国一家。迪斯累利担心俄国占领黑海海峡、甚至占领奥斯曼帝国会威胁苏伊士运河的安全，他对手下人说：“打开印度的锁钥是君士坦丁堡和黑海海峡，而不仅仅是埃及和苏伊士运河，一旦奥斯曼帝国解体，我们就将面临拿破仑战争以来最大的威胁。”

1877年4月俄国对土耳其宣战，开始进展迅速，但在普利弗那，俄军受阻于土耳其军队。迪斯累利训令英驻土大使莱亚德劝告土耳其“邀请”英国舰队开进黑海海峡，但大使并没能完成这项任务。1878年1月，俄军终于突破普利弗那，兵临土耳其首都君士坦丁堡城下。

迪斯累利本意也不想打仗，但他知道，如果俄军继续留在君士坦丁堡城外，随时都会对英国的海路安全造成威胁。为了既不打仗，又让俄国人退回去，他派人去找安德拉西伯爵。这位奥匈帝国的首相明白，倘若俄军驻守在保加利亚，他的国家再向南进就成了死路一条。安德拉西呼吁俾斯麦出面调解，德国首相同意了这个要求。

由于俾斯麦的调处，英俄之间的争论停息了。

在后来的几个星期里，迪斯累利在他的仕途中登上了顶峰，行人看见他的马车都脱帽致敬，女王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庆功宴会，连布雷德福夫人也再次回到他的身边。然而，没过多久，命运女神就对他收敛了笑容。

俄国从土耳其退出后，又开始向阿富汗扩张。迪斯累利知道，一旦俄国人占领阿富汗，英帝国的印度殖民地就岌岌可危。他横下心，于 1878 年发动了侵略阿富汗的战争，虽然迅速地占领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但没有多久，阿富汗人民就发动反英起义，夺回首都并杀死了英国驻喀布尔殖民当局的官员。

一波未伏，一波又起。1878 年底，布尔人又掀起了反英起义。因为这些，保守党在 1880 年 4 月的大选中失败，执政 6 年的迪斯累利内阁也宣告结束。

1881 年 4 月，迪斯累利因病去世，终年 77 岁。他的死给维多利亚女王带来了悲哀。当女王听到这一噩耗时，放下了自己正在批阅的文件，“亲爱的”，她对自己的私人秘书说，“在这样一个可怕的时刻，当我泪流满面、无法看清时，我是没有办法继续工作的……”

卡米洛·加富尔

“没有罗马就没有意大利。”

1859年4月29日晚，奥地利军队共十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和一个后备师渡过蒂奇河开始军事行动。皮蒙特只有6万军队，还不及奥地利派出部队的一半。加富尔所依赖的是拿破仑三世许愿的15个步兵师、3个骑兵师和3个骑兵旅，但他知道，如果皮蒙特军队不能顶住奥军的初次进攻，拿破仑三世无论如何也不会下命令让法军出击的。皮蒙特的命运押在了加里波第的身上。

加里波第不愧是战争的英雄，当奥军向南渡过蒂奇河时，他率领军“阿尔卑斯山猎兵团”北渡蒂奇河，插到了奥军的背后。

6月2日，皮蒙特军队与到达战场的法军一道，在马占托向奥军发起进攻。艾曼努尔二世亲自率骑兵冲锋陷阵。

马占托战役以法、皮两国军队大胜而告结束。奥军退至洛纳托，奥皇弗兰茨·约瑟夫撤掉居莱将军的奥军总司令职务，自己亲自担任主帅，企图扭转败局。

6月24日，在位于曼图雅山脚下的索尔费里诺村，法皮联军和奥军共35万人展开了激战。数百门大炮像连续不断的闪电一样将厮杀着的谷地劈成两半，千万声雷鸣般的巨响震耳欲聋，把整个战场搅得天昏地暗。突然，倾盆大雨白天而降，樱桃一般大小的冰雹伴着噼啪作响的枪声向士兵们打去。战败的奥地利军队仓皇逃命，对奥战争的胜利激发了意大利全体人民的爱国热情，托斯卡纳公国、帕尔马公国和摩地那公国都爆发了人民起义，赶走了与哈布斯堡王朝有血缘关系的大公，建立了临时政府，教皇国的罗曼纳、马尔克和翁布里亚三个省也声明脱离教皇统治，就连南意大利的那不勒斯王国也政局不稳。一心想继续分裂并控制

意大利的拿破仑三世一看意大利有可能实现统一，决定立即停止战争。7月11日，他和奥地利皇帝约瑟夫在维拉弗兰卡秘密签订协议；奥地利把伦巴底割给法国，法国再把它转赠给皮蒙特；由法国来恢复已被推翻的托斯卡纳、帕尔马和摩地那的大公政权，并由奥地利与这些公国及那不勒斯王国和教皇国分别缔约，建立一个以教皇为名誉首脑，而由奥地利实际领导的公国联邦，威尼斯将继续由奥地利占领。

维拉弗兰卡协议的内容在意大利一传开，过去热情洋溢的气氛立即被无限的哀伤与愤懑所取代。

最悲愤满腔、痛心疾首的莫过于卡米洛·加富尔了，他曾打算恳求国王在失去法国支持的情况下将战争继续下去，但一看到艾曼努尔二世那无可奈何的面孔，他又觉得自己应当对这种令百姓失望悲哀的局面负责。进退两难之中，加富尔向国王提出辞呈。虽然艾曼努尔百般挽留，加富尔还是含着眼泪离去了。

虽然成了“庶民百姓”，加富尔却仍然认为不能让意大利统一的事业半途而废。他组织了“民族协会”，并开始周游中意大利各邦国。他想在各地寻找自己的支持者，而当时中意大利人民的情绪使他又成为“国家统一舞会中的白马王子”。

1860年3月16日，通过公民投票，托斯卡纳、摩地那、帕尔和罗马尼阿成为皮蒙特王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当加富尔在艾曼努尔二世举行的庆典宴会上受到众星捧月式的恭维时，拿破仑三世的特使贝内代蒂风尘仆仆地来到都灵，紧急约见加富尔。

贝内代蒂向加富尔转交了法皇致艾曼努尔二世的一封信，信上除了繁文缛节的外交客套之外，最重要的一句话是：“如果皮蒙特政府按照普隆比耶协定将萨瓦和尼斯两地转让给法兰西帝国的话，法国皇帝将不对最近皮蒙特领土的迅速扩大表示异议。”

“这纯粹是讹诈！”加富尔看罢信后心里暗暗地大骂。然而，他还是按照外交上通行的礼遇向法国特使表示，他一定将信面呈皮蒙特国王，而艾曼努尔二世一定会“从兄弟情义的立场上”认真考虑拿破仑三世的要求。

1860年3月24日，在艾曼努尔二世的认可下，加富尔同贝

内代蒂签署了《都灵条约》，萨瓦和尼斯这两个居民都操法语的皮蒙特地区被划归法国。兼并与割让有时是相辅相成的，加富尔得到了东西，但也不得不让出原来属于自己的东西。

两天后，巴黎《箴言报》公布了法皮两国签约的消息。由于加里波第出生在尼斯，而加富尔从来也没向他提起过曾经有过一个普隆比耶“君子协定”，他为此勃然大怒。

加富尔始终坚持皮蒙特不能同时与几个对手作对，他对加里波第南下一事最终也持反对态度，生怕这位传奇将军打到罗马去，结果引起担任保卫教皇的法兰西军队的干涉。他曾下令给皮蒙特王国舰队，要他们阻止加里波第在教皇国登陆。然而当他听说加里波第一直南下到西西里时，他的态度又有了变化。加富尔认为，推翻波旁王朝在那不勒斯的统治有助于孤立教皇，但要先攻教皇国，法国就难免出来干涉。所以，他对艾曼努尔二世说：“加里波第的远征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但不管怎样，它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能犹豫，必须帮助加里波第。”

1860年5月15日，加里波第在西西里向那不勒斯王国的军队打响了第一枪，一个月后就占领了整个西西里岛。8月中旬，加里波第率9000名士兵渡过墨西拿海峡，开始进攻那不勒斯本土。在战争中，加里波第不断地得到来自皮蒙特的援助，第一次就收到1000支步枪和10万发子弹。加里波第清楚，如果没有加富尔的赞同，这些武器是不会这么快送到他手中的。

加里波第一路望风披靡，渴望9月份拿下首都那不勒斯市。这时，一些马志尼的信徒公开请求加里波第在南意大利建立一个崭新的共和国，而不是像中意大利那样并入皮蒙特。加里波第还来不及考虑这件事，但却急坏了在都灵的艾曼努尔二世和加富尔。

如果成立南意大利共和国，加富尔奋斗多年的统一事业就等于付之东流。但是，在皮蒙特与南意大利之间隔着罗马教皇国的马尔凯和翁布里亚两个省，如果不搞到这两个省，南意大利与皮蒙特在地理上的合并就是空话。加富尔知道，这件事只能去找拿破仑三世，因为守卫教皇国的军队就来自法国。

加富尔派马莫拉去巴黎与拿破仑三世密谈。签订《都灵条约》时，加富尔从拿破仑三世的信上看到了对皮蒙特的威胁。这一次，拿破仑三世在加富尔的信中读到了马志尼的名字，他心头一颤，想到了1858年发生的“奥尔西尼事件”，他似乎是无可奈何地挥挥手，告诉马莫拉：“如果你们想干那就干吧，但请干得快点儿。”

11月7日，当皮蒙特军队在艾曼努尔二世的率领下进入那不勒斯城的时候，两个月前就已占领该城的加里波第向国王呈上了10月21日南意大利人公民投票的结果：人们同意并入皮蒙特，意大利北部、中部和南部统一了！

1861年3月17日，上午9点半钟，乐队奏起了“吾皇万岁”的乐曲，宫殿柱廊上阳台的大门打开了，身着军礼服的艾曼努尔二世在两队军旗护送下走出来，他的身后是一大批显贵达官，其中有加富尔，但却没有加里波第。这是统一的意大利王国的开国庆典，艾曼努尔二世成为它的创业国王，而加富尔顺理成章地被任命为第一任首相。

新王国的首要任务是解决威尼斯问题和罗马问题，加富尔对这两个问题采取了不同的对策。威尼斯仍然处在奥地利军队的占领下，只有用武力才能把它拉回意大利的怀抱。加富尔在新国会向议员们说：“关于威尼斯，我们至少需要两年的时间使我们的武装力量准备妥当，在这以前宣战是愚蠢的、疯狂的行动。”

至于罗马，加富尔认为应当刻不容缓地加以解决。罗马城仍然由法国军队守卫着，法军不撤走，意大利王国就不可能定都罗马。加富尔再次派代表去巴黎与法国皇帝协商，要求拿破仑三世同意撤回法军，并让教皇放弃世俗的权力。法国皇帝说，只要是当地居民真心发出邀请，意大利国王可以非武装地进入罗马，在这种情况下，法军将撤回国内。拿破仑三世最后说，如果情况顺利的话，他愿意在六月中旬撤出法军。

1861年6月6日傍晚，加富尔从王宫乘马车返回官邸。他带着一天的劳累，也带着御前会议上得知拿破仑三世许诺的喜悦，一头靠在了马车的座椅上。马车到家时，车夫发现他早已在座椅

上溘然而逝……

1866 年，意大利与普鲁士结盟对奥地利宣战，通过战争收回了威尼斯……

1870 年，意大利乘普法战争中法军败绩，拿破仑三世被俘之机，进军罗马，并于次年一月正式迁都这一古老的城市……

意大利最终完成了自己的统一，然而这只能被看成 19 世纪 70 年代德意志统一的“附带结果”。

俾斯麦

1847年4月，威廉四世为了筹措经费修建一条连接东普鲁士和柏林的铁路，召集了八个省的各等级代表组成联合邦议会，讨论资金筹措问题。在这次会议上，自由派在威斯特伐利亚议员芬克的带领下，把会议的主题引到了国家结构上去。芬克面对威廉四世，指责道：“国王陛下，这是次封建等级制会议。这种中世纪的等级制会议，是与民主政治的选举议会格格不入的！记得威廉三世在位时，曾许诺成立国会，陛下为何忘掉了先父的遗训？”

芬克质问性的发言，立即受到自由派议员和代表的热烈欢呼。

作为芬克的支持者，一位老者以“老战士”的身份走上了讲坛：“普鲁士人在1813年之所以愿同法国人打仗，只是因为国王答应等到德意志从敌人手中获得解放后，给他们一部宪法！”

老者的话音刚落，自由派的欢呼声席卷了大厅。

奥托·冯·俾斯麦再也无法沉默，他认为这是歪曲历史，也是对王权的诬蔑，他怀着满腔的愤慨走上了讲坛：“芬克先生们，你们的发言是在给民族的荣誉抹黑。历史的事实是1813年普鲁士遭到法国人打击，为了民族的尊严人民才起来回击抵抗。因此，民族解放战争与你们高谈的宪法，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是常识！”

俾斯麦的反击，使议会厅里的保守派喜形于色，仿佛像一发重炮弹准确地击中对方的心脏，芬克等人的脸上露出了难堪。各邦国君主派到这次会上的观察员，对俾斯麦的发言发出了啧啧不绝的称赞；黑森大公园的公使在日记上这样写道：“在少数支持国王的观点中，有个叫俾斯麦的年轻人表现突出，人们预言在今后的议会上，这个年轻人将发挥重要作用。”

威廉四世国王第一次知道俾斯麦的名字，并且对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在资产阶级革命风潮的冲击下，德意志各邦国中的自由派议员把挑战的矛头对准了封建贵族和王权，普鲁士作为一个大邦国，同样面临挑战。威廉四世不愿意放弃虚伪的民主和“贤君”的形象，面对这些挑战他采取了冷处理的态度。而作为封建贵族庄园主的俾斯麦，对资产阶级把矛头对准自身的利益十分憎恨，他于1848年6月征集了一批有影响的庄园主，联合签名上书国王：“决不同意任何没收私人领地的要求，如果发生这种不公正行为，我们呼吁要断然行动……”

俾斯麦没有坐等，他开始以极大的热情关注政治生活，他曾一度穿梭在柏林、波茨坦等一些城市中，在政界认识了一大批朋友。1851年法兰克福邦联议会重新成立，普鲁士需要派一名有坚定性格和外交才能的发言人去驻法兰克福。格拉赫再次抓住这次机会，向国王推荐俾斯麦：“陛下，他的忠诚和气魄已经证明，他的雄辩口才和对事情的务实态度，是足够担任这项使命的。”

威廉四世再三地犹豫之后，终于答应了推荐。

法兰克福的外交圈子中，奥地利代表图恩伯爵总喜欢在诸邦国使臣中，摆出一副大奥地利帝国的凌人架势，始终在一些场合流露出奥地利是德意志盟主的情绪。俾斯麦虽然作为德意志诸国中两强之一的公使出现，图恩仍然没有把他放在眼里。俾斯麦对联邦议会由奥地利所主持大为不满，他认为这种态势不会使普鲁士的外交处境有所改善，他悲观地写信给外交大臣曼托菲尔：“我对邦议会的结果会有利于普鲁士，是不抱任何希望的。”

1854年，普、奥两国达成协议，把两国共同防御同盟条约再延长三年。俾斯麦向国王和外交大臣建议，“我们应当把军队布防在西里西亚，一旦形势需要，军队可以迅速地越过边界进入奥地利，用实力把‘德意志仲裁者’的地位从奥地利手中夺回来。”

威廉四世拒绝俾斯麦邀请拿破仑三世的建议，他指责“这是冒险外交”。俾斯麦再度被冷落，他心中埋藏着不可言状的痛苦和烦恼。

俾斯麦在仕途中又押错了筹码。他全神贯注地围绕着国王威廉四世、政治密友格拉赫和外交大臣曼托菲尔，甚至于被国王多次冷落也没有放弃尽忠尽力。

重大的人事变动是俾斯麦始料不及的。1857年10月，威廉四世患中风无法料理国事，由已年近60的弟弟威廉一世接管国王权力。为了显示自己在普奥关系上的独特见解，用以取信于威廉一世，俾斯麦起草了一份长达92页的《蓝皮书》，其中写道，“……普鲁士应当利用德意志民族情绪，争取其他邦员国的支持反对奥地利。因为奥地利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他没有资格在德意志邦联中充当指挥家的角色。只有这样，统一的使命才能由普鲁士及早完成。”云云。

威廉一世不但没有理睬俾斯麦的《蓝皮书》，反而用清洗保守派的作法表明对俾斯麦的不信任：格拉赫被排挤出宫廷圈子，回了他老家的庄园，首相兼外交大臣曼托菲尔的职务被解除，以芬克为代表的自由派在议会中赢得了210个席位，保守派仅占59个席位。芬克在议会中对俾斯麦的《蓝皮书》加以无情嘲笑和尖刻批判。俾斯麦的仕途一片迷茫……相反，俾斯麦的朋友罗恩少校却在威廉一世的决策圈子中走红起来。他四年来一直追随威廉一世在科布伦茨，此时已当上了将军。威廉一世执政的第一件事就是委任罗恩为陆军大臣，主持军政大事。

1859年5月，意大利与奥地利之间爆发战争，拿破仑三世应意大利要求派军队开进意大利北部。俾斯麦立即向威廉一世写信献计：“一次绝好的机会，让奥地利与意大利打得不可开交，我们只需在背包里装上新的界桩……”

威廉一世没有理会乘机挤走奥地利而统一德国的建议。俾斯麦只好遗憾地长叹。

奥、意战争一个月后，奥地利军事上连连失利。威廉一世没有乘机落井下石，而是派军队驻扎在莱茵河畔对法军施加压力，以解奥地利之危。俾斯麦又一次仰天长叹道：“统一德国的良机又一次丧失殆尽了……”

对于俾斯麦的反感，几乎促使威廉一世下决心解除他的职

务。但是，俾斯麦的职务最终没有被解除，也许是罗恩陆军大臣从中发挥了作用的结果。45 岁的俾斯麦由于多虑国事，脑门上已经布满了深深的抬头纹，头顶上秃了一大片，浅褐色的头发开始落下微霜。脸色显得十分苍白。1862 年 5 月，他移交了驻俄公使的职务，被派往巴黎担任驻法大使。

而此时的普鲁士首都柏林，却出现了政治危机，议会与国王之间的冲突使政局乱成一团，威廉一世处于焦头烂额之中……1862 年 9 月 17 日，陆军大臣罗恩认为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他立即给俾斯麦发去加急电报：“速来柏林，危机在继续！”

这是划时代的召唤，是从此开始了俾斯麦铁血首相的先声……

郭嵩焘

郭嵩焘（1818～1891年），湖南湘阴人。他是晚清第一个正式领衔出使西方、真正走向世界的中国人，也是中国近代洋务思想家、中国职业外交家的先驱。

郭嵩焘从小就受到了标准的中国传统教育。1835年，郭嵩焘考中秀才，后进入湘学重镇岳麓书院读书。在这里，郭嵩焘深受岳麓书院经世致用的湘学传统影响，结识了同在这里读书的曾国藩、刘蓉等名士，并与他们结为挚友。

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郭嵩焘第五次参加会试，终于考中进士，从此步入仕途。此后不久，由于双亲相继去世，郭嵩焘只得依定制回乡居丧。乡居期间，正值太平天国进军湖南。在他的积极劝导之下，隐居乡间的左宗棠、曾国藩等人纷纷出山，组建“湘勇”镇压太平军。此后的几年，郭嵩焘一直随曾国藩参赞军务，并在官场中建立了一定的“关系”。1856年末，郭嵩焘到京城出任翰林院编修，咸丰帝对他的学识非常赞赏，让他入值皇帝的私人咨询机关南书房。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咸丰帝派郭嵩焘到天津前线随僧格林沁帮办防务，随后又命其前往烟台等处海口稽查隐匿侵吞贸易税收的情况。郭嵩焘是文人，本来就与当时污秽不堪的官场习气格格不入。在任上，他采取种种有力措施整顿税务，查办贪官污吏，大大增加了清政府的收入。但其随员和地方官员因他破坏了官场长期以来的“规矩”，联合起来贿赂京城官员，在背后告了郭嵩焘的黑状。正当郭嵩焘自以为有功于朝廷的时候，却突然被调离查办。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亲眼见识了英国先进的军力，使得郭嵩焘比同时代的其他人更为迫切地关注西方。1859年2月，他给皇

帝上疏，要求清廷培养专门的外交人才。在中国最早的三所外语学校中，他协办、主办了上海广方言馆和广州同文馆。

1861年，有感于近20年来夷务（外事）工作一再出现的怪现象，郭嵩焘沉痛地说，其实中国人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与外国人划定章程，与他们平等相处，不应该怕他们。但如果不了解外国的情况，一味用蛮力，反而会使夷乱加剧。

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清政府内部一些人逐步意识到不能再固守闭关锁国、孤立于世界之外的老路，希望通过向外派遣使节，与西方进行平等接触。

1875年，英国驻华使馆官员马嘉理率人到云南“探险”，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被杀，是为“马嘉理事件”。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借机滋事，迫使清廷与之签订了《烟台条约》。随后，英国政府又强迫清廷派大员亲赴英伦“道歉”。这个赔礼又丢人的差使落到了郭嵩焘肩上。后来，清廷索性又追加了一项命令，告诉郭嵩焘赔礼后不必回国，直接出任驻英国公使。近代中国第一位驻外使节就在这样的无奈与尴尬中产生了。

郭嵩焘出使英国的消息传出时，清廷内部有不少王公大臣与名士还恪守着“天朝上国”的狭隘观念，把郭嵩焘的出使行动看成是毁掉一世清名的差使。在当时人的眼中，郭嵩焘的洋务主张就已经标新立异，令人侧目了，而这次，他竟自弃父母之邦，远赴夷人之国，简直是匪夷所思。他的一些湖南同乡更为他此行感到羞耻，甚至企图毁掉他的老宅。当时，有人竟然编写了这样一副极为尖刻的对联来羞辱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作为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郭嵩焘没有也不可能接受世界形势、国际关系和外交学等基本知识的系统训练。他是靠着为数不多的材料和虚心考求去认识外部世界的。今天看来，他的认识比同时代的大多数人都高出一筹。

1876年2月，年近六十的郭嵩焘带了三十几个人到伦敦。那时中国驻外使馆小，不像现在这么多人，叫公使馆，因为最高代表是公使。一百多年以后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驻扎伦敦的外

交官们还把使馆叫公使馆，倒不是要纪念郭大人，这回原因是国家不让外交官们带夫人，使馆里全是男的。

郭嵩焘一到伦敦，2月7日在翻译马格里的陪同下觐见维多利亚女王，宣读到任国书，对马嘉里案表示惋惜，完成了烟台条约的任务。在伦敦，给中国使馆外交官们最大的惊讶是发现街上老百姓很少吵架，让中国的公使和副使纳闷大家日子怎么过得这么幸福。中国公使一千人的到来，也引起伦敦市井百姓的好奇。那时东方人还见得少，也就是四年前1872年日本在伦敦设了个使馆，时常出没几个东方面孔。一天中国使馆仆人上街买菜，奇装异服引来一个醉汉用手杖敲他们脑袋。路见不平的人把醉汉扭送到警察局，英国法庭以伤害罪判处该犯劳役，郭公使致信英首相请免去处罚。此事一见诸报，倒引来市民对中国人的好感。

郭嵩焘在英法两国前后呆了三年（1876—1879年）。那是中国的第一个驻外使馆，该干些什么都没谱。用今天的标准来看，郭虽然六十岁的高龄，一个人兼任了政务、商务、科技、教育、文化参赞和武官的所有责任。

郭发现用国际法和洋人打交道居然能屡屡得胜，他开始悉心研究，建议总理衙门编纂《通商则例》发给各省并各国驻华公使，使在处理外交事务时有所参本。郭在伦敦还一度被推为国际法改进协会副主席。

1877年（光绪三年）5月，刘步蟾、方伯谦、严复等人作为海军留学生，在监督李凤苞的带领下到达英国。抵英次日，郭嵩焘便在公使馆中设宴，为李凤苞等洗尘。在郭嵩焘的安排下，这些留学生一部分被分派至英国舰队中，另一部分则考入了皇家海军学院，此后成了公使馆的常客。在郭嵩焘的日记中，详细记录了他们之间的多次谈话。郭嵩焘经常阅读留学生们的日记，留学生们在留学心得中讲，英国人的微积分学、新学、力学等，都是以前没有读过的，现在学了这些，不啻事半功倍。郭嵩焘感慨地说：就凭这个也能证明出洋留学的好处实在不少啊！

1878年，郭遇到海军留学生严复，成忘年之交。郭嵩焘在英国访问期间，了解到很多身居英国的中国人的利益受到侵犯力量

孤单申诉无门，同年上奏清廷，建议在华侨集中的各埠设领事馆以护侨，该建议得到清廷赞赏，翌年即在新加坡、旧金山、横滨等地设立领事馆，以尽护侨的责任。今天世界各大埠的领事们不知还有多少人记得当初设领馆的由来。

郭还没忘记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1877年春把在英法的见闻尽快报告总理衙门和皇上。他把起程赴任从上海到伦敦途中五十天的日记，钞寄总理衙门，以《使西纪程》书名刊行，此书极力称赞西方社会及其科技文明。他没有想到此书引起的反响。郭还说把西方强盛归结于船坚炮利是错的，中国如果单纯学习西方兵学技术以求自强，恐适足以适敝履，只有学习西方的政治和经济，“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方之基”。

年逾花甲、读了大半辈子儒家经典、头脑里塞满了陈腐观念的郭嵩焘，现在却敢于承认西方的先进与中国的落后，而且承认得这样彻底，这在当时需要惊人的勇气。

郭嵩焘曾把使英途中见闻逐日详记辑为《使西纪程》一书，内容有称赞西洋政教修明、中国应采用其治国之道等话语。他将书寄回中国后，呈总理衙门刊刻，一时激起满朝士大夫公愤，要求将其撤职查办。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参劾他“有二心于英国，想对英国称臣”；结果此书被清廷申斥毁版，严禁流行。在当时的条件下，就郭嵩焘所属的那个社会阶层而言，他已经走得太远。这使他难安其位，不断受到攻击，而最为恶毒的攻击便来自他的副手刘锡鸿。

在刘锡鸿的笔下，郭嵩焘的最大“罪状”有三：披外国人的衣物、向其他国君主起立致敬、听音乐会时效仿洋人索取节目单。由此足见当时国人愚昧之深。刘还秘密弹劾郭嵩焘“十款”罪状，极尽罗织诬陷之能事。刘锡鸿指责郭嵩焘的“罪状”，其实都合乎国际礼仪，这反而印证了英国人称郭嵩焘为“所见东方最有教养者”的赞誉。由于清朝守旧势力过于强大，从朝廷到京师大夫对郭嵩焘一片唾骂指责之声，他只得在任期未满（仅仅一年零七个月）之时，奏请因病销差，清廷立即同意并派曾纪泽接任。

郭嵩焘于 1879 年 5 月 5 日乘船到达长沙。当时湘阴正好发生守旧排外风潮，形势颇为紧张，连用西洋小火轮拖带的木船都受到长沙、善化两县国人的阻拦，大骂郭嵩焘“勾通洋人”的标语贴满了大街。

出使之日，郭嵩焘曾经壮志满怀，期望以此行引进西方治国之道，使中华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无奈铩羽而归。郭嵩焘在唾骂声中出使，又在唾骂声中回国。他已失去继续奋斗的信心，回国后便归隐乡里。尽管郭嵩焘钦差使臣的官衔暂时尚未解除，但自巡抚以下的地方官员都对他傲慢异常。郭嵩焘死后，虽有官员请旨按惯例赐谥立传，也都被清廷否决。

直到他死后 9 年，义和团运动高涨之际，还有京官上奏要求开棺鞭戮郭嵩焘的尸身，以谢天下。晚年时，郭嵩焘曾三次申请开办轮船公司，但终归化为泡影。他自信：“流传百代千年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乔治·克利孟梭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王太子斐迪南在波斯尼亚的萨拉热窝被塞尔维亚爱国青年普林西波刺死，酝酿多年的世界大战终于以此为导火索而爆发。

8月2日，德国向法兰西宣战，德军按照施里芬——毛奇计划，穿过比利时，大规模入侵法国。8月底，德国军队攻到了马恩河，离巴黎仅100余公里。法国政府内外一片混乱，9月2日迁往南方城市波尔多。

时任国会议员的乔治·克利孟梭气得胡子上翘，他在议会中大喊大叫，要求法国以复仇的精神打败德国，为普法战争的失败雪耻。

然而，自马恩河战役后，德法战场形成僵局。虽然法国赢得了凡尔登会战的胜利，但由于损失太大，根本无力转入反攻。1916年结束时，双方都未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克利孟梭再也忍不住了，他在自己办的报纸《图图人》上发表文章，矛头直指法国总统彭加勒。1916年5月，尼维尔指挥法军在苏瓦松和兰斯一线出击，五天内损兵折将十万人，战局却毫无进展。5月15日，尼维尔被解职，白里安也不得不引咎辞职，雪里博继任总理。

在这种形势下，谁能使失败的情绪一扫而光，使“民族的活力”重新振奋起来呢？彭加勒清楚地知道，这人只有一个，他就是克利孟梭。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彭加勒的“爱国主义”终于战胜了他对克利孟梭的个人恩怨，他请克利孟梭出面组阁，克利孟梭又重新踏上宦途。

1917年底，威尔逊总统领导的美国派兵在法国登陆，支援精疲力尽的英法军队对德作战，战局出现了有利于协约国的转变。

然而，“一山容不下二虎”，克利孟梭与贝当将军的矛盾又暴露出来。粗暴，这是克利孟梭与贝当的共同性格，但贝当粗暴得近乎冷酷，而克利孟梭的粗暴则近乎狂热。克利孟梭常常火冒三丈地指责他的陆军总司令不向他详细及时地汇报战况，而越是在这种场合，贝当越是一言不发……针锋相对的矛盾使得克利孟梭不得不请出老将福煦元帅，由他担任协约国联军总司令。

1918年11月11日，双方签订了停战协定，历经四年血腥厮杀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

消息传到巴黎，77岁的克利孟梭老泪纵横地喊道：“我总算等到了这个复仇的日子！”由于1917年国力重振，法国人把胜利归功于克利孟梭。法国议会一致通过法令，指出：“乔治·克利孟梭作为公民、总理兼陆军部长，为祖国立下了伟大的功勋。”

的确，克利孟梭主阁后很快使法兰西重振了民族活力，扭转了战局，保证了战争的最后胜利。不仅如此，他还在经历战争之后保留了军人应当受文官领导的共和传统，不让赢得胜利的元帅和将军们任意行动。12月1日，克利孟梭来到了战后的英国首都。

就在克利孟梭刚刚到达伦敦之时，12月2日，美国总统威尔逊也决定亲自率代表团前往巴黎，参加即将召开的和平会议。他是自美国建国以来第一位访问欧洲的总统。

1919年1月18日，27个国家的1000余名代表来到了巴黎的凡尔赛宫。

“三巨头”的协商内容是绝对保密的。这种做法不但引起其他国家和记者们的惊讶和不满，就连巴黎和会的主持人彭加勒也对于这种把他“挂起来”的做法十分恼火。但是，克利孟梭通过议会信任投票，得到了秘密处理和平条款事宜的权利。

“三人会议”上，劳合·乔治最关心的是殖民地问题，威尔逊则言必称应当以“和平公正原则”解决一切事务，要首先讨论国际联盟的盟约问题。而对于克利孟梭来说，法国的首要利益是法德边界和赔偿问题。他们数次开会，总没个结果。

三月的一天，“三巨头”又聚在一起继续谈论他们关心的实

质性问题。

克利孟梭毕竟是三人中的长者，“姜还是老的辣”。他看准了威尔逊想当世界领袖，就决定先让他一步，待他转移了注意力之后，再对付劳合·乔治就容易多了。

更何况他又成功地在《凡尔赛条约》第429条中规定：“法国可以在必要时推迟或重新占领该地区。”究竟谁该更高兴，只有上帝才晓得！

1919年6月28日签订的《凡尔赛条约》无疑是克利孟梭的杰作。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法国人的普遍赞赏。右派报纸攻击他只会跟着威尔逊屁股后面转；福煦称他的妥协是背叛、是投降；彭加勒骂他是“被国家敬之为神的疯子……”

和约签字的一个多月前，克利孟梭再一次下令向5月1日的游行队伍开枪，这使他在战争中表现出来的坚强刚毅性格完全为粗暴残忍的独裁者形象所代替。1919年底，他抱着必胜的信心参加总统竞选，想一举打败彭加勒并取而代之，没想到遭到惨败。于是，他从1920年起退出政坛，离开了巴黎，返回了他离别了数十年的旺代省。

从1920至1929年，这段时间内，克利孟梭几乎被人遗忘了。他除了每日整理花园、看报、写回忆录之外，偶尔也外出旅游、打猎，并在回来后写些散记。

1929年11月24日，克利孟梭在孤独中死于旺代省故居，终年88岁。他的遗嘱是这样写的：“我死后，请将我的遗体葬在我父亲贝雅曼·克利孟梭的墓地旁边。我的遗体应当直接从太平间送到墓地，不进任何教堂，不搞任何有仪式的葬礼。我的坟墓应与我父亲的一样，不立墓碑，只安一圈铁栅栏即可。”

克利孟梭被人遗忘了，在他死后的十年间，没有一个法国政治家曾在公众场合提起他的名字。

孟尼利克二世

一队死气沉沉的战俘，戴着木枷，被绳索捆绑着，在山间峡谷的羊肠小道上缓缓地向前移动。11岁的绍阿国王太子孟尼利克也夹杂其中。他时而用胆怯的目光偷偷地窥视着凶神恶煞的押送官兵，时而被山谷里野兽们肆无忌惮地吞食人肉所惊吓，一张稚气的小脸被痛苦扭曲得不停地痉挛。

经历了几天的野兽般的生活，这支战俘队伍终于抵达马格达拉。其他成年战俘不是被充为奴婢，就是下落不明，小孟尼利克没有成年就成了西奥多手中的人质。西奥多警告绍阿国的盖拉族人，他们要造反就等于宣判了王子孟尼利克死刑。小孟尼利克在马格达拉失去自由，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

1862年，西奥多皇帝为了巩固统治，把都城从冈达尔南迁到马格达拉。从小孟尼利克成为人质开始，西奥多用武力平定了各诸侯国。“王侯纷争”局面结束，古老的埃塞俄比亚重新统一，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开始形成。同时，西奥多还发展军火工业，聘请德国人作技术顾问……埃塞俄比亚开始逐步富裕和强盛起来。都城马格达拉出现了商贾云集、市场繁荣、社会秩序稳定、各国人士往来的景象。孟尼利克在马格达拉从一个少年开始成长为一个体格健壮的青年人，他亲眼目睹了有“杀父之仇”的西奥多皇帝，使一个落后的国家初步呈现出太平盛世的苗头，他的心情复杂极了。一天，与孟尼利克父亲生前有着莫逆之交的沃洛省盖拉族女首领沃洛特夫人，偷偷地派人到马格达拉来看望他，同他进行了秘密的谈话。

1865年初，西奥多皇帝在埃塞俄比亚推行“同教”政策，排斥犹太教和伊斯兰教，梦想建立神人合一的基督教非洲帝国，因而开始积极扩军备战，恫吓埃及属国苏丹。为了扩军备战，西奥

多开始在国内追加苛捐杂税，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包括沃洛特夫人在内的一些昔日诸侯国的首领，也乘机把相当多的农民群众拉到自己一边，想借马拉科特王太子的影响号召盖拉族人联合起来的沃洛特夫人，认为起事争雄的时机成熟，立即派人秘密潜往马格达拉，帮助孟尼利克从西奥多的监视下逃出马格达拉，回到孟尼利克的出生地绍阿省安哥拉拉。同年中间，孟尼利克在盖拉族人居住的绍阿省宣布继承父亲的王位，称自己为孟尼利克二世，以一个诸侯国国王的身份走上政治舞台，此时他刚满 21 岁。

孟尼利克二世视英、法为埃塞俄比亚的侵略者，尤其是英国，这是因为英、法在海外殖民扩张中染指非洲之角较早。当英国的注意力被苏丹爆发的马赫迪起义暂时引走之后，意大利的侵略势力开始悄悄地填补了这一真空。孟尼利克对此毫无思想准备，他怀着善意去理解意大利的意图。1885 年，意大利从红海海峡登上埃塞俄比亚，迅速占领了北部的厄立特里亚地区，使埃塞俄比亚与红海隔绝了……

意大利政府在厄立特里亚立足之后，便露出了狰狞的面目，要求孟尼利克二世就意、埃关系签订一项条约。对意大利抱有幻想的孟尼利克二世同意了。就在他登上皇位后仅 40 天——1889 年 5 月 2 日，埃、意《乌西阿里条约》签订。该条约是一个不平等的条约，其中第 17 条原文如下：

“埃塞俄比亚万王之王陛下，在与其他列强或政府所发生的一切交涉中，可以借助于意大利国王陛下的政府。”

的确，孟尼利克二世的“以夷治夷”想法大错特错了。法国人暂时无力插手埃塞俄比亚，英国政府自然希望这个真空，宁可让意大利去填补，今后也不想让法国人去填补，因为强大的法国填补了这个真空，英国政府在未来需要时，想赶走法国人就很不容易，而要赶走意大利却相对的好办些。所以，英国政府眼下对意大利的做法抱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其他欧洲列强都各有盘根错节的殖民地利益，他们也不会为一个受凌辱的埃塞俄比亚站出来“伸张正义”，所以，孟尼利克二世希望列强主持公道的幻想破灭了。

1892 年 4 月，失望和愤怒折磨着孟尼利克二世，他算是看清了意大利这位“仁慈上帝的朋友”。他再次愤怒地写了“致欧洲列强书”，他在书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亚维护民族独立的决心：“如果远方的列强前来瓜分非洲，我是决不会袖手旁观的……”

为了对意大利政府进行报复，孟尼利克二世下令中断埃、意关于厄立特里亚边界划分的谈判。意大利驻厄立特里亚总督作为首席谈判代表，对孟尼利克二世的举动大为吃惊。在他的想象中，这位土皇帝还会像从前那样用乞求的口吻同意大利当局讨论问题，没想到他居然拒绝了边界谈判，使意大利在厄立特里亚上捞好处的企图落了空。于是，他气急败坏地向国内报告此事。

1893 年初，孟尼利克二世在各邦诸侯的支持下，决定对拒不满足埃塞俄比亚要求的意大利政府实施第二次报复。他庄严地宣布：《乌西阿里条约》将在 1894 年 5 月 2 日废除。

一些平日互相有些倾轧的封建诸侯，在这危及民族存亡的关头，也都放弃旧仇，一致表示支持孟尼利克二世抵御外敌。

伍德罗·威尔逊

1912年6月25日，美国民主党在巴尔的摩举行全国代表大会。一开始，克拉克、安德伍德和威尔逊得票大体相当。到了第十次投票时，安德伍德落马，克拉克取得多数，但还不到规定的三分之二多数。到第14次投票时，威尔逊开始得势。经过激烈角逐，加上双方代表的助威，到了第46次投票时，威尔逊终于获得了民主党的提名。

威尔逊的竞选口号是“新自由”——反对垄断，要求恢复自由竞争。当时美国垄断组织虽已控制了国民经济的命脉，但还没有占领一切阵地，因此威尔逊的口号颇受人数众多的中小资产阶级的欢迎。

然而，要把占选民多数的中小资产阶级争取过来，威尔逊还要战胜罗斯福。可巧罗斯福在巡回竞选中遭人暗杀，虽没亡故，但被送进医院。威尔逊马上发表声明：“我崇尚公平竞争，因此在罗斯福先生住院治疗期间，我将不参加任何竞选活动。我要用自己的行动来贯彻我们美国人最讲究的公平竞争原则。”

威尔逊的声明的确收到了积极的成果。在投票中，威尔逊战胜了所有对手，当选美国第28届总统。

1913年3月4日早晨，初春的华盛顿还有微微的寒意，但等到太阳升到半空时，又似乎带来了令人惬意的温暖。就在这一天，威尔逊登上典礼的主席台，在最高法官面前宣誓就任美国总统。

在上台的头两年，威尔逊采取了一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美国国内工商业的发展，但由于当时的世界形势正处在急剧大变动的的前夜，“山雨欲来风满楼”，威尔逊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外事务方面。

威尔逊很关注中国事态的发展，他曾打电话给孙中山先生，表白自己对“中国人民走向自由的运动寄以最大的同情。”但在实际上，威尔逊的目的是在中国国内找代理人，以避免日本在华取得更大的利益，从而排斥美国的势力。

美国最初拉住了袁世凯，但在袁称帝不成郁郁而终之后，又不得不对日本退让，签订《蓝辛—石井协定》，承认日在华享有“特殊利益”。

然而，威尔逊上台后首先予以重视的区域是美国的后院——拉丁美洲。1913年10月27日，他在亚拉巴马州的莫比尔市发表了“睦邻演说”，宣称：“我们同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就是人类大家庭的关系，其目的就是促进各国的真正自由。我们必须保证，不论任何时候，都不容许把物质利益置于人类自由和国家自由之上。”

威尔逊也确实采取了某些行动，以表示他“睦邻”的诚意。比如，他下令向哥伦比亚政府提供25007美元的“补偿费”，以补偿以前美国强行从哥伦比亚割走巴拿马给这个国家带来的损失。

这种作法好像不同于他的前任，但实际上，在威尔逊任总统期间，美国对拉丁美洲的干涉大大超过以往，其中对墨西哥人民革命的干涉就是最突出的例子。

自1876年起，维护封建庄园制度的波菲里奥·迪亚斯一直把持着墨西哥的政权。1910年，墨西哥人民举行起义，推翻了迪亚斯的统治，但到了1913年，政权又落到独裁者韦尔塔手中。

墨西哥人民不愿放弃民主权利，于是在该国北部出现潘乔·比利亚领导的农民起义，在中南部出现萨帕塔领导的农民暴动，以及由城市中产阶级代表人物卡兰萨将军领导的武装联合阵线。

美国原来是支持韦尔塔政权的，但发现韦尔塔与英国、德国的资本家有勾结，转而又支持卡兰萨。于是，1914年4月9日，威尔逊派兵4000人占领了墨领土韦拉克鲁斯港。

美国军队的行动使墨西哥内部各派立即停止了内战，宣布一致对外，并呼吁拉美各独立国家给予支持，使美国一下子陷入空

前孤立的境地。威尔逊原来就不擅长搞外交，又好一意孤行，现在碰到难题，只好找被他任命为国务卿的布赖恩求教。布赖恩毕竟老谋深算，他找来拉美“ABC”国家（即阿根廷、巴西和智利）驻华盛顿使节，要他们从中斡旋，使美国能下台阶，“不丢脸地”撤出自己的军队。

在“ABC”三国的调解下，威尔逊总算渡过了这一关。不过他不甘心，又同卡兰萨挂上线，给这一派提供军火支援，终于在1915年使卡兰萨取韦尔塔而代之，当上了墨西哥总统。

卡兰萨当政后，没有履行进行农村改革的诺言，反倒用美国军火武装起来的军队镇压比利亚和萨帕塔的农民武装。威尔逊为了使卡兰萨在今后能听从美国的摆布，允许他的军队通过美国领土，从侧后进攻比利亚的游击队。

美国的行为激怒了比利亚，1916年3月8日晚，比利亚带领由400人组成的部队，越界进入美国新墨西哥州的哥伦布城，向驻扎在那里的卡兰萨的军队发起进攻，共打死35人，其中也有几个帮助卡兰萨训练部队的美国军士。

比利亚的行动使威尔逊又一次找到直接干涉墨西哥内政的借口。3月15日，他下令约翰·潘兴将军率领一万美国陆军侵入墨西哥，扬言要活捉比利亚问罪。

然而，虽然美军实力雄厚、神气十足，但比利亚在广大农民的支持下与美军展开游击战，使得潘兴围剿了10个月，进入墨西哥纵深300多公里，几乎一无所获，最后不得不请求威尔逊同意撤军回国。威尔逊见无法取胜，只好同意。

穆斯塔法·基马尔

1905 年 1 月，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军事学院正在举行毕业典礼。

学院训导部里，手里拿着毕业证书的穆斯塔法·基马尔被保安宪兵当场逮捕了。

两个月后，宪兵当局没有拿到更多的真凭实据，只好将基马尔释放。但是，伊斯坦布尔军事学院在他的履历表上注明了“因该生在校期间表现出‘政治上不可靠’，嗜好‘禁书邪说’，不能分配回马其顿。”

马其顿是基马尔的故乡，是民族解放运动呼声最高涨的地区之一，青年土耳其党人在这里十分活跃。所以，官方不能让这样一个“危险分子”到如鱼得水的地方去。基马尔接到通知，他被派到帝国属地的叙利亚大马士革骑兵团服役。这无疑是官方的政治歧视，24 岁的基马尔上尉刚进入社会，就被责罚离开土耳其本土走向戍边的道路。

1913 年底，他被调到索非亚担任驻保加利亚武官。此时，欧洲列强在巴尔干半岛的利益争夺达到了白热化。土耳其经过 1911 年 9 月至 1912 年 10 月的意、土战争，1912 年 10 月和 1913 年 6 月的两次巴尔干战争，对外政策急骤地向右转，倒向德、奥匈同盟。恩维尔和塔拉特把捞回几次战争中土耳其失去的土地的希望，寄托在与德、奥匈同盟合伙上。基马尔得知后，向国内的恩维尔急切地呼吁：“土耳其如果轻率地参战，将是一场可怕的灾难！”

一个驻外武官的呼吁恩维尔根本不屑一顾。1914 年 8 月 1 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8 月 2 日，土耳其与德国在伊斯坦布尔签订秘密军事协定，8 月 10 日，德国“戈本”号和“布勒斯

鲁”号巡洋舰开进土耳其的达达尼尔海峡，10月29日，德国和土耳其联合舰队炮击俄国黑海沿岸地区，土耳其以实际行动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战。

作为一名军人，基马尔十分苦恼。他憎恨这场不义的战争，但他又是一个军人，似乎又没有理由不服从所谓国家利益的需要。

基马尔的军事才华和功绩，在伊斯坦布尔的军政界引来一片赞誉，连欧洲一些报刊也对他的英勇行为和军事天才予以连篇报道。土耳其议会一致通过授予他“伊斯坦布尔救星”称号，1916年4月，穆罕默德五世以土耳其苏丹的名义封基马尔为帕夏，土耳其政府批准晋升他为陆军准将。

在诸多矛盾中，基马尔准确地抓住了英、法间的主要矛盾，并决定利用矛盾。乘着基马尔安卡拉政府打了胜仗，法国政府照会各协约国，提议要修改色佛尔条约。驻在土耳其基里基亚和伊斯坦布尔的法国官员，还以形形色色的“非官方”身份去安卡拉访问，表示“同情”基马尔政府酌行动，诅咒英国人的可耻行为。基马尔认为机会来了；他私下里向法国官员表示：“安卡拉政府愿意考虑和维护法国在土耳其的经济利益。”

法国政府很快接受了基马尔传递来的秋波，议会里的大老板议员们更是感到亢奋，他们嚷嚷着要克利孟梭在同基马尔打交道中拿出诚意。克利孟梭派人向基马尔试探：“基马尔阁下准备进行什么级别的会谈？”

基马尔十分痛快地回复法国政府：“我愿意亲自参加会谈，只要法国政府有诚意。”

法国的叛卖果真动摇了协约国成员的信心。意大利停止了在土耳其小亚细亚的武装干涉，因为意大利政府认为伦敦不会把原来答应的利益给意大利，他犯不着再为英国政策而在安纳托利亚白白花钱。1921年秋，意大利把军队从土耳其安塔利亚地区撤出，并开始向土耳其投去愿意改善关系的友好微笑。

基马尔始终不忘，苏、土关系是土耳其对外关系最可靠的柱石，这根柱石是土耳其敢于硬着腰板与欧洲列强打交道的后盾。

继 1921 年 3 月 16 日在莫斯科签订了《苏、土友好亲善条约》后，10 月 13 日，基马尔又着手开始与苏俄南高加索地区的三个苏维埃共和国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签订了友好条约。接着，基马尔以土耳其合法政府首脑的身份，邀请苏俄著名将领伏龙芝率使团于 1922 年 1 月 2 日访问安卡拉，同时土耳其从苏俄得到了大批物资和巨额贷款。更重要的是，基马尔凭借苏俄一天天增强的世界大国地位，也提高了土耳其的国际地位。由于基马尔成功地利用法国，破坏了协约国的统一，色佛尔条约成为一张画饼，使英国陷入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的难堪境地。

10 月 11 日，穆达尼亚停战协议签订。根据协定，希军和所有其他国家军队从东色雷斯撤军，由土耳其军队接管，伊斯坦布尔和海峡暂时仍由协约国军占领，但全部行政管理由基马尔政权负责。至此，除伊斯坦布尔和海峡地区由少数外国军队暂时驻扎外，全土耳其已经由基马尔政府所控制。已成傀儡的穆罕默德六世瓦希德丁，也装模作样地前往大清真寺庆祝土耳其取得军事胜利。土耳其军官们用后背朝着他表示“欢迎”，并大声高呼：“穆斯塔法·基马尔帕夏万岁！”

10 月 29 日，土耳其宣告成立共和国，大国民会议选举基马尔为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基马尔是一位成功的、使土耳其从山河破碎之中改变厄运，并使其很快强大起来的卓越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和外交家，他不愧为土耳其的伟大民族英雄。在他生命最垂危的日子里，他把选中的继任者伊诺努叫到自己病榻前，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和欧洲列强斗争了这些年，唯有保持同苏俄的友谊才是土耳其的外交基石。”

1938 年 11 月 10 日，基马尔逝世。

富兰克林·罗斯福

富兰克林·罗斯福（1882～1945年）出生于美国的上流社会家庭，父亲是百万富翁。罗斯福幼年时曾多次跟随父母游历欧洲国家，18岁入哈佛大学主修历史和政治，1904年毕业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后任律师。1910年罗斯福初入政界，以民主党候选人身份当选为纽约州参议员，1912年连任，1913年31岁时任海军部次长，表现了卓越的行政管理才能。1920年罗斯福以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身份参加美国大选，虽然败北，却由此成为全国闻名的政界人物。1921年罗斯福在加拿大参加了一次扑灭森林火灾的战斗，由于过度疲劳后又下水游泳，染上了脊髓灰质炎，致使下肢瘫痪。1928年至1932年罗斯福任纽约州州长，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以政绩优异提高了威望。1932年罗斯福以“新政”作为解决危机的出路，当选为美国总统。任期内进行许多改革，使美国资本主义走出危机。1936年、1940年和1944年罗斯福多次当选为总统，是美国历史上惟一获得四次连任的总统；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罗斯福站在反法西斯势力一边，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临终前他仍致力于创建联合国。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在伏案工作时突然患脑溢血与世长辞，终年63岁。

罗斯福是美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总统之一，他的治国方略和外交谋略很值得后人借鉴。

他一反传统的治国谋略，视改革为“新政”的核心。罗斯福上任伊始便宣布，全国银行一律“休假”，以利于财政部对美国金融体制进行整顿。在工业生产上，国家负责调节各企业之间、雇主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国家投资举办“公共工程”和“劳动营”，以减少失业大军。在农业上，国家以给农民适当补助的

形式削减农业生产，消除农产品“过剩”现象。在社会福利领域，国家担负起维护社会公正原则的责任，采取美国有史以来第一项措施，向穷人和失业工人提供帮助，为失业者创造就业机会。

睦邻“后院”的治“家”方略。罗斯福采取的睦邻政策，也是值得称道的。为了保证美国的国家安全，首先须得保持美国“后院”即拉丁美洲的友好与稳定。他上任伊始，便对外交政策进行了战略性调整，首先是采取巩固“后院”的策略。

罗斯福坚决摒弃孤立主义，采取“自救先救邻”的外交策略。20世纪30年代后期，日、德、意法西斯的侵略野心不仅威胁到欧亚两洲，而且威胁到大洋彼岸美国的安全。但美国国内强大的孤立主义势力仍然坚持美国不应介入欧洲事务。罗斯福敏锐地认识到希特勒称霸世界的野心，迫切感到，美国必须援助欧洲方能“自救”，美国为了自己的民族利益必须援助英法等国家。罗斯福首先促进国会两院修改了“中立法”，允许英法等国现金购买美国军火。1940年夏罗斯福提出“租借法”，指明美国的敌人是法西斯势力，美国必须成为民主国家的伟大兵工厂。1941年罗斯福与邱吉尔发表“大西洋宪章”，提议建立集体安全制度。珍珠港事件后罗斯福抓住时机，使美国彻底摆脱“孤立主义”，成为反法西斯联盟的重要成员。罗斯福的外交谋略使美国为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美国二战后确立世界政治大国地位，成为资本主义世界霸主奠定了政治基础。

罗斯福是美国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他在二战期间站在反法西斯的立场上，为二战的尽早结束做出自己的贡献，也为联合国的成立做了很多工作。

威廉二世

威廉二世迷上了英国作家休斯顿·斯图亚特·张伯伦的著作《十九世纪的基础》，他愈看愈感到振奋，对其中有的章节还写了心得和划上红杠。“本来，这样的杰作应当是由德国人来写。而英国人则帮我们完成了一项符合民族发展规律的理论，我不无崇拜张伯伦先生的天才！”威廉二世兴致勃勃地对海军部长梯尔皮茨说。

《十九世纪的基础》一书，从横跨欧洲大陆的神圣罗马帝国兴起达九个世纪展开，以日耳曼民族为主导地位曾威震九个世纪为线索，展示了日尔曼民族在军事、科技、经济和文化上的成就和影响，从而得出一个十分荒谬的结论：日尔曼民族是人类中“优秀的人种”。德意志帝国是以日耳曼民族为主体的国家，能刺激威廉二世的显然是“大日耳曼民族神圣”的狂妄沙文主义情绪。在帝国议会的讲演中，威廉二世以无比的热情说：“俾斯麦推行的欧洲大陆政策十分狭隘，而今我奉行的是世界政策，柏林应当是‘世界都市柏林’，德国贸易应当是‘德国世界贸易’，德国与世界的含义是一致的，因为世界各地都应体现德国政策……”

帝国议会中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不光是瓦德西、梯尔皮茨、霍尔斯坦因等人狂热捧场，以斯土姆为代表的一大批资产阶级工业巨头们更是欣喜若狂，他们垂涎欲滴地注视着海外市场。

在庆祝德意志帝国成立 25 周年的集会上，柏林的德意志帝国电台播发了威廉二世慷慨激昂的贺词：“德意志帝国要成为世界帝国。在地球遥远的地方，到处都应当居住着我们的同胞。德国的商品，德国的知识，德国人的勤奋要漂洋过海……”

全世界，尤其是欧洲的英国、法国、俄国，惊悸地听着这称

霸世界的宣言，感觉到一个庞大的火药桶就在身旁，随时可能爆炸而祸及自身。

俾斯麦作为一代德国人的结束，到威廉二世时期的 1914 年，欧洲国家关系出现了原三个同盟国和兴起的三个协约国的对抗格局。美国和日本虽然是世界第一、第三号强国，但无法横越大西洋和逾越欧亚大陆插手欧洲事务。作为欧洲第一强国德意志，直接面临的是世界头号殖民大国英国的阻挠。要想扩张，德国的对手就在欧洲。“世界政策”的核心是称霸世界，德国开始和英国首先争雄。英国竭力想利用武力吞并南非，从布尔人手里夺得奥兰治和德兰士瓦两个共和国，因为这里的钻石和黄金对英国有极大的诱惑力。而德国也早就垂涎这个地区，威廉二世一面鼓动德国向这一地区输入商品，向德兰士瓦进行经济渗透，一面用金钱和军火支持布尔人对抗英国。

在英国自诩为世界第一大海军强国的问题上，德国也决不等闲视之。德国梯尔皮茨早就严峻地指出：“没有强大的海军，德国的世界作用就如同没有壳的软体动物。”于是，德国在 1898 年就通过了为期 20 年的庞大的海军计划，第二年又增加了一倍，目的是与英国在大海上争一雌雄。到 1914 年，德国已拥有各种战舰 232 艘……

面对这种威逼，英国迅速寻找盟友抗德。1920 年，英国与日本结盟，接着又向法国靠拢。法国是德国的“世仇”，法国一心想收复普、法战争中失去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同时在摩洛哥同德国彼此争夺。1903 年英王爱德华七世访问法国，1904 年 4 月 8 日两国订立《英法协定》，宣告两国为抗德联合起来了。德国勾结奥匈帝国，不但在巴尔干地区和黑海海峡一带修铁路，而且挑起战争，掠夺该地区国家，这一切严重损害俄国利益。一旦黑海海峡落入德国、奥匈帝国之手，俄国南下的大门就将被全部封锁，同时，俄国在财政上一直依赖英国和法国。1907 年 8 月 31 日，英、俄两国缔结《英俄协定》，调整彼此利益后联手反德，法、俄两国早在 1892 年就签有《军事协定草案》，内容规定无论何方遭到德国攻击，另一方即全国动员进攻德国……无形中，以

英、法、俄为代表的三国协约形成军事集团，共同抗衡原有的德、奥匈、意大利三国同盟军事集团。

威廉二世向外扩张的手一直伸到东亚的中国：1897 年他派兵占领青岛，强行“租借”胶州湾，为期 99 年，1900 年 6 月 20 日，德国安排一个“驻华公使在北京被杀”的阴谋，为德国直接派军队入侵中国制造借口。

为了使自己设计的“世界政策”得到国内支持，威廉二世十分重视毒化德国人民的工作。为此，威廉二世在国内大造战争扩张舆论，他带头号召成立“泛德意志同盟”。“泛德意志同盟”广泛地吸收知名作家、学者、工业资本家和全国地方有影响的议员参加。为了使“泛德意志同盟”富有活力，威廉二世亲自到该会发表演说，指使大垄断资本家斯丁纳斯和克虏伯之流直接参加该组织，并为该组织提供了大量经费。正是由于威廉二世为代表的统治集团的大力支持，德国形形色色的民间组织，以浓郁的政治色彩纷纷成立：殖民协会、海军协会、陆军协会、德意志青年协会以及由农场主成立的农场主联盟，由工业资本家成立的工业家联盟、汉撒同盟，中产阶级联合会等等，这些民间政治组织为追随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服务。威廉二世公开宣扬：“世界只有依靠德意志才能得救”，“我们是地球上的盐”，……

以“泛德意志同盟”为首的组织立即在全国各地大造战争舆论：“如果德国不去统治世界，那将从地球上消失，两者必居其一”，“我们必须扩张，对于我们来说获取新的领土是迫切需要，因为我们国家的经济利益要求我们作出这种选择！”

1904 年，柏林的一家报刊登载了一篇题为《泛德意志德国》的文章，该文章以最露骨和最无羞耻的论调说：“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日耳曼民族的德意志帝国，一个置于德国霸权之下的日耳曼民族的世界帝国！”

一些德国显贵要人也利用各种场合宣扬“世界是属于德国的合理性”，“日耳曼民族领导世界的总体进步是德国政府的责任”。就连德国参谋总长小毛奇将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还振振有词地说：“战争会开发和显露人类最优秀的光辉……”

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外交方针，呈立体式地把德国全面地领向世界大战的必由之路。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军备的扩张，资本主义发展最新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先进国家争夺市场斗争的极端尖锐化，以及最落后的各东欧君主国家王朝利益，都必然促成而且已经促成了这场战争。”

是的，全世界已经闻到欧洲的火药味了。

顾维钧

顾维钧（1888 ~ 1988 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少有的外交奇才。1888 年 1 月 29 日（亦说 2 月 12 日）出生在上海嘉定一个富裕的家庭。嘉定人杰地灵，“古贤近秀，代不乏人”。据载，仅明清时嘉定就出了 3 个状元，134 个进士，979 名举人。到了近现代，嘉定之域更是人才辈出，除顾维钧外，另外还出了两位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他们是吴学谦和钱其琛。

顾维钧从小聪颖过人，4 岁时入私塾读书。

1904 年，16 岁的顾维钧剪辫易服，远渡重洋，留学美国。他选择了在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国际法和外交。顾维钧的老师约翰穆尔曾担任美国助理国务卿，有丰富的外交实践经验，他以一个外交官的标准来要求、培养顾维钧。

1905 年，16 岁的顾维钧赴美国留学，入纽约州库克学院学英语，第二年便考入哥伦比亚大学，主攻政治和文学，4 年间获文学学士和政治学硕士两个学位，继而获法学博士学位。在留美期间，先后担任了《哥伦比亚月刊》经理和纽约中国留学生会会长。

顾维钧在美留学期间，有一次，后来成为他岳父的唐绍仪作为清朝政府的特使访问美国，在大使馆里接见了 40 位中国留学生，顾维钧作为学生代表致辞。唐绍仪马上就非常欣赏这个年轻的留学生，认为他是一个可造之材。于是，当袁世凯执政，他出任袁世凯的内阁总理时，他立刻向袁世凯举荐了顾维钧。那时，顾维钧正在准备博士学位的答辩，他的论文还只写了一个序章，邀请他回国担任总统府英文秘书的信件就寄到了纽约。

学业尚未完成，令顾维钧感到为难，他准备拒绝来自北京的邀请。当他把这一情况告诉导师约翰穆尔，约翰穆尔却不同意他

的选择。约翰穆尔对顾维钧说：你学习外交就是为了为国报效，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你应该抓住。于是他让顾维钧把《序章》拿给他看。看过之后，他告诉顾维钧：单独的《序章》写得就很好，就可以作为博士论文来答辩。在导师的理解和支持下，顾维钧顺利拿到了博士学位，于1912年启程回国赴任。多年后，顾维钧回忆起导师时说：约翰穆尔是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人。

8年前，顾维钧赴美留学时，还是一个年仅16岁的少年，而8年后他回到中国时，已是一位风度翩翩的英俊青年。

顾维钧回国后，先是担任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后来进入外交部任职，1914年晋升为外交部参事。他的才华在工作中日渐显现。由于顾维钧有着留学美国的背景，了解美国历史、政治和文化，又在这次外交中表现出了不凡的勇气和才能，其后不久，袁世凯任命顾维钧为驻美公使。那一年，顾维钧才27岁，那时的他还有着京城三大美男子之一的美称。这位年轻英俊的外交官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年轻的驻外使节，也是华盛顿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外国使节。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即将召开。当人们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时，顾维钧却正在为爱妻的去世深深悲痛。顾维钧的妻子唐梅是唐绍仪之女，二人感情甚笃。然而，在1918年有一场疫病席卷全球，今天被称作西班牙流感。唐梅不幸染病去世，留下了一儿一女。此时，顾维钧接到了担任全权代表之一的任命。北京政府任命的代表共5人，分别是外交总长陆征祥、南方政府代表王正廷、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公使魏宸组、驻美公使顾维钧。顾维钧因为家事，一度想谢绝任命，但最终，他还是决定为国出使。起程前，顾维钧专程拜访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威尔逊许诺愿意支持和帮助中国，这让顾维钧对即将开幕的和会多了一份信心和期望。1918年深冬，顾维钧抵达巴黎。这一年，他31岁。

刚到巴黎，代表团就遭遇到了第一个打击——和会席位问题。各个国家被划分为三等，一等的五个大国英美法意日可以有5席，其他一些国家3席，一些新成立、新独立的国家2席，中

国被划为最末一等，只能有两个席位，列强仍然把中国看得很低。虽只有两个席位，但五位代表可轮流出席。在代表团排名问题上，波澜又起。按陆征祥报送北京的名单，顺序依次为：陆征祥、王正廷、施肇基、顾维钧、魏宸组。然而北京政府的正式命令下达时排名却被换成了：陆征祥、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这就引起了王正廷和施肇基的强烈不满，在代表团中埋下了不和的种子。随着和会的进行，代表团内部的矛盾也在不断升级。中国准备向和会提出收回山东权利问题，但还没来得及，日本先发制人，率先在五个大国的“十人会”上提出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应直接由日本继承。大会通知中国代表到下午的会上作陈述。代表团接到通知时已是中午。这对于中国代表团又是一个晴天霹雳。

经过一番周折，确定由顾维钧与王正廷出席。下午的会议作出决定，有关山东问题，由中国代表次日进行陈述，1919年1月28日，顾维钧受命于危难，就山东问题作了一次缜密细致、畅快淋漓的精彩发言，从历史、经济、文化各方面说明了山东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力地批驳了日本的无理要求。在他的雄辩面前，日本代表完全处于劣势。各国首脑纷纷向他表示祝贺，顾维钧在国内外一举成名。这次雄辩在中国外交史上地位非凡，这是中国代表第一次在国际讲坛上为自己国家的主权作了一次成功的演说。

形势对中国本来十分有利，然而，到了4月，变化陡生。因分赃不均，意大利在争吵中退出了和会。日本借机要挟：如果山东问题得不到满足，就将效法意大利。为了自己的利益，几个大国最终决定牺牲中国的合法权益，先后向日本妥协，并强迫中国无条件接受。这一事件点燃了“五四”运动的火种。

面对如此现实，代表团心灰意冷，名存实亡，有的代表离开了巴黎，团长陆征祥住进了医院。和会最后一段时间里，顾维钧独自担当起了为中国作最后努力的职责，一直坚持到和约签订前的最后一刻。然而，不管顾维钧如何努力，都没有结果，中国的正当要求一再被拒绝。保留签字不允，附在约后不允，约外声明

又不允，只能无条件接受。如此情况下，顾维钧感到：退无可退，只有拒签，表明中国的立场。他把这一想法汇报给陆征祥，陆征祥同意了他的意见。于是，1919年6月28日，当签约仪式在凡尔赛宫举行时，人们惊奇地发现：为中国全权代表准备的两个座位上一直空无一人。中国用这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愤怒。签约仪式的同时，顾维钧乘坐着汽车经过巴黎的街头。他在回忆录中说：“汽车缓缓行驶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觉得一切都是那样黯淡——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历史上。同时，我案子想象着和会闭幕典礼的盛况，想象着当出席和会的代表们看到为中国全权代表留着的两把座椅上一直空荡无人时，将会怎样地惊异、激动。这对我、对代表团全体、对中国都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中国的缺席必将使和会，使法国外交界，甚至使整个世界为之愕然，即使不是为之震动的話。”这次拒签在中国外交的历史中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中国第一次坚决地对列强说“不”，终于打破了“始争终让”的外交局面，最后没有退让。这也是中国外交胜利的起点。以后，中国一步步夺回了丧失的主权。

巴黎和会悬而未决的山东问题，最终在1921年华盛顿会议上得到了解决。经过36次谈判，中日签署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件，日本无可奈何地一步步交出了强占的山东权益。在这次会议上负责山东问题并最终虎口夺食的，是33岁的顾维钧。

1944年秋天，是顾维钧代表中国政府出席了在美国敦巴顿橡树园举行的联合国筹建会议，第二年顾维钧又代表中国政府出席了首届联合国大会，并代表中国政府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后又努力使中国成为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统治已进入最后期限，而顾维钧也面临着他外交生涯中最为尴尬困窘的一页。

他请求美国政府指示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留驻广州，又请求美国拨款以帮助国民政府稳定军心应付财政，都遭到了无情的拒绝。

1956年初，叶公超传达了蒋介石要他去台湾议事的指令，顾

维钧以一个外交官的敏感意识到自己已到辞职的时候了。回到台湾，顾两次拜谒蒋介石，他开诚布公地说：“我已像一匹老马，体衰力竭了。”而蒋介石也并不表示挽留。后来，通过张群之口委任他为“总统府”资政，住在美国。就这样，顾维钧告别了外交舞台。这一年，他已是68岁的老人了，在纽约郊外的佩勒姆庄园租了一所住房，过上了隐士般的生活。

1972年9月，出席第二十七届联大的中国代表团成员章含之受毛泽东之托曾拜见过顾维钧，故人之女的来访使他异常高兴，他询问了大陆很多的情况。而对来自祖国的热情邀请，他既兴奋又遗憾，因为当时条件不成熟，他未能回国一访。在身居美国的几十年间，顾维钧始终未加入美国国籍，他的心一直牵记着那太平洋的彼岸，他曾满怀深情地说：“我常心怀中国，我知道，中国将会统一的。”

1985年11月14日，顾维钧在纽约的寓所去世。他一生最后一天的日记只有一句话：“这是平静的一天。”当98岁高龄的他离别这个世界时，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已不再是弱国外交。

马赫穆德·塔尔齐

1919年5月3日，阿富汗驻开伯尔山口的边防军，遭到英印侵略军的突然进攻。开伯尔山口的边防军奋起抵抗，第三次阿富汗抗英战争的帷幕拉开了。

整个五月，血与火的战争在阿富汗国土上交织，弱小的阿富汗人民以高昂的代价支撑着残酷的战争，不屈不挠地抗击世界上老牌帝国主义英国的进攻。苏维埃俄国首先在全世界范围内强烈地谴责英国政府，并庄严地宣布要给予阿富汗各方面的援助。刚刚经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磨难的各国人民十分痛恨战争，纷纷谴责英国的扩张政策。英国国内要求和平的呼声，也开始在社会各界直至议会中高涨，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外交大臣寇松内阁，在国内外压力下狼狈万状……

5月下旬，阿富汗军队停止了军事行动。切尔姆斯福收到阿马努拉提出媾和的信，信中字字句句充满了胜利者的口吻，强调“命令军队停战，正是对英印政府的宽宏大量……”

切尔姆斯福对阿马努拉的媾和建议，正求之不得。马赫穆德·塔尔齐估计对了，英印政府再也无力承担来自国际国内的政治压力。6月3日，外交大臣塔尔齐委任国王的弟弟阿里·阿赫默德·沙，作为阿富汗谈判代表团团长，赴拉瓦尔品第与英国谈判代表团进行首轮谈判。

塔尔齐交给阿赫默德·沙的任务是：首先是摆脱英国对阿富汗外交政策的控制，阿富汗不能为媾和丧失一寸土地，印度边境的独立部族地区是与阿富汗人同一的民族，是由于英印政府武装占领才成为英印政府属地的，因此英印政府应当归还伐济里斯坦和其他独立部族地区，要求英印政府付出一笔新的补助金。

阿赫默德·沙表示他一定不辱使命，并将随时向塔尔齐和王

兄报告。

拉瓦尔品第谈判进行了两个多月，英印政府外事秘书汉密尔顿·格兰特采取不让步态度，使得谈判断断续续，毫无进展。正在阿富汗困难之际，苏维埃俄国外交部通知阿富汗，苏俄准备就具体援助阿富汗进行磋商……

塔尔齐秘密将这个信息作为一个筹码，通知阿赫默德·沙：“把这个风吹到谈判桌上。如果英国人白浪费时间，阿富汗拿到了新的谈判日程表了。”

果然，汉密尔顿·格兰特开始改变了谈判态度。8月8日，阿富汗与英国政府签订了《拉瓦尔品第条约》。根据条约，英国政府承认阿富汗独立——这一承认没有写进条约正文中，而是在、汉密尔顿·格兰特致阿赫默德·沙的照会中提出的，阿富汗没有失去一寸土地，但阿富汗也没有收回土地，英国政府拒绝支付补助金，同时在第二条中规定，禁止经由印度把武器和军需品运往阿富汗，双方约定6个月后再重新谈判。《拉瓦尔品第条约》是一个暂时的和约，阿、英之间的相互紧张关系没有缓和，有关阿富汗独立的实质性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1919年10日，塔尔齐派特命全权大使穆罕默德·瓦里·汗将军，冒着深秋的寒风前往莫斯科，向列宁呈交了阿马努拉国王的友好信件，希望得到苏俄的援助。列宁毫不犹豫地支持阿富汗的抗英斗争，并在回信中重申：“苏维埃俄国郑重地承认阿富汗的完全独立。”

列宁派苏俄大使米哈伊尔·布拉文到达喀布尔，着手谈判对阿富汗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援助。布拉文带来了武器装备的样单。

这一切，使英印政府十分恼火，切尔姆斯福警告塔尔齐：“不经过英印政府的许可与俄国打交道，是违背甘达马克和约规定的。这将给未来的阿、英和谈带来直接损害。”

塔尔齐根本不予理会。

由于英印政府在拉瓦尔品第会议上，拒绝了边境独立部族要求回归阿富汗的愿望，独立部族的武装起义风起云涌，他们把打击的矛头指向了驻扎在边境地区的英国军队。11月，阿富汗外交

大臣塔尔齐提出了谈判边界独立部族归属的问题，再次遭到英印政府拒绝。塔尔齐对即将亲赴边境的纳迪尔·汗说：“老弟，您把边境独立部族人起义闹腾得愈欢愈好。”

纳迪尔·汗爽朗地笑着说：“等着瞧吧。”

1920年1月，纳迪尔·汗为配合塔尔齐的外交谈判，在边境召集了独立部族酋长会议，号召并用武器支持独立部族的人民起义。“为民族独立而战”的浪潮，强烈地冲击着英印政府的殖民统治，英印政府不得不要求重新谈判。

4月17日，塔尔齐亲自担任阿富汗政府代表团团长，在穆苏里与英印政府代表团谈判。7月18日，谈判终于因英印政府的让步取得了实质性突破——作为未来正式条约的准备，谈判通过了备忘录。英印政府在备忘录中保证：“绝对尊重阿富汗在内政和外交事务上的完全独立。”作为阿富汗历史的耻辱的甘达马克和约的根基开始动摇……

第三次谈判于1921年1月在喀布尔举行。阿富汗政府代表团团长仍由塔尔齐担任，英国政府代表团团长是特命全权公使亨利·多布斯。塔尔齐对亨利·多布斯作了一番了解，得知自己的对手是一个工于心计的职业外交官，他小有名气的手段是“扫除掉不利的谈判因素”。

与此同时，塔尔齐主持了扩大阿富汗对外友好关系的工作，利用国际环境，把外交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手里。2月，阿富汗与苏俄在莫斯科签订了苏、阿友好条约。亨利·多布斯为此再次提出强烈抗议，塔尔齐一概不予理睬，3月1日，阿富汗与土耳其缔结了友好同盟条约。亨利·多布斯在谈判桌上再次抗议时，支持阿富汗争取独立的土耳其总统凯末尔，反而抗议英国政府干预土耳其内政，6月，阿富汗又与波斯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塔尔齐还派出阿富汗政府代表团访问德国、意大利、法国和美国，代表团在所到之处都谴责英国政府破坏和谈的行为，宣扬阿富汗谋求彻底独立的愿望。这一来，英国政府因阿富汗问题，在国际上搞得声名狼藉。

亨利·多布斯清楚，塔尔齐手里的筹码就是获得了国际社会

对阿富汗独立的同情和支持，英国政治家们也意识到，不能再无视独立的阿富汗的存在了。

亨利·多布斯碰了壁，只好彻底认输了。经英国政府同意，11月22日，英国政府代表团在《英国阿富汗喀布尔条约》上签字。条约第1条规定，完全地和无条件地承认阿富汗的独立；第3条、4条和5条中规定，按照完全平等的原则建立了无需经过英印政府，而直接经过伦敦的英、阿正常外交关系……塔尔齐在谈判桌上的折冲尊俎，使阿富汗的完全独立终于以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

为了庆祝胜利，阿富汗政府在王宫和国防部附近修建了独立纪念碑，碑座上用铁链拴着一头狮子，它象征着在军事上和外交上战胜了不可一世的英帝国主义者。熟悉塔尔齐的官员发现，在伊德加赫大清真寺盘错的林荫道上，踏破晨露的人中已见不到塔尔齐。每当清晨，塔尔齐总是缓缓地来到独立纪念碑下，常常独自凝视……

莫洛托夫

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1890年～1986年），是苏联和世界外交舞台上叱咤风云的外交家，曾协助列宁、斯大林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成为他们最信任的助手。

1890年3月9日生于俄国诺林斯克（今基洛夫州），1906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1909、1915年两度遭逮捕和流。

1911～1912年，在彼得堡工学院学习。1912年，参加创办《真理报》。1915年再次被流放，次年逃脱。

1917年为党中央俄罗斯局的领导人之一，参加了二月革命。十月革命期间，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内战爆发后，被派往下诺夫哥罗德、顿涅茨、乌克兰工作。1921年，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处成员。V·I·列宁逝世后，他坚决支持I·V·斯大林。

1917年俄国二月资产阶级革命时，莫洛托夫领导俄罗斯局的工作。沙皇统治被推翻后，担任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委员会的领导工作。十月革命中，被选为该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彼得格勒武装起义的领导工作。十月革命胜利后，成为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918年夏季，1918～1919年，先后任北方地区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俄共（布）中央和苏俄政府驻伏尔加河地区全权代表，领导人民同饥饿作斗争。

1919年底，调任苏维埃下戈罗州执行委员会主席。1920年4月在俄共（布）第9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同年9月任顿涅茨州委书记，负责该地区工业的恢复工作。1921年3月，被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24年，出任党的中央农村工作委员会领导职务，主管农

业。

1926年起，任政治局委员。20年代和30年代积极反对L·托洛茨基和N·I·布哈林。

1927年~1928年，莫洛托夫兼任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书记。1930年，出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基洛夫被害事件发生之后，莫洛托夫成为三十年代苏联肃反运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1930~1941年，莫洛托夫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1941~1957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后称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

1939年5月~1949年，兼任外交人民委员（后称外交部长），1939年8月，谈判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1941年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外交部长），是斯大林国际谈判的主要代言人和顾问，曾多次冒着生命危险飞越敌战区上空与西方领导人斡旋。他善于使用外交手段维护苏联的利益，能言善辩，被誉为外交天才，尽管斯大林对他并不完全信任，他的妻子也遭到斯大林的迫害，但他自始至终都在坚定的支持斯大林，在斯大林去世后继续担任外交部长。

在外交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活动。因在发展坦克工业方面建树了功勋，1943年9月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1943年起，陪同斯大林参加了一系列重要国际会议。战后，历任苏共中央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外交部长、监察部长等职。

1947年初，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得以部分地恢复自己失去的地位。斯大林亲自领导了部长会议常设局，莫洛托夫成了他的第一副手，这就是说实际上是由他主持常设局的会议。

与此同时，斯大林把情报机关从国家安全部里抽了出来。通过政府决定成立了部长会议信息委员会（第四委员会）。它包括了国家安全部第一总局、武装力量总参谋部情报总局以及党中央情报和信息机构。有意思的是，领导信息委员会的不是国家安全部部长阿巴库莫夫，而是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但是领袖相对宽容的那个短暂时期很快就过去了。

1948年3月，莫洛托夫被免去了主持部长会议常设局会议的

权力，称此举是为了使他能够“主要从事外交政策事务”。

1952～1957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1953～1956年，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并兼任外交部长。因反对N·S·赫鲁晓夫的内外政策，1956年6月被免职。

1957年7月被指控为“反党集团”成员，解除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并被开除党籍。1957～1960年，任苏联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1960～1961年，任驻维也纳国际原子能机构常任代表。1962年退休。

1964年被开除党籍，勒令退休。但他始终为斯大林奔走。

80年代中期，他与苏联著名诗人丘耶夫结为好友，在丘耶夫与他进行的139次谈话中对斯大林给予了高度评价。

1984年3月，苏共中央决定恢复其党籍，1986年去世。

纵观莫洛托夫的一生，真正无愧于“铁锤外交家”这个光荣的称号。二战中，他冒着生命危险乘轰炸机访问伦敦、华盛顿与丘吉尔、罗斯福会谈，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立下汗马功劳。其后随斯大林出席一系列国际会议，以圆滑的外交手腕调解了盟国之间的矛盾，确立了战后世界的格局。

50年代初，在解决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上，他与周恩来配合默契，相得益彰，给狂妄的美国人一个深刻的教训。莫洛托夫意志坚定、性格倔强，素有铁锤外交家的美誉。莫洛托夫曾担任过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兼外交部长，4次荣获列宁勋章。

夏尔·戴高乐

1958年12月1日，68岁的夏尔·戴高乐当选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1959年1月8日，他在巴黎爱丽舍宫宣誓就职，获得重振法兰西大国地位的权力。紧接着，他便向以美英为盟主（实为美国）的北大西洋公约集团发起了挑战。因为法兰西的荣誉决不能容许在这样一个对世界格局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政治——军事同盟里充当小伙伴的角色。

1958年9月17日，戴高乐即向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及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发出正式信函，宣布鉴于法国在安全问题上承担的责任，它应当直接参与大西洋联盟的政治和战略决策；而这类问题过去却只限于美英两家共同决定；随着原子武器的垄断权将不再属于盎格鲁—撒克逊人（法国不久将拥有它），法国更有理由加入北约的最高权力集团。戴高乐提出，联盟的领导权应该属于三家，否则，法国就不再为北约的发展负责，并根据条约的第十二条保留对北约进行改造或退出的权利。戴高乐建议的核心，是要在北约理事会内确立一种“三头政治”的领导体制。

戴高乐一旦下了决心，就绝不会停步不前——特别是他在1958年11月—12月的大选中获得成功，拥有了新宪法赋予的特别权力以后。

1959年9月2日，艾森豪威尔在赫鲁晓夫将访问美国之前来到西欧，同戴高乐在巴黎进行了一次会谈。这次会谈，更使戴高乐觉得美国总统满脑子考虑的都是美苏关系的问题，似乎宇宙万物都要围着它转；在西方阵营中最重大的现实便是美国的现实，其他事物都只不过是次要的。

然而戴高乐并不认为，只要美苏的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就不在话下。他请艾森豪威尔懂得，美国没有权利包办西方所有国

家的对苏关系事务。

1960年3月23日至4月3日，戴高乐邀请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正式访问法国。在这次会晤中，戴高乐提出应该“在欧洲的范围内依次地推动缓和、谅解和合作”，因而“从大西洋直到乌拉尔在欧洲人之间建立起来往、联系和那样一种气氛”。在这里，戴高乐显然无视美国在欧洲的存在，使美国大为恼火。

1960年8月9日，戴高乐再次致函艾森豪威尔和麦克米伦，提议9月在百慕大举行三国首脑高级会议，麦克米伦的复信同艾森豪威尔的如出一辙，虽然简短些。两封信再次说明了英美“特殊关系”的作用。举行这样的会议，对法国是毫无意义的。戴高乐于是再不提三国首脑会议了。

1962年中，戴高乐到法国中部视察期间，在利莫日发表讲话强调说，法国在履行其对北约义务的同时，不会让任何别的国家牵着鼻子走，它将在联盟内部实行自己的“意愿”、“行动”和“政策”；法国的目标是“建设我们的欧洲”，而不再是“两个大国”的欧洲。

1963年1月，法国否决了英国参加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第一次申请。戴高乐认为，如果把英国纳入欧洲共同体，将不啻在共同体内安插了一匹美国的“特洛伊木马”。四年以后，戴高乐又一次地否决了威尔逊政府的第二次申请。

戴高乐一方面排斥英国，另一方面则争取联邦德国。在他的外交战略中，法德关系问题占据着重要地位。他认为，既然德国已经一分为二，历史不会允许再出现另一个俾斯麦或希特勒，那么，法国就应该同毗邻的联邦德国结成同盟，以推动西欧联合的车轮。阿登纳则似乎看穿了戴高乐的心思，同时也确信联邦德国绝不能没有一个友好的、可以相互倚重的邻居。在1958年9月，即戴高乐重新上台不到四个月，戴高乐和阿登纳在朗布伊埃举行首脑会晤。到了1963年初，戴高乐和阿登纳在巴黎签订了全面合作的法德条约。法德的合作关系，对于奠定西欧联合的格局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戴高乐和阿登纳为他们身后的历届领导人作出了样子，在涉及西欧的重大问题时，法德两国总是先进行磋

商。

在同苏、德修好以后，戴高乐即加紧了撤出北约军事组织的步骤。在此之前，戴高乐实际已在开始迈出撤退的步伐：

1959年3月：即他就任第五共和国总统的第3个月上，即下令法国地中海舰队撤出北约军事组织。

1964年5月4日，从北约海军司令部撤出法国军官。

1965年5月，宣布将不参加北约的军事演习。

1966年7月23日，法国在北大西洋防务学院的高级人员和学员在本学期结业后撤走。

1967年4月1日，北约最高司令部和中欧司令部总部从法国领土迁走。

1966年10月1日，法国正式退出了北约军事委员会。

这时，戴高乐已是76岁的老人了，却依旧雄心不减，斗志高昂！

戴高乐在他的晚年回首往事时说他最感欣慰的，莫过于在大国角逐中为法兰西民族赢得了荣誉，把法国独立自主的观念锤炼得更加牢固。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世界里第一个敢于向美国说“不”的国家领导人。他的退出北约军事组织的举措，给美国霸权主义基础以猛烈冲击。

1970年11月9日，戴高乐长眠于科龙贝墓地。

戴高乐逝世以后，曾盛情邀请他访问中国（原拟于1971年访华）的毛泽东从遥远的东方向戴高乐夫人发来唁电，向这位“反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表示诚挚的悼念和敬意”。

哈里·霍普金斯

1939年9月2日，法西斯德国突然袭击波兰，9月5日前，英、法两国被迫对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战场正式爆发。罗斯福总统对欧洲战局的形成是早有预见的，“战争是会传染的，与战争地点距离遥远的国家和民族，也会被卷入漩涡之中。”

持孤立主义的国会议员们便把矛头对准罗斯福，指责他想挑起战争，破坏了美国《中立法案》。

时任财政部长的哈里·霍普金斯是罗斯福主张的积极支持者，每一次罗斯福与孤立主义斗争的胜利，总留下一桩副产品——孤立主义者把发泄的矛头对准霍普金斯，霍普金斯替总统承担了种种仇恨。战争已经快降临到美国头上时，霍普金斯认为自己以商务部长的名义，继续扮演替罗斯福当仇恨靶子的路已经到了尽头，同时他再也没有必要为国内民众的温饱而发愁——战争机器运转起来，战时生产已经缓和了失业。霍普金斯决定辞去商务部长的职务。

罗斯福作为一个政治家，在这封信中划了一个真诚的“公”与“私”的界限。而事实将证明，他后来用“总统私人的代表”，“总统私人的顾问”使霍普金斯将权力和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

虽然美国还没有正式同德国和日本宣战，但罗斯福一直在考虑同英国建立军事合作关系。1940年圣诞节前后，罗斯福同霍普金斯——一个没有任何职务的人，在白宫进行了商谈。

霍普金斯立即扶案而起，锐利的目光闪耀出强烈的冒险精神，大声说：“总统先生，我到英国去一趟怎么样？”

1941年元旦刚过，罗斯福没有征求霍普金斯的意见，于3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霍普金斯将作为“美国总统私人代表”出

访英国。

美国驻英大使馆代办赫谢尔·约翰逊在霍普金斯到达伦敦后记述道：“我马上被霍普金斯决心要获取英国所需要的东西的第一手材料，那种强烈愿望和追求精神所感动。英国人第一次感到美国送来了真正的希望，这希望足以使他们渡过战争难关。”

1月14日，霍普金斯把了解到的丘吉尔的情况，通过海底电报，向罗斯福总统汇报。

当天晚上，丘吉尔陪同霍普金斯出席格拉斯哥市长举行的宴会。丘吉尔再度借这个机会发表了雅致的讲话，他提到罗斯福总统、霍普金斯以及“伟大的美利坚合众国民主政体”。

这篇“美国总统私人代表”的讲话顿时传遍英国，其影响达到决不是霍普金斯敢去奢望的程度：英国人把它看成是“美国人和我们站在一起”的一种保证。直至好些年后，英国人都在传颂霍普金斯在英国困难之时，送来了美国温暖人心坎的同情和信心，这远远比1940年美国提供给英国的一百多万支枪、900门大炮和50艘退役的驱逐舰要强得多……

1月30日，霍普金斯在伦敦还会见了挪威国王哈里曼，捷克斯洛伐克前总统贝奈斯先生。

霍普金斯在英国伦敦计划只呆两周，由于战局的发展，欧洲中心战场接踵而来的情报愈来愈多，以至于这位被任命为“总统助理和顾问”的显赫人物在伦敦停留下来。正当霍普金斯企图应丘吉尔要求，安排他和罗斯福在大西洋上会晤之际，6月22日，法西斯德国开始向苏联进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进一步扩大。

霍普金斯莫斯科之行立即进行。7月27日，他乘英国“卡塔利纳”型巡逻轰炸机秘密经欧洲北部抵达苏联阿尔汉格爾，他受到专程来这里的苏联三军代表，英、美驻苏使馆代表和当地政府官员的热烈欢迎。第二天，他抵达莫斯科，当天晚上六时，霍普金斯会见了斯大林。

霍普金斯除了在电报中向罗斯福汇报了斯大林的热情态度外，又列出了斯大林希望近期能得到援助的清单：“……大小高

射炮 2 万门，枪支一百万支，高辛烷飞机汽油，制造飞机用的铝板，短距离轰炸机……”

第二天下午三时，霍普金斯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进行了会谈。莫洛托夫对苏联远东地区有可能遭到日本乘机攻击，形成苏联东、西两线同时受敌表示担忧。所以，他建议霍普金斯转告总统：“以适当的方式向日本提出‘警告’。”

霍普金斯认为这个“警告”就是一旦日本进犯苏联，美国将向日本宣战。

当天晚上六时半，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霍普金斯，把苏联在东线抗击德军的态势作了全面介绍。这正是美国和英国急需了解的东线情况：从开战到现在，德军在苏联有 232 个师，目前苏联已增援到 240 个师，并有 20 个师的后备部队。到 1942 年，苏联可以动员至 350 个师，德国有可能动员到 300 个师，德国投入苏联战场有三万辆坦克。而苏军只有二万四千辆，空军方面各自有近八千架飞机，苏联每月能生产各种飞机一千八百架至二千二百架，现在飞机损失的数字已经倒过来了，德国多于苏联……

斯大林坚决地告诉霍普金斯：“我们可以战胜德国，虽然我们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正是由于霍普金斯客观地将苏联在欧洲东线的军事态势，苏联抗击德国军队的情况，以及苏联需要哪些物资支援的详细情况反映给了罗斯福总统，使总统在对整个欧洲战况和联合苏联共同反击德国上，作出了重大的外交军事决策。

霍普金斯的莫斯科之行受到了美国右翼舆论的非难。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城的《日报》挖苦他道：“假若罗斯福先生派到欧洲去的不是一个出手大方的使者，事情也许会好一些。在面临英国和俄国的真正需要时，很可能把超过我们自己所有的都送给人家……”

可是，霍普金斯的家乡依阿华州苏城的《日报》却说：“孤立主义者一定企图在霍普金斯飞往莫斯科这件事上捞一把……无疑又将来一套‘爬上床时喊一声斯大林’的把戏……然而可以相

信，美国多数舆论对已经作过的事表示毫无保留的赞同。”

霍普金斯对于故乡的宽宏大量表示特别感激，因为他自豪地认为自己的父亲曾经当过苏城《日报》的报贩。

8月，罗斯福总统与丘吉尔首相在纽芬兰的阿金夏港，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首次美、英首脑会晤，这便是著名的大西洋会议。丘吉尔为大西洋会议起草了一个“联合声明”，和美国代理国务卿韦尔斯起草的“联合声明”都有一段共同的话：“它们（美国与不列颠）所寻求的和平，不仅要永远地推翻纳粹暴政，而且是要通过有效的国际组织，使一切国家与民族获得安居乐业的手段。”等等。

大西洋会议给霍普金斯提供了一次对比美国 and 英国民主制度的机会。他看到罗斯福总统在远离本国的土地上，有完全独立的负责能力，只不过征求一下幕僚们的意见以图更准确行事。而丘吉尔则没有这个职权，他必须不断地向英国本土战时内阁汇报磋商。大西洋会议制定了八点声明、形成著名的“大西洋宪章”。在美国尚未参战的情况下，显示了罗斯福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气魄和勇气。当然，这里面也凝结着霍普金斯的功劳。9月，苏联发表声明，赞同“大西洋宪章”的基本原则，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正式建立的条件开始成熟。

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宣布对日、对德宣战，正式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

宋庆龄

宋庆龄（1893～1981年），中国近代女革命家、社会活动家、世界和平与进步事业的卓越战士，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1893年1月27日生于上海。父亲宋嘉树，字耀如，原名韩教准，早年漂泊美国，中年回国兴办实业，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支持者和亲密战友。母亲倪桂珍是中国较早接受文明，反对封建的进步妇女之一。

宋庆龄7岁时入上海中西女塾读书，1907年，15岁时偕妹妹宋美龄赴美国留学。先在新泽西州斯密特城私立学校学习英语，次年考入佐治亚州梅肯市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文学系。宋庆龄聪敏好学，思想活跃，经常参加学校的活动。听到辛亥革命胜利的消息，热情欢呼辛亥革命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

1913年，宋庆龄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她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和振兴中华的理想毅然回国，投身于“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的民主革命斗争。归国途中经过日本，拜会了她早已崇敬的孙中山先生。

宋庆龄从此就追随孙中山，致力于民主革命事业。1914年任孙中山秘书。同年加入中华革命党。1915年10月与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结婚，从此成为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在反袁、护法运动中，宋庆龄跟随孙中山往来于上海、广州之间，在韶关、桂林、梧州等地劳苦奔波，协助孙中山从事新的斗争。

1921年，她发动广州妇女组织“出征军人慰劳会”和红十字会，并亲自率领会员到前线慰问。1922年，军阀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她在危急形势下，坚持孤身留下吸引敌人，让孙中山先行离开险地，表现出献身革命事业的坚强意志和卓越胆识。此后，她参与孙中山同中国共产党代表李大钊、林祖涵等，以及列

宁所派使节马林、达林、越飞等商谈。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做了大量工作。

1924年，国民党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她积极支持、坚决拥护孙中山在大会宣言中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即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新三民主义。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她向国内外介绍了孙中山遗嘱，并决心继承遗志，奋起完成其未竟事业。

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她坚决维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对国民党右派进行坚决斗争，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1927年初，她在汉口创办妇女政治训练班，培养妇女干部，又同何香凝组织红十字会，发动慰问伤兵运动和策划战时救济工作。“四·一二”政变后，宋庆龄和国民党左派人士以及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等，联名发表了《讨蒋通电》。在“宁、汉合流”前夕，她又在汉口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宣布同背叛孙中山革命事业的人决裂。

同年8月1日，她和邓演达、毛泽东等二十二人，以国民党中央委员名义发表宣言，严正揭露蒋介石、汪精卫的背叛罪行。同年8月底，宋庆龄为寻求中国革命的道路，和完成孙中山生前访问苏联的遗愿，出访苏联。在苏、德、法等国期间，她参加了一系列国际性的反帝活动，1927年12月在比利时和1929年8月在德国召开的两次国际反帝同盟大会上被选为名誉主席，其后又成为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主要领导人之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全力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的各党派、团体以及广大官兵的抗日爱国行动。

1938年的“三八”节，她在香港发表《向世界妇女申诉》的论文，控诉日本法西斯以奴隶看待妇女的罪行，号召世界妇女援助中国。在宋庆龄、邓颖超等的努力推动下，全国妇女指导委员会发展非常迅速，促进了我国各阶层各党派妇女友好合作，在武汉抗战中起了它应起的作用。

同年，宋庆龄发起组织了保卫中国同盟，借此来“鼓励全世

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进一步努力以医药、救济物资供应中国”。为了这个目标，她领导“保盟”大力开展宣传工作，向全世界宣传抗日，介绍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战的事迹；坚持不懈地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

她崇高的国际威望赢得了各国人士的景仰，同情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人士和海外侨胞纷纷捐资捐物。当时人们希望在捐款的收条上得到她的亲笔签名，她曾为此磨破了手指。她还想尽办法冲破敌人的层层封锁，把募集来的大量款项、药品、医疗器械、通讯设备、罐头食品等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到解放区。

她团结和组织国际友人和国际医疗队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去考察和工作。斯诺、史沫特莱、白求恩、柯棣华、马海德等记者和医生都是经她安排进入解放区的，其中白求恩、柯棣华、哈立逊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斯诺访问陕北后写下了著名的《西行漫记》。

1941年，由斯诺、路易·艾黎等国际友人在中国组织工业合作社支持抗日战争的运动，也得到宋庆龄有力的支持，她欣然出任工合国际委员会名誉主席。在她的号召和影响下，华侨也在国外各地组织救国救民的团体，他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祖国抗日战争。

1945年12月，宋庆龄在上海将保卫中国同盟改组为中国福利基金会，致力于妇幼卫生、文化教育和社会救济事业。解放战争时期，她通过各种渠道，给解放区以巨大的物质和道义上的支援。

1948年1月，宋庆龄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誉主席。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和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等职务。在国际事务中，宋庆龄在1950年11月被选为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执行局委员，1952年10月被选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主席。

1981年5月15日，宋庆龄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6日

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崇高称号。同月 29 日在北京病逝。著作有《为新中国奋斗》、《宋庆龄选集》和《永远和党在一起》。

在长期的国际政治活动中，她为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发扬进步文化，促进社会进步和人类幸福，增进各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进行不懈的努力，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因而，受到广泛的崇敬，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女性之一。

1981 年 5 月 8 日，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授予宋庆龄荣誉法学博士学位。

宋庆龄的一生始终是和人民群众联系在一起的。她不辞辛苦去全国各地视察，深入到工厂、农村、部队和少数民族地区，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和人民心连心。她谦逊和蔼，平等待人，兴办实事，是真正的人民公仆。她一生热心妇女解放事业，是中国妇女界的杰出领袖之一，历任全国妇联名誉主席。她长期主持中国救济总会、中国红十字会的工作。她毕生致力于少年儿童的文化教育福利事业。

1981 年 5 月 29 日，宋庆龄因病在北京寓所逝世。遵照她的遗言，骨灰安葬在上海万国公墓她父母陵墓的东侧。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为她立碑铭文以表纪念：宋庆龄是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她为国家和人民所建树的丰功伟绩，将永载史册。

周恩来

周恩来（1898～1976年），江苏省淮安人。1917年毕业后赴日本求学。1919年回国。“五四”运动中成为天津学生界的领导人。1920年11月，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秋回国后，先后担任了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委员长、军事部部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政治部主任，东征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等职。1926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27年2月任中央和上海区委联合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委员，领导了上海工人第3次武装起义。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了南昌起义，此后，他在一段时期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1931年12月到中央苏区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红军总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委员会副主席。1933年春，同朱德指挥第一方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他对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起了重要作用。

1937年抗战爆发后，周恩来被推选为中央军委副主席。1938年3月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1943年8月回到延安后，继续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抗战胜利后，同毛泽东等赴重庆谈判，达成“双十协定”。以后率代表团继续留驻重庆、南京同国民党谈判。1946年11月回到延安。1947年8月兼中央军委总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政务院总理，后为国务院总理直到逝世。他深谋远虑，促成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在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政策的感召下，当时位居“剿共”最前线的东北军少帅张学良和17路军将领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发动兵谏，扣留了前来督战的蒋介石。当消息传到延安后，中共中央急派周恩来前往西安，力使事变妥善解决，最

后促成全国团结一致抗日的最终目的的实现。

周恩来当时认真分析了蒋介石的心态和性格后，认为对蒋不应应用强，而应该采取积极谦逊的姿态使他保持一国领袖的自尊。这一招果然奏效，在蒋介石听到共产党决定团结在他的周围，听他指挥，共同抗日的允诺后，终于改变顽抗到底的态度，答应了团结抗日的主张，最终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在周恩来的军事斗争生涯中，利用“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谋略思想对国民党军队所做的策反工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长期以来运用智谋在敌军内部建立的军事统一战线，极大的推进了解放战争的进程。免使两军对垒、生死拼搏的战场上，最终出现了异军突起、战况剧变的奇观。以冯玉祥的旧部为例，周恩来通过各种策略积极争取，使拥有兵权的原西北军将领中，除去冯治安、刘汝明、孙连仲诸人外，几乎都走上了起义或投诚的道路。又如在1947年2月的莱芜战役中，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李仙洲率第73、46两军由莱芜向北突围，但因路少，车辆、辎重、人员、马匹争相夺路，拥挤不堪，无法保持正常的行军队形。在我方策动下，敌第46军军长韩练成突围前敌总指挥，秘密出走，更增加了敌军的混乱。当敌军完全进入莱芜、吐丝口间我军预设的袋形阵地后，大部被歼灭，李仙洲被生俘。

1955年4月18日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上，周总理纵横捭阖，表现了一代外交谋略家的风采。当时，以菲律宾、巴基斯坦、锡兰和土耳其等为代表的亲西方国家，唱起一曲不和谐的调子。他们在发言中含沙射影地提出所谓“共产主义威胁”、“颠覆活动”，以及宗教信仰自由等问题，矛头实际上指向中国。会议气氛变得相当紧张，必须迅速作出反应。周总理经过深思熟虑，放弃了正面反击战略。决定详细阐明中国对国际社会的立场，来间接回击一些国家的敌视态度。他将原发言稿弃之不用，空手走上讲台，作了一篇精彩的即席发言。

周恩来是一位举世公认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无论是在生死攸关的战争年代，还是在战后风云多变的国际舞台上，表现出了驾驭国家前途和命运的超凡胆略和智谋。

陈 毅

陈毅（1901～197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1954～1972年）兼外交部长（1958～1972年）。获元帅军衔。1901年8月26日出生于四川省乐至县，1916年就读于成都甲种工业学校，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秋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秋天，陈毅进北京中法大学学习，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中法大学中共支部书记。

建国后，陈毅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市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任国务院副总理。1958年兼任外交部部长。还曾任国务院外事办主任，外交学院院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名誉会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至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副主席。是中共第七、九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建国后至1958年任上海市市长。1958年起，他作为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积极贯彻执行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外交政策思想，参与制订新中国长远的外交战略方针，协助周恩来参与了一系列重要外交活动。1952年10月，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出席苏联共产党第19次代表大会，会晤斯大林。

1954年10月，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出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并顺访波兰。1955年4月，作为周恩来的主要助手和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赴万隆出席亚非会议。1958年2月，首次以副总理兼外长身份随周恩来对朝鲜进行友好访问，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回国事宜作了妥善安排。

1955年，周总理和陈毅同志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万隆亚非会议。陈毅同志坚定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对于敌视、损害中国的言行，他敢于横眉冷对，据理驳斥，毫不含糊。他不

畏强暴，敢于斗争，坚决反对外来干涉、控制和威胁，充分体现了一位伟大爱国主义者的英勇气概。

1960年，陪同周恩来或单独率团先后访问了缅甸、印度、尼泊尔、柬埔寨、蒙古、阿富汗等国，签订了《中国同尼泊尔的友好条约和经济协定》、《中国同柬埔寨的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中国同蒙古的友好互助条约》以及《中国同阿富汗的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

1961年5月至1962年5月，率中国代表团出席第二次日内瓦会议，讨论和平解决老挝问题，促使会议达成协议，签订了《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和《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的议定书》。

1963年底至1964年初，应邀参加肯尼亚独立庆典，并陪同周恩来访问非欧亚14国，实现了新中国领导人对非洲大陆的第一次访问。

1964年4月至1965年6月，为筹备第二次亚非会议奔波于雅加达、开罗、阿尔及尔之间。当东道国阿尔及利亚发生政变使会议搁浅后，参与磋商，强调亚非团结，反对分裂，促使达成会议延期的协议。此外，他还多次出访亚非国家，仅对缅甸一国，即达10次之多。

自二战结束后，中日两国间便陷于冷战状态，政府间交往中断，只保持了一部分民间交流，而建国后的中日外交则面临着新的考验。五十年代刚刚出任外交部长的陈毅正在寻找打开外交僵局的突破口，恰逢日本围棋代表团访华，这位闻名政坛的围棋迷抓住这一机会，他曾向日本自民党著名政治家松村谦三先生建议，“围棋、乒乓、书法、兰花都可以交流”。在他的倡议影响下，中、日两国围棋界开始交流互访。

1964年12月，日本29位著名围棋手发表呼吁书，号召日本800万棋手参加要求恢复中日邦交征集3000万人签名的运动。同日本的民间交往遍及日本各界和各个阶层。陈毅同志对常驻我国的外宾和外国专家也关怀备至。

他与斯特朗、西园寺公一、路易·艾黎等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都有深厚的友谊。在毛主席、周总理和陈毅同志的领导和推动下，我国的民间外交得到迅速发展，与国外的交往成倍增加，出

现了“风雷驱大地，是处有亲朋”的大好局面。

陈毅正是抓住了围棋在日本的影响（日本有 800 万人下围棋），把围棋与外交联系起来。在陈老总的热心推动下，日本棋界名人联合发表了呼吁书，要求日本政府改变对华政策，早日实现邦交正常化。

今天，当我们从片中看到陈毅拈起棋子，思考片刻，指落中枰时，都会情不自禁地由衷感叹陈老总胸中的雄韬伟略，演绎出新中国外交史上一个辉煌的范例。

1965 年 9 月在北京发表著名的记者招待会讲话，阐述中国对一系列国际问题的看法，表明中国外交的严正立场，在国内外均产生深远的影响。“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同林彪、江青集团破坏外交工作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

1969 年珍宝岛一声枪响，将中苏关系推向更为恶化的深渊。同时，也使得中美苏三国之间的战略关系更为复杂化。此时，毛泽东极需像当年打江山那样，身边有忠臣良将出谋划策，他向周恩来密授机宜，请已经下放劳动改造的四位健在的老师即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立即回京，用周恩来的话讲：“你们四位都是元帅，毛主席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们，就是希望以战略的眼光分析国际形势，提出战略性看法，供毛主席决策参考。”这也就是多年来人们猜测纷传的所谓“四老师务虚会”。

这年 3 月至 10 月，由陈毅牵头主持，四位老老师在中南海武成殿共开了 24 次会，向党中央呈递了三份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报告。陈毅曾说过：“这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大事，回答必须明确，不能含糊其词。”后来，他在病榻上得知尼克松将于次年访华时，欣然道：“也许我看不到两国正式建交，但我们的建议起了作用，这就好嘛。”

历史证明，四老师务虚会为毛泽东下决心改善冰封已久的中美关系起到了关键性推动作用。当毛泽东与尼克松的手握到一起时，尼克松曾语重心长地这样说：“今天，我在这里握手时不能忘记另一个人，他在几个月前去世，他就是陈毅……”

1972 年 1 月 6 日，因患肠癌在北京逝世，终年 71 岁。

邓小平

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邓小平出访美国，在美利坚大地上刮起了一阵“邓旋风”。在历时8天的访问中，邓小平不知疲倦，争分夺秒地与卡特总统以及其他美国官员进行会谈；会见了数以百计的议员、州长、市长以及企业界和文教界的知名人士；在不同的场合向数千人直接发表讲话，并回答一批又一批记者提出的问题。这期间，有两千多名新闻记者追踪采访和报道这一历史性事件，美国三大全国性电视网的黄金时间全部变成了“邓小平时间”。在邓小平前往访问的亚特兰大、休斯敦和西雅图，当地报纸都在头版头条用通栏标题表达对邓小平的欢迎，并以大量篇幅报道邓小平访问活动。可以说，在中美关系的历史上，“中国对当前国际事务和中美关系的立场以这样有效的方式直接为美国公众所深切了解，这是从未有过的。”（新华社记者、《人民日报》记者述评）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的北部一直处于前苏联百万大军压境的威胁之中。到了1978年和1979年，前苏联的军事力量又伸入越南、柬埔寨、阿富汗，加之亲苏的印度，从而完成了从北、西、南三面威逼中国的战略包围。在这种情况下，刚刚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取得对“凡是派”决定性胜利的邓小平，遂将外交战略眼光投放到遥远的美利坚大地上，希望以同美修好为契机，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以确保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战略重心的大转移。

而从1978年到1979年初，从美利坚吹拂过来的阵阵热风，更坚定了邓小平的这项外交抉择——

1978年5月17日，卡特总统指示即将访华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向中国领导人强调，美国已下决心要断

然对付苏联在全世界的军事集结和代理人的扩张主义。与此相应，卡特总统又授权布热津斯基告诉中国领导人，美国接受中国关于正常化的三项基本条件（断交、废约、撤军），并重申尼克松和福特总统以前声明的五点（1977年初布热津斯基曾敦促卡特加以重申的正是这五点，当时没有结果）。

12月16日，中美双方共同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197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正式建立全面外交关系，中美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

来而不往非礼也。为了进一步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邓小平决定应美国总统卡特的邀请，作为1972年尼克松总统和1975年福特总统访华的回访，于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

邓小平与美国总统卡特、副总统蒙代尔、国务卿万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等进行了多次卓有成效的会谈。在1月29日的会谈中，邓小平强调世界各国的和平和团结，反对各种霸权主义，也虚心听取美方的意见。邓小平的才能、胆识和风度使卡特甚为佩服，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邓小平聚精会神地听着。他一支接一支地吸烟，明亮的眼睛不时向左右扫视。当我的话被翻译给他听时，他时而发出笑声，时而向别的中国人有力地点头。邓给我留下了好印象。他身材矮小，性格坚强、有才智、坦率、勇敢、气宇不凡、自信、友好。同他谈判是一种乐趣……”

在1月30日的谈判中，邓小平与卡特就国际形势，特别是越南在苏联支持下入侵柬埔寨问题交换了意见。邓小平称越南是亚洲的地方霸权主义者，对莫斯科和河内可能存在的联盟表示忧虑。

1月31日，邓小平和卡特在白宫东厅亲自签署了（中美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黄华、方毅分别和美国签订了《关于建立领事关系和互设领事馆的协定》、《教育、农业和空间合作谅解的换文》、《关于高能物理合作协定》。由于这些都是行

政协定，因而毋须美国参议院正式批准，开创了双边关系正常化的先例。

卡特总统兴致勃勃地说：“这三天的讨论是真正罕见的。”

签字仪式后，邓小平以乐观的口吻说：“我们刚才办了件大事，这不是结束，而仅仅是开始。”又说：“我们曾经预期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后，两国的友好合作将在广泛的领域里迅速地展开，今天所签订的协定就是我们的第一批成果。”

卡特总统热情洋溢地说：“我们已经找出了一条新的、不可逆转的途径，通向更坚实、更有建设性、更富有希望的两国关系。”

有的美国记者故意向邓小平提出挑衅性问题：“你们当初决定实现关系正常化时，你在国内有没有遇到政治上的反对势力？”

卡特这时暗暗着急，可也只好瞪大眼睛望着邓小平。只见邓小平笑容可掬，不紧不慢地回答道：“有！”

邓小平的回答使在场的人们无不瞠目结舌。但邓小平又话锋一转，字字掷地有声：“在中国的一个省——台湾——遇到了激烈的反对。”

邓小平语惊四座，全场顿时爆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

2月5日上午，邓小平一行结束了对美国八天的正式访问，乘专机离开西雅图途经日本，于8日下午返回祖国。其间他在日本作了两天停留，同大平正芳首相等进行了会见。在会见中，邓小平再次严厉地谴责了越南的地区霸权主义，并说，必须给越南以制裁，为此，即使冒某种危险也要采取行动。世界舆论对此认为，邓小平的谈话意味着中国即将对越南采取军事惩罚行动。

邓小平回到北京后第10天，中国边防部队在广西、云南边境地区开始了自卫反击战。西方舆论界据此认为，邓此前的环太平洋访问是对美、日两国态度的火力侦察。而在整个自卫反击战中，苏联都始终保持了事实上的沉默，硬是忍心地让它的越南小兄弟在中国铁拳暴风骤雨般地打击下辗转哀鸣而不动声色。这，应该是与邓小平连续访日、访美以及中日、中美接连实现邦交正常化有着密切关系的吧！

邓小平的新的外交战略以及取得的巨大成功，着实使“北极熊”有些心虚胆怯。后来，它终于沉不住气了，不断向中国传递出缓和的信号。1989年5月，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终于来到北京，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中苏关系从此正常化。这又令美国人心酸溜溜的……

邓小平不止一次讲到“世界大三角”。一次，他对日本朋友说：“世界上的人在议论国际局势的大三角。坦率地说，我们这一角力量是很单薄的”。邓小平这里并非否认“三角”存在，而只是觉得中国这一角尚需努力。因此，中国这一角不能投靠任何一方，要独立自主而又灵活机巧，成为另外两角都需要争取和借助的对象。正如邓小平所言：“世界上都在说苏、美、中‘大三角’。我们不讲这个话，我们对自己力量的估计是清醒的，但是我们也相信中国在国际事务里面是有足够份量的。”其实，中国的份量就在于中国人民自己，先是毛泽东，后是邓小平，在国际事务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善于利用并巧妙处理各种国际关系，在相对平衡中发展自己国家的经济。只有经济强大了，我们在国际事务里面才能真正有份量，才能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更大的贡献。

理查德·尼克松

理查德·尼克松于1969年1月20日就职后就把同中国恢复关系放在了重要位置。1970年2月9日，尼克松在致国会的对外政策报告中正式提出：“采取力所能及的步骤来改善同北京的实际上的关系。”1970年3月，美国国务院宣布放宽对去中国旅行的官方限制。4月，又放宽了贸易限制。1970年10月，美方又通过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向中国传话。10月25日，尼克松要求叶海亚向中国政府传话：美国愿意派一位高级使节秘密访华。10月26日，尼克松在欢迎齐奥塞斯库的祝酒会上第一次故意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提法。

中国领导人从各种渠道获悉尼克松希望与中国打通关系的信息，并予以高度重视。积极研究并寻求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途径。受毛泽东的委托，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老师定期开会讨论国际形势。1970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毛泽东与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合影。这幅精心选择的照片向美方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中国愿意改善与美国的关系；毛泽东告诉斯诺，中国正在考虑允许左中右各派政治色彩的美国人访问中国。毛主席的这些话，尼克松几天后就知道了。1970年12月9日，周恩来总理通过叶海亚总统传话说，欢迎尼克松的代表到北京来谈判。1971年1月，中国政府通过罗马尼亚一位副总理给美国传话，“中国准备在北京接待一位美国的特使”来解决“美国对台湾的占领”问题。1971年4月中旬，日本东京举行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后，中方主动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个后来被誉为“小球推动大球”的行动成为世界外交史上的一段佳话。美外交关系突破开始于“乒乓外交”，尼克松说这是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方式。

7月6日，在基辛格访华前3天，尼克松在堪萨斯发表了当前世界上有五大力量中心的讲话，他说：“美国的政策目标从长期来看，必须是结束大陆中国的与世隔绝状态和使我们同大陆中国的关系正常化。”

此后，基辛格于7月9日至11日，秘密访问中国，这次代号为“波罗”的行动，启动了中美关系的大门。7月16日（美国是15日晚上），中美同时发表著名的公告：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邀请他在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基辛格访华取得了圆满成功。1971年7月15日，尼克松宣布：他即将出访中国。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台湾岛上一片惊慌，连85岁高龄的蒋介石听了半天都说不出话来。

1971年10月20—26日，是基辛格的第二次中国之行。周恩来和基辛格磋商上海公报草稿。作为他的实现“一代人的和平”计划的一部分，尼克松总统经过这番周密的外交准备后，终于水到渠成。尼克松对自己访华极为重视，出访前他做了各方面的准备，特别是就中国的文化、历史以及政治方面向有关人员提出了许多问题，作了尽可能详细的了解。

1972年2月21日上午11时30分，尼克松乘坐的“空军一号”专机降落在北京南苑机场。专机降落的时间是尼克松总统亲自选定的，这个时间是美国东部时间星期日晚上10时30分，正是公众收看电视的黄金时间。为了突出尼克松总统走下飞机时与周恩来握手这一历史性的镜头，尼克松特别要求，在总统走下飞机时，不能有任何其他美国人在电视镜头里出现，以免分散观众的注意力。就连基辛格和国务卿罗杰斯也被告知，只有到总统同周恩来握完手后，才准许他们下飞机。据尼克松事后说：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要纠正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当时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的失礼行为。为防止有人违规随总统走出舱门，美国方面指派了一名粗壮的副官挡住机舱通道，以使总统顺利完成这一历史性的握手。在距离舷梯尽头还有

几步台阶的时候，尼克松就早早地向等候在舷梯下的周恩来总理伸出了手。在两只手彼此紧握的一刹那，风度翩翩的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说道：“总统先生，你把手伸过了世界上最辽阔的海洋同我握手，我们之间已经有 25 年没有交往了。”尼克松激动地说：“我感到很荣幸，终于来到了你们伟大的国家。”后来，尼克松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的手一接触，一个时代宣告结束，另一个时代宣告开始了。”

尼克松一行刚刚到达钓鱼台国宾馆一小时，周恩来也随之赶到。他告诉美国客人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毛泽东主席要马上会见尼克松。同尼克松的会谈原定 10 分钟，但由于宾主双方谈得尽兴，不知不觉一个小时过去了。谈话结束时，尼克松说：“主席先生，在结束的时候，我想说明我们知道你和总理邀请我们来这里是冒了很大风险的。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很不容易做出的决定。但是，我读过你的一些言论，知道你善于掌握时机，懂得只争朝夕。”听到译员译出他自己诗词中的句子，毛泽东露出了笑容。说完这句话，尼克松起身告辞。临别，尼克松握住毛泽东的手说：“我们的会面改变了世界。”

当天晚上，周恩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国宴，欢迎尼克松一行。国宴的盛大场面，通过国际通讯卫星直接传到了美国的千家万户。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军乐队演奏了尼克松最喜爱的乐曲《美丽的亚美利加》；在祝酒词结束前，尼克松援引了毛主席的一首词：“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并借题发挥说：“让我们两国人民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新世界。本着这样的精神，让我们共同举杯为毛主席和周总理，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为世界所有人民的友谊与和平干杯。”

1972 年 2 月 28 日，举世闻名的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发表。

美国拒绝正式承认中国政府达 20 多年之久。尼克松实行政策上的大转变，不论就他个人说，还是就这件事的国际影响来说，都是同样意味深长的；而且这件事也肯定了尼克松本人的一个说法：“中国之行的这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在中方举行的国宴上，尼克松总统使用筷子的熟练手法，引起周恩来注意，称赞他和夫人使用筷子技巧“堪称一流”。得到了周恩来的高度赞赏，尼克松夫妇开心极了。尼克松认为，政治家融入到访国家的文化而受赞赏，是最成功和最光彩的事。

尼克松访华，为中美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恢复正常关系、实现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铺平了道路。他是历史上第一个访问中国的美国在职总统。作为政治家的尼克松，其高明之处在于他能够根据世界形势的变化，修正自己固有的观点。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贝文·亚历山大对尼克松访华大加称赞，说他是“罗斯福以来在对华关系方面最有眼光的人”。

乔冠华

中国历史上的三国时期，有与天下英雄孙权、周瑜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江南二乔”，她们是“风流姿色天下闻”；在20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内，也有“二乔”并世而出，不过，他们是“风流文采天下闻”。一位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曾担任毛泽东秘书25年之久的胡乔木；另一位即是曾任共和国外交部长，活跃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的乔冠华。

1913年，乔冠华出生于江苏盐城东乔庄的一个地主兼工商业者家庭，父亲算是开明士绅。他幼年天资聪颖，有过目成诵之誉。早年在盐城第二高等小学、宋村亭湖中学、盐城淮关中学上学，由于学习成绩优秀，他在初中高中时几次跳级插班，16岁高中毕业即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成为大学同届中最年幼的学生。

1939年他由廖承志、连贯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0年6月9日，德军向法国马其诺防线发起全面进攻。在香港一家咖啡店嘈杂的地下室里，一大群中外记者对战局作各种猜测和设想。乔冠华大口吸烟，一言不发，倾听大家争论。忽然，他起身挥手打断众人话语，说：“6月9日是法军最黑暗的一日。刚才听了诸位的许多高见，似乎还抱着很大的希望，实在大局已定……我可以告诉大家，三天以后，巴黎将不战而降！”一语惊四座！爱因斯坦、根塞·斯坦、罗吟圃等名记者摇摇头，不以为然，“决战正在进行，胜负未见分晓……”有的人则忿怒地质问：“你怎能这样说？！”乔冠华掐灭烟头，自信地说：“这不是一句话可以回答的，诸位请看以后的报纸好了。”就在众人争论的第四天，6月13日，法国投降，德军开入巴黎。6月22日，德法停战协定签字，6月24日，法意停战协定签字。战局的发展，证实了乔的预言。这位青年国际评论家受到了普遍的赞誉。1941

年，乔出任香港《华商报》编委，《大众生活》编委。

1942年秋季乔冠华到重庆《新华日报》工作，主持“国际专栏”，直到抗战胜利。

在这国内外局势大变动的时期里，乔冠华的工作几经变动，但他一直没有从事所学的专业——埋头于深奥的哲学研究，而是紧密联系如火如荼的斗争实际，写出了一系列脍炙人口并有重要影响的国际述评文章。

乔冠华的这些国际政论文章，其一大特点是文章的标题就很有特色，其文章标题见诸于报刊后，总是先声夺人，而后必欲对其文先睹为快。例如《历史的报复》、《报复的历史》、《斯大林的大手笔》、《站在胜利的门前》、《沉寂不是和平》、《时代终究是变了》等等。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局势中，他的政论文章的标题“往往是用抽象的或形象化的语言，指出或暗示当时国际局势的要害，以期对读者有所帮助”。乔冠华后来如是说。

乔冠华的国际政论文章的内容，在广博的欧洲及世界地理、历史、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知识的前景叙述中，向人们议论，透析着时局的焦点，思想集中、内容深刻，给人们以很大的启示和教益。

他的文章总是以其把握问题实质的鲜明性和战斗性，给予人们以信心和鼓舞，在希特勒初期获胜不可一世时，乔冠华这样写道：这是今天的形势。

全世界的眼睛在盯着希特勒，有人将他比成拿破仑；但是人们忽视了；拿破仑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升期的英雄，希特勒是资本主义社会没落期的怪杰，希特勒的迷信并不是建筑在他的飞机和坦克之上，而是建筑在全欧洲资产阶级的没落、反动和腐化之中。……

现在，欧洲大陆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匍匐在希特勒的马蹄之下，希特勒已经快要变成资本主义社会的拿破仑；我们不知道历史是不是会重演，不过，可以断言的是：未来的莫斯科将和过去的莫斯科有着本质上完全不同的划时代的意义。

莫斯科是历史上一块奇异的地方。乔冠华的国际政论文章尖

锐泼辣，在恢宏的气势中又常夹杂着诙谐幽默，明快而活泼，同时，为了说明复杂，危急的局势，他总要列出许多真实的细节，让读者自己判明真相。所以，他的文章读后往往使人拍手称快，过目难忘。

乔冠华当年撰写的国际评论文章影响广泛，其成功一方面是由于其反法西斯主义的原则性、坚定性、在重大问题上总是与国内争取民主、团结进步、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斗争密切呼应，以及他留学欧洲期间所掌握的广博的国际知识，另一方面，他在联系扑朔迷离，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写作时，有胆有识，也付出了很大心血。

乔冠华自 1937 年至 1946 年写的这些评论文章当时曾编为文集《争民主的浪潮——1939 年的国际》、《形势比人强》、《向着宽阔光明的地方》、《从战争到和平》、《从慕尼黑到敦刻尔克》出版。他在 33 岁以前写的这些国际述评文章，以其广博的知识，立论的严谨，优美的文字，精辟的见解，代表和平、民主、进步、正义的声音，在三四十年代，赢得了不小的声誉。

1946 年初随周恩来来到上海，参加中共代表团的工作，同年底赴香港，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外交部副部长（1964.3～1974.11）等职。

1950 年 10 月，作为顾问，陪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特派代表伍修权出席联合国安理会，控诉美国对中国领土台湾的武装侵略。

1951 年 7 月，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李克农的主要顾问，参加板门店朝鲜停战谈判。1954 年 4 月，随同周恩来总理出席日内瓦会议。

1961 年 10 月至 1962 年 8 月，陪同陈毅外长出席第二次日内瓦会议。在外交部日常工作中，经常起草或组织领导撰写重要外交文件，如：1962 年 11 月周恩来总理就中印边界问题致亚非国家领导人的信，1970 年毛泽东主席为支持柬埔寨人民反对美国侵略斗争而发表的五·二声明等。

70 年代初，作为主管美国事务的外交部副部长、外交部长，

协助周恩来为打开中美关系开展了一系列外交活动。

1972 年尼克松总统访华时，负责与基辛格谈判、草拟中美联合公报。

1971 年 11 月，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恢复后，第一次率中国代表团出席第 26 届联合国大会并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全面阐述了中国的外交政策。

自此至 1976 年，均以中国代表团团长身份出席历届联合国大会。

1973 年 5 月，陪同邓小平访问法国。

1976 年 10 月，以外交部长身份再次访法。

1976 年后，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顾问。主要著作有：《国际述评集》、《从慕尼黑到敦刻尔克》等。

维利·勃兰特

维利·勃兰特于1913年12月18日出生在波罗的海海滨城市吕贝克的一个贫困工人家庭，母亲是合作商店的售货员。外祖父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信徒，母亲也常常参加社会主义的活动。维利在少年时期就参加了社会民主党组织，不满17岁时被破格吸收为社民党党员。1947年来到柏林，参加柏林的战后重建工作。当然，那时的勃兰特决不会料到，在以后的20年时间里，他的名字同柏林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了。

1964年，这位51岁的少壮派登上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的宝座。

勃兰特之所以能牢牢地控制住党，成为社会民主党团结的象征，决不是由于他善于专权。事实上，他是非常善于妥协的，在党内素有“和事佬”之称，但做“和事佬”并不等于他没有权力，他的意见在关键时刻总是受到重视的。勃兰特并非是一个毫无缺点之人，他的可贵之处在于能够克服那些缺点，他考虑自己的弱点比别人考虑自己的才干要多。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不自命不凡或野心勃勃，而是懂得看准机会，及时主动出击，一举得胜。

柏林为勃兰特提供了一个有利于他开展事业的地位和日后步步高升的特殊环境。勃兰特是首先被派往波恩的八名联邦议员之一，并很快成为市议会议长，这一特殊的荣誉职务使他可以超越社民党的范围，发挥自己的政治影响，1957年，西柏林市市长苏尔逝世后，勃兰特力挫群雄，以绝对多数票当选为西柏林市长。

1958年和1961年，两次柏林危机先后爆发，把冷战推向高峰，特别是后一次柏林墙危机，使东西方几乎接近交火状态。勃兰特以一个冷静、理智而又果断的态度走上前台。他既表现出决

不让步的立场，同时又呼吁市民保持理智和克制，承认现实，避免事态的完全恶化，并采取一系列的补救措施，稳定市民情绪。正是由于勃兰特等人的努力，柏林才得以从灾难的边缘挽救出来，简直处于绝望的形势才未能进一步恶化。柏林危机，也使勃兰特的名声大作，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政治资本。就是当时赫赫有名的联邦总理阿登纳的形象，同这位柏林市长比起来，也显得相形见绌。在事件期间，勃兰特对这位从波恩姗姗来迟的联邦总理大人，表现出明显的冷遇。

勃兰特任柏林市长达十年之久，作为德国这个最大城市的总管，辖有 200 多万人口的市长，几乎获得了他想得到的一切东西。就像柏林忘不了勃兰特一样，他也忘不了使他跻身德国政坛的这座基地。但如果认为勃兰特的政治舞台仅限于柏林这一城之域，恐怕低估了这位政治家的雄心抱负。

1961 年，担任柏林市长仅四年的勃兰特，就被他的党推举为总理候选人，同老态龙钟的政敌阿登纳角逐。勃兰特在第一个回合的角斗中失败了。四年之后，联邦选举的大旗又一次拉起，勃兰特继续作为该党的总理候选人，再一次走上竞技舞台，同素有声望的著名经济学家艾哈德竞争，结果又未如愿。勃兰特心事重重地回到柏林，继续担任他的市长职务。两次政治角逐的失利，不但给社会民主党带来损失，埋怨、批评、指责审此起彼伏，一浪接一浪；而且也给勃兰特本人很大的刺激。他曾一度萌发离开德国政治舞台的念头。但勃兰特毕竟是一个经受得住失败考验的强手，他比别人更能忍受痛击，每当遭受失败、烦恼、苦闷时，他就低头沉思，在内心里默默同自己的感情打交道，一旦从挫折中清醒过来后，他又回到竞技场上来了。机会很快降临，一年之后，联邦政府爆发危机。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艾哈德政府宣布辞职。由各个主要党组成的大联合政府宣告成立。社会民主党首次获得参政机会，勃兰特担任副总理兼外长。大联合政府的组成给社民党带来了无法估量的好处，它第一次在联邦范围内给社民党提供了使居民相信这个所谓“永久的反对党”具有参政能力的机会。这次参政的过程，使勃兰特的领导能力，尤其是外交手腕

第一次在联邦政府的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他成功地扭转了联盟党因长期推行“哈尔斯坦主义”而使西德外交走进死胡同的局面，提出了大胆、灵活的“新东方政策”。从某种意义上说，勃兰特的这次参政，为他以后登上总理的权力宝座，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勃兰特上台后，面对国内外的一系列棘手问题，虽说并无治国妙方，但也敢大胆探索。在内政方面，他提出了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为改变国内经济的困难局面提供了推动力，使联邦德国从困境中走了出来，继续朝着繁荣、发展之路迈进。与治理内政的成就相比，使勃兰特个人形象大放异彩的自然要算他的外交活动了。作为联邦总理，勃兰特非常善于审时度势、利用机会，寻找突破口。早在几年前任外长时，他就清醒地认识到：基于哈尔斯坦主义的联盟党一贯推行的强硬东方政策，已经没有出路。勃兰特执掌政权后，对西德外交进行了惊心动魄的大调整，突出的就是改变旧的东方政策，缓和同东方国家的关系，特别是同苏联、民主德国的关系。有限度地承认民德，默认奥得尼斯河边界。勃兰特上任后，立即同民德政府商谈，改善双边紧张关系，互设常驻代表机构，并同时申请加入联合国。1971年，勃兰特作为联邦总理首次出访苏联。这次访问的重大成果是，双方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结束了这两个大国之间的长期战争状态。同时，他还同波兰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实际上承认了德波间的奥得尼斯河边界。不知是出自真情，还是一种手段，勃兰特在波兰访问期间，当来到犹太人纪念碑前时，他突然双膝下跪，在场的几百人无不为之惊呆。

新东方政策，显示了勃兰特争取现实主义的政治勇气，缓和了二战后的欧洲紧张局势，也提高了德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与声望。这位总理因此被西方人士称赞为制造缓和气候的先驱，在人们中被看成是一个伟大的和平缔造者。为表彰他为此作出的贡献，1971年挪威议会决定授予勃兰特诺贝尔和平奖。作为联邦德国的勃兰特，为了德国人民的利益，向昔日的敌人伸出了和解之手。他热诚地为欧洲的和平奔波，在奠定欧洲和平事业上作出了

杰出的贡献。他找到了修复东西欧之间关系的桥梁——缓和政策。

对于德国的统一，勃兰特是极其关注的，并为此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他推行的新东方政策，就为两德之间建立相互信任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他还到东部讲演，创造缓和气氛。他主张东西德两部分应逐渐融合，“不要操之过急”。

无论是作为总理，还是作为党魁，勃兰特的权威是巨大的。然而，他并未因此成为滥用权力的专断者。

1992 年 10 月 8 日，德国国家电视台向全国播发了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联邦德国前总理、社会党国际前主席维利·勃兰特，因患癌症医治无效，在家中逝世，享年 79 岁。

罗纳德·里根

1981年1月20日，美国共和党保守派代表人物罗纳德·里根就任美国第40任总统。他于1985年连任，1989年1月卸任。

20世纪80年代是冷战达到高峰的年代。在这个年代，里根接连担任了两届美国总统。里根上台之初，美苏争霸激烈，美国所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当时，苏联对美国步步进逼。特别是苏联出兵阿富汗后，进一步威逼印度洋，在全世界到处插手。而美国则有时显得被动。例如伊朗和尼加拉瓜的亲美国政权相继垮台。52名美国驻伊朗的外交人员被扣为人质，使美国这个世界超级大国蒙受了奇耻大辱。

里根上台后，决心要想尽一切办法对付苏联。里根制定了新遏制战略。这一战略表面上没有20世纪50年代杜鲁门主义那样强硬，也不像尼克松主义那样软弱。其基本方针是，以抗击苏联为中心，重振国威，奉行“以实力求和平”的方针，即以美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压住苏联；在地区争夺上，把苏联阻止在70年代末的扩张线上，使苏联不能更进一步。同时，保持各种渠道，加强同苏联的对话，迫使苏联妥协让步，促使苏联“演变”。里根对付苏联有许多招数。

里根认为，对苏联必须有强硬的一手。里根上台后任命的国务卿黑格和国防部长温伯格都是对苏强硬派。这显然被认为是对苏联发出的强硬信号。黑格在答记者问时将里根政府初期的对外战略概括为四点：恢复军事实力；着手重建与盟友的健康关系；理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稳定国内经济形势。

为了极大地增强实力，以对苏联构成强大的压力。1981年10月，美国制定了战略核进攻力量现代化计划，以提高战略核武器生存能力为中心，加强陆、海基战略导弹力量。里根承袭了历届

政府的“剑盾理论”，以核力量为后盾，把常规力量作为主要作战手段。但他在强调常规力量的实战作用的同时，更加注重其威慑作用。里根认为，遏制战争爆发是美国的首要任务。为达此目标，美国现在需要的，不是削弱威慑，而是要增强威慑。美国核威慑和常规威慑一旦失灵，美国应立即进行灵活反击。

里根对付苏联的第二招是与苏联展开太空军备竞赛。1983年3月23日，里根宣布，为确保美国及其盟国在可能发生的美苏核大战中立于不败之地，美国已经制定了《总统战略防御倡议》，其主要内容是建立以定向能武器为主的反弹道导弹多层综合防御系统，用以在可能发生的核大战中拦截并击毁对方发射过来的弹道导弹，保护美国及其盟国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里根政府推出了一个“战略防御倡议”，即“星球大战”计划，试图谋求对苏联的战略优势，美苏之间的战略平衡因此开始受到威胁。这个计划在国际论坛上被炒得沸沸扬扬，人们都感到它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从1985年起，美国开始每年为“星球大战”计划投入20亿美元以上的资金，“星球大战”计划开始全面展开。

由于这一计划所设想的核大战主要是在外空进行的，因而又被称为“星球大战”计划。1985年1月3日，美国正式公布了这一计划，计划透露，拟建的战略防御系统将不仅使用常规弹头，而且将使用激光、粒子束、电磁轨炮和截击弹等高新技术武器。SDI计划最大限度地起到了对苏抗衡作用，在当时情况下有效地对付了苏联的威胁。然而这是里根制定“星球大战”计划的目的之一。他制定“星球大战”计划还有更深层次的目的：即凭借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通过旷日持久的、耗资巨大的太空武器竞争，把苏联的经济拖垮。

美国达到了预期的目的。由里根制定的所谓“星球大战”计划，几乎拖垮了包括苏联在内的华沙条约诸多国家的经济。及至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苏联、东欧等国如同多米诺骨牌式地纷纷坍塌。随着美俄核力量对比的变化，克林顿政府在1993年宣布不再继续执行原来的“星球大战”计划。

里根对付苏联的第三招是利用“谈判”。尼克松“手里拿着大棒而又和颜悦色地谈判是对付苏联人的有效办法”这句话对里根影响很大。里根上台后提出了“重振国威，以实力求和平”的战略方针。这一方针要求在对苏联保持强大压力的同时，与苏联保持各种渠道的对话，迫使苏联妥协让步，促使苏联“演变”。

虽然里根的外交谋略是要与苏联保持接触。但他很注意选择时机。他在美国“重振军备”和“振兴经济”这两个方面未取得一定进展之前，是不愿同苏联进行军备控制谈判或其他高级会晤的。此时，他只能向苏联显示强硬姿态，逐步改变美国在全球竞争中的不利态势，并试图凭借其优越的经济和科技实力同苏联开展军备竞赛，迫使苏联在吃不消时主动提出与美国谈判，这样美国就可以争取主动了。苏联方面也似乎看出了里根的谋略，针对里根的这一意图，苏联方面频频发出“和平攻势”。

苏联方面自知在经济上拖不起，不愿与美国进行太空军备竞赛。极力主张禁止太空军事化。在美国“星球大战”计划出笼后的几年内，禁止太空军事化问题一直是历次美苏首脑会议和核会谈的主要议题，苏联要求美国放弃“星球大战”计划，里根则始终坚持强硬立场，尤其是在SDI问题上毫不动摇则以此为“王牌”，迫使苏联在陆基洲际导弹方面让步，双方对此争吵不休，直至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谈判地位大大削弱，美俄终于在1993年达成了对美有利的《进一步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

里根对付苏联的第四招是进行无孔不入的渗透。里根充分利用其庞大的间谍网，大量向苏联打人，进行间谍活动，并不断制定和实施瓦解苏联的秘密战略，诱导苏联上当受骗，利用经济战谋略的种种暗器，严重削弱和破坏了俄罗斯的经济军事实力，促使其庞大的工业金融体系陷入瘫痪。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和中央情报局曾雇佣一大批专家，包括心理学、历史学和国际政治经济方面的专家，拟定了美国瓦解苏联的“软战争”谋略，千方百计迫使苏联经济陷入困境，极力动摇苏联领导人对自身制度的信心。巧妙发动的政治、经济、心理、外交、军事等方面攻势。美国策划的“软战争”取得初步成效之后，又开始发动了

“攻心战”的第二阶段，通过新闻媒介大肆赞扬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并于80年代后期资助了一大批苏联知识分子，前往美国考察学习西方政治经济制度和理论。在戈尔巴乔夫开始进行改革的关键时期，美国秘密战略发挥了更为重要和独特的作用。其实，戈尔巴乔夫曾经面临许多的改革选择，但他却被美国精心诱导走上了毁灭之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雇员彼得·施瓦茨撰文说，“前苏联垮台不是上帝青睐美国，而是里根政府奉行的外交谋略所致”。他在书中透露，关于苏联“客观上”是否具有生命力，里根根本不感兴趣，他提出的任务就是，“将这种生命力降低到零”。